

金石傳拓



西泠藝叢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XILING ACADEMIC

西泠藝叢

二〇二一年 总第七十八期

专题·「大印学」概念的产生

专题·「大印学」概念的产生

- 「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
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 2004—2020年西泠印社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孤山证印」峰会论文集目录汇总
学术研究
- 古玺印考证释注的多维博辨与音韵审定——以「甫易」四玺为例兼论「浮阳」假音转义及其渊源

二〇二一年 总第七十八期

陆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
总局认定
学术期刊

陆



◎「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 会议现场

ISSN 2095-9362



9 772095 936212

国内统一刊号 CN33-1393/J

定价：3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何元锡印 奚冈

专题·“大印学”概念的产生 / Zhuan Ti · Da Yin Xue Gai Nian De Chan Sheng

“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

- 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文/陈振濂 02
- 印学的“小”与“大” 文/孙慰祖 11
- 构建“大印学”的几点设想 文/林乾良 13
- 书画鉴藏印刍论 文/曹锦炎 15
- 略论古玺印鉴藏与印谱 文/许雄志 17
- 关于印谱研究的几点建议 文/张炜羽 18
- 关于“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古印文字历史溯源研究的断想 文/莫小不 20
- 关于当代书法学科建设及“大印学”概念产生的认识 文/陈道义 23
- 以古陶文为例浅析“大印学”学术概念产生的意义 文/唐存才 24
- 关于“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大印学”概念联系的几点想法 文/金丹 27
- “大印学”概念的历史意义 文/戴家妙 28
- 关于印学观念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文/徐清 29
- “传统碑帖学”研究的几个视点 文/林如 31
- 以滚印为例略谈域外印章研究 文/刘昌玉 33
- 2004—2020年西泠印社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孤山证印”峰会论文集目录汇总 35

学术研究 / Xue Shu Yan Jiu

- 古玺印考证释注的多维博辨与音韵审定
——以“甫易”四玺为例兼论“浮阳”假音转义及其渊源 文/郭清华 45

博硕士学术研究论坛 / Bo Shuo Shi Xue Shu Yan Jiu Lun Tan

- 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
——以陈介祺金石图为中心的考察 文/徐发 59

艺丛信息 / Yi Cong Xin Xi 76

社员近作 / She Yuan Jin Zuo

- 曹文武 / 高庆春 / 王立民 / 张跃飞 78

封三：烟云供养 丁敬 生于癸丑 黄易 应天·小壑山人 蒋仁 秋声馆主 奚冈

封底：“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 会议现场



“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

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文 / 陈振谦

“大印学”的构想，是横贯十几年过程中的一个很偶然产生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偶然出现，实际上它也积累了很长时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轨道。我刚才特别注意几位年轻学者的观点，十分精辟。我还特别注意曹锦炎老师和孙慰祖老师的学术反应。为什么？因为这一类新的构想，年轻学者接受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是比较容易的、正常的；但不知道学富五车、饶有建树的资深老专家认可不认可？我心里也没有底。老一辈学者要是不认可；我就要开始怀疑我们这个提倡有没有漏洞和破绽了？刚才孙慰祖老师和曹锦炎老师的发言，也基本上对这个新设定的学术方向，没有太大的异议。几位资深学者，只是在不断善意地提醒我们，要把握好“大印学”这个概念的度，比如说它的本位在哪里？它对西泠印社新发展会有什么含义？它与已经提了近二十年的“重振金石学”有什么内在联系？它的开拓性创新性又是在哪里？

当然，刚才有好几位学者，从刘昌玉开始一直到戴家妙，包括许雄志老师的发言，甚至还有一个更大的构想：要让西泠印社编一套囊括天下所有私家藏印的印谱，这个构想可是不得了。想想投入到这个构想中去，我们可能要忙活20年（笑）。因为这个里面包括大量藏品的真伪鉴别，还有收藏的来源的梳理，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西泠印社这20年来的历程，就是不断勇于接受挑战的过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四平八稳、稳稳当地做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但是我们仍然不断在寻找新的挑战机遇。为什么？

这次的会议，我们第一请了一批学有专攻的专家；第

二是我们对会前的讨论材料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讨论题目就涉及了几个方向。当时对我们的创研处、信息处，社刊编辑部的同志，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我们现在刚提的“大印学”学术概念，有清晰的目标和指向性，但还不很完整；“大印学”只是一个基于实践成果而自然产生的构想，它离完善还差得很远。但是，你要提“大印学”，别人就首先要问：你的“小印学”在哪里？精致的、非常精准的“印学”在哪里？你现在的“大印学”跟原来精准的“传统印学”之间，差距、差异在哪里？

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解答不了，兴师动众把大家找来开会，忽悠一个新概念，没多大意思。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的《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闭幕式·会议总结》第一次提到的“大印学”的讲话，先把这个《会议总结》让编辑部的同事整理好，今天将原文提供出来，作为一个讨论、检验的文本基础。

第二个，我就特别强调，要把我们20年以来所开过的每一年的印学峰会、各个专题学术研讨会的所有《目录》都排出来。因为只有把从2004年至2020年这17年西泠印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总目录排出来了以后，才会有一个整体的审视与把握。如果只看最近5年，我们在做的似乎都不是“传统印学”的东西，都是比如“世界图纹与印记”“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印谱史”“金石全形拓”等，都不是做过去传统模式的印人、印作、印派的研究。但是如果你把它拉长到20年，主流当然还是“传统印学”，并没有说我们是要“转向”，无非是时间拉长了以

后，我们会看到不间断地有一个学术上的间歇和节奏的起伏。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可以不断找到新的探索方向。比如把“世界图纹与印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研讨会开起来，我们也感觉很有成就感，它意味着接受了印学领域中新的时代挑战。

我在那一次的总结里曾经提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做“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学术研讨会时，对征稿、评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经验。当时首先就是想到要找这方面的专家，后来联系上了在座的刘昌玉，及另外几位专家。那时我们其实非常担心。因为其实这一行的知识，我们也没有积累储存多少。我们现在搞印学的，谁懂“亚述学”？谁懂古波斯、埃及叙利亚的语言、文字、历史？谁懂两河流域里的滚筒印？因此当时在推进之前的决策拍板，其实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我当时与社务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包括王宏伟副书记、秦陶副主任，还有前任的书记、主任，在一起交流商量，在自问：西泠印社敢不敢冒这个险？

当然，冒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研究这个课题的论文写作者、教授、相关著作在哪里？哪些人有能力研究这个东西？那是寸步难行的。

第二个问题：即使论文交给我们了，其中有没有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对它有没有判断力？这又是一个没有能力把握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拿出来一些获奖入选论文，都是有很多明显错误的，到时候如果这一行的专家一看：你们完全不懂？闹学术笑话？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开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预计当时是60人规模。但如果只有10至15篇文章怎么办？这研讨会还开不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咬紧牙关，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实在不行，如果连论文也征集不上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向谁去征集论文），或者论文数量严重不够，如果这些问题短时间内都无法跨越。我们最多就改变一下，开个小型专题座谈会。先有个学术上的铺垫。但是，要拓展印学领域，走向“大印学”，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就像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当年要搞改革开放时，许多革命时代的老领导干部都反对。但是他说，我们不争论，看准了，就义无反顾往前走。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时代（包括学术）才会进步。所以在这五年

以来，我们的确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心胸、视野开阔了。第一次“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收到了80多篇论文，第二次的“世界图纹与印记”研讨会评审是近100篇投稿论文，在人数及学术上慢慢地变得非常稳定。在域外印章研究领域也非行家，一知半解而已。但总是觉得西泠印社“百年名社”，必须在学术上、在创作上都要保持这样的引领式活力。也许某一天我们可能出招出错了，哪一年的研讨会开不起来了，大家也别见怪，科学研究99次失败才可能1次成功。所以，只要认真负责，严肃对待，即使失败了也应该被容忍。我们现在在西泠印社工作的同志，心态一定要开放，要不断往前走，并且要尽可能走得理性、走得客观。

这样一来，近5年的积累，慢慢地开始生根开花了。也正好是那一次，我记得是孙洵和林乾良两位老先生也都在座，其他年轻的作者也有不少。当时我就忽然想道：其实在这里应该要提出一个超越于我们原来传统概念中专注于介绍印人、印谱、印作，然后做一些考证的研究模型。要超越那样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不光是寄希望于个别一两篇杰出的论文，更要着眼于推进整个印学界的发展、它的观念和风气。刚才徐清老师讲：关键还是要“超越”。如果我们还是懒惰地躺在那儿，后代人会说我们是“笨子孙”——两三代以前的前辈、老师已经在这样做了，你们现在还是这样做，太没想象力了。但是要不要做传统经典？当然还是要做。但不能仅仅就是原来那个现成模型，而是要有一系列新的模型并行于已有模型。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基于这样的思路，然后就开始想，这个“印学”在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做？已有的“篆刻学”“印学”是根基，不可动摇。于是就想到：因为我们五年来做了很多新的课题，其实都和传统“印学”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又不是传统认知中熟悉的“印学”本身，它的范围扩大了，外延扩大了，但内核并没有变。因为西泠印社的印学与社史研究室是孙慰祖老师和黄镇中老师两位在负责，艺术创研处是丁竹英处长等人在管，还有社刊编辑部，秦陶副主任在管，解旬灵等一班同志做具体工作。所以就先征求他们意见，意见取得高度一致以后，就开始坚定不移地推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外面看我们挺热闹时，其实我们在心里是很纠结的。到底做还是不做？做了失败了怎么办？自身心里完全没底，不知道作者在哪里？课题在哪里？但是当

时孙老师、黄老师，还有艺术创研处、秦主任等，非常积极地推动。又因为我们正好有社刊，有一个相对强的工作班子，还有社务委员会龚、王二位领导的全力支持，对这件事做出了全力推动。

这样，就开始有了“大印学”概念的雏形。“大印学”概念在提出来以后，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竖一面旗帜，或者立一个江湖的山头，而是真正觉得它对于这个时代的印学研究是有帮助有推动的。帮助在哪里？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过去20年以来，我们书法篆刻获一等奖的作者经常被人问及：在书法界里，如果你获得一等奖，你的论文能不能进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学报》？能不能进入国家社会科学院相关院所的专家视野之中？在它的那个盘子里，重不重视你们印学的成果？但是过去我们写的普及式的篆刻史、篆刻学，写的很多印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东西，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因为水平太低。我在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工作，能感受到拿一本以前老先生写的篆刻史、篆刻学专著给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老先生看，他看后笑了：你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没入门。也就是他根本瞧不上，觉得你在史学的学术规范上完全不合格，连基础都没有。这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刺激，因为浙江大学的论文是文史哲的教授在一起开会评审的，你不能说自己是学艺术的，就可以不按规则走。你的论文要通过他们的评审，他说你不行，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完全没有历史的概念，你也只能听着，因为这方面他才是权威。所以我慢慢地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提出一个通行的清晰标准。徐清和林如在读博士时，我们在教学上提出来的要求就是：你的博士论文能不能和哲学系、历史系的博士论文相提并论，把它们混在一堆里，要让别人看不出这是艺术研究所的博士论文；你的文献的运用方式，逻辑推演的方式，选题的方式，完全能够混在它们里面不落后，至少要平起平坐。后来我们艺术研究所的老师评职称交论文，也是这样的标准。但当时提的比较多的是书法和绘画论文，后来就想到了印学。印学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高水平标准，不能只是常识介绍和知识普及。

坦率地说，我觉得这10年里面，我们中国当代的印学研究已经不比别人低了。这次孙慰祖老师还获了兰亭奖的金奖。评选兰亭奖时，是所有的书法、篆刻成果都是放在一起评的，最后是篆刻在前面拿奖，这就证明：至少横向

比起来，我们印学能不能超过别人暂且不说，但是至少不逊色。所以我觉得这是西泠印社这20年以来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努力。

至于“大印学”的提出，其实它以前是有不少积累的。我们在这里稍稍做了一下前置性的学术准备。我们过去的“传统印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了今天，我们在讲的“大印学”对传统的概念有哪些坚守和保留？还有哪些超越？其实这个方面原来我是有一点想法的。也就是说“大印学”的根基，一定也只能是“传统印学”，这个毋庸置疑，毫不动摇。我们这几年做的这几个专场，包括“印谱史”“青铜器传拓”，刚才孙老师说的是“攻城掠地”。其实可能马上又会回到传统印学领域，这是一个工作节奏的问题。

但是回到传统印学不再是传统的旧方式。我们会给出一个符合时代进步、学术发展的新视野、新要求。你同样可以研究“西泠八家”，但是我希望你的题目不是原有的《西泠八家研究》，含糊其词又大包大揽，没有专精的意识。比如列举一些资料、人物介绍再加上作品，然后做一些艺术分析，或者是考证他们的交游、社会地位。这样的模式太陈旧、太老套了。

我们希望要有一些新的定义，但内容还是这个内容，对象还是这个对象。传统印学还是我们的根本，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内容，你在那儿喊“大印学”，别人感觉是否要吹一个忽悠人的大泡泡？其实没多少人当一回事。只有扎根于传统的印学，和传统印学里包括印人、印作及印章的风格形式技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说到“技法”，我最近这段时间深切感受到：关于印学中篆刻的技法和过去制印用的技法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几乎是空缺的。弄来弄去就是故弄玄虚的“用刀十三法”，冲刀法、切刀法，这个其实谁也不明白它讲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原有的印学比较偏向于关注历史的流变，所以对古代的印人，对古代的印谱，对古代的印论会比较关注，对作品比较关注。篆刻技法就可能是一个研究上的“盲点”。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有意识地确定一个研讨会的主题——篆刻技法，甚至于直奔主题——篆刻刀法。看看能引出什么样的成果来？

对于这些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如概念、原则、教条，有时大家也觉得：古人原来讲的我们也不明白是什么，现

在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但其实，“大印学”就要关注这些也许是学术盲点或弱点的东西，即使在传统印学里面它也是盲点。印史不用说了，风格流派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要指出的问题，还包括边款、印谱的流变等。张炜羽关于印谱的文章，我看过好几篇，写得相当不错。所以说这个领域是要有学者去认真积累。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大印学”不光是篆刻还会不会牵涉到印材、印泥、印具（就是工具）等周边的内容？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学术的含量可以供我们发掘，现在还不是太清楚。放在篆刻艺术里，你可以把它做得很边缘。因为一谈印材，你可以说这是工艺美术，跟印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是“大印学”，这些空白的内容可能都会要顾及，至少每一个领域里面要有两三个代表性专家。比如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一谈印泥史就能谈得头头是道。印泥史的内容关联，甚至和刚才曹锦炎老师提到的古代宋画里钤盖的印章也可联系得上。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宋代的“水印”和“蜜印”到底是怎么做成功的？是什么样式，用在哪儿？有什么案例？其实到现在为止，看到的都是文字记载和传说，还没有人对它做过一个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个就是传统印学的部分。

“大印学”的内围，就是学科里面的东西、内向的东西，它其实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同样是印章本体的概念。但是它不限于中国传统，以《说文》、“六书”、篆书为应用基准的这样一种印章观。我们前面提到的“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甚至比如说西夏的、契丹的、满蒙维藏文字可不可以入印？古代八思巴文字入印、藏文印、满文的乾隆御玺，都已经先例了。再往外推开去，西域的，包括欧洲的英德法俄文字字母可不可以入印？其实都是“大印学”带来的问题。

如果篆刻是一个高端的、通用于所有人文领域的艺术，那么在逻辑上，如上面提到的各类文字入印就应该都可以实现。我今天让许雄志老师帮我刻一方英文印，要有像传统的印学一样的高明手段，英文印混到秦汉印谱里一点都看不出是另类，但仔细一看，它的要素还是英文，能不能实现？

我们需要往前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我到欧洲去的时候，看了他们的徽章，就会有应该把它引进印章篆刻的感觉。意大利的家族族徽，全都是符号，有的被做成徽章、领章、袖章，变

成了工艺品。族徽的这个符号，和我们中国商代族徽的功能，在社会形制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它能不能成为印章？可以试一试。这个部分是一个可以尽情开拓的新内容。而且我们希望它能被做出来。比如我刚才举例说，请许雄志老师来试试看，其实我们以前请青年篆刻家们试过：我要你刻出来的印章，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或是古波斯、古埃及古罗马的文字，但是你的篆刻作品最后的表达方式，则必须是传统的，别弄成工艺美术。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拓展。

现在的篆刻艺术跟书法有还存在一个相似的比较大且长期的问题。现在的书法都是手书书写的，碑学虽然是刻的，但是要求使笔如刀，以刀释笔。古代的印章，铸铜、铸铁、嵌玉、玛瑙、水晶、象牙、琉璃、兽骨、木印等都有，今天大印学有没有可能在印章的印材方面，就是在“非石材印材”方面有所拓展？其实这种拓展已经有了，原来初有印章的时候，三枚商玺，虽然现在大家都还有争论，那个时候的印章有没有甲骨文的？但其实若干年以前，在座的林尔老师也许已经在做“大印学”了。大家在忙浙派，在忙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的时候，他已经在坚持刻甲骨文印。民国以前哪有甲骨文进入印章的？它是个什么样的模样？不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吗？所以我在想：“大印学”的新格局中，我们对于印章的应用方面（文字运用和印材运用）也会有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拓展的意思，就是说“大印学”中的印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能。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开放又理性的观念和思想。你看着印章，你准备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愿意怎么想？

有内向的想象，就有外向的想象。那么外向是什么？大概就是刚才说的“攻城掠地”。比如把“金石学”拿进来，引出“铸金”的概念：古代的印章不就是铸的？铸铜、铸铁等都有。无非是我们今天习惯于刻石头，大家不去做“铸印”。其实我周边有几个篆刻家就专门做铜印，地道的铜印。当代搞创作的人里面，有好几个做铜印都做得非常地道，而且他们所铸铜印的印面绝对不亚于有名的篆刻家石刻（石印）的印面艺术效果。那就是说，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做实践而且卓有成效了。

再者是传拓，我们现在在讲的“大印学”里面，其实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博大。第一，在正确使用文字的基础

之上，包括碑碣墓志、明清刻帖，是不是也都是刻的？比如《淳化阁帖》说是刻板，但到了《大观帖》以后，也是在石头上刻出来的。其实“刻”这个字的定义，只表明它不是“写”的，你别把它当传统书写的书法，它就是“刻”，与篆刻同技。“刻”完了以后的复制过程就是“拓”，墨拓也好，朱拓也好，都是“拓”。所以这个部分篆刻的所谓的“印”，包括铃印、盖印、印蜕，都是“印”。

我们的“大印学”其实无非是把印章、篆刻创作里面的一些局部的技术环节，把一些局部的东西，和大学术联系起来而已。你现在看印章，边款也是要“拓”的，你就可以想象人家的丰碑巨额是怎么“拓”的。甚至还有，最近西泠印社的确是在做大拓展的事情。比如砚铭文化，铭刻墨拓施于砚石。山东淄博的“淄砚”找到西泠印社，我们发动社员搞砚铭创作，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项目在实践中，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和挑战，是镌刻的工匠技艺，“淄砚”除了代表人物常宗林以外，水平高的极少。然后一方方横的砚石石刻，按照刻帖的方式把它刻出来，刻完以后，如果拓的人水平很差，那还是站不住。像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努力倡导“碑帖学”“金石学”“传拓学”的本义，是提供给篆刻艺术家进行启发性思考和大胆尝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宁波有位篆刻家叫张亦辰，他可以把整篇《毛公鼎》的铭文刻在印石边款上，很小很细的一个边款，这样又懂刻拓又精篆刻的社员还有很多，水平高得让人钦佩。

也就是说，没提“大印学”概念以前，其实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与好奇之士在做各种铸铜印、铸金印，刻石碑、刻淄砚，拓青铜器全形拓，拓金文铭文再把它复制到印章边款上去，等等。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其实很多有才情的人都在尝试着做。这个时候我们西泠印社如果没有反应，就太迟钝了。我们这里号称是精英荟萃之地，但如果我们一点都没反应，对这些新现象都冷漠置之不理，首先就显得太顽固保守了。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认知与判断的前提：鼓励试新，鼓励面向未来大胆探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印学”如果从文献的角度说，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古诗文学，这些都是根本。我记得很早的一次研讨会，徐清老师有一篇关于《篆刻文献学》的论文。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老先生特别肯定，说你们这个年轻人徐清很好，把“篆刻文献学”的提法

提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些包括古文辞的学问、古器物的学问等，其实都是在“大印学”范围里，它要成为今后当代学术的一个增长点。

以前我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今天忽然想到曹锦炎老师在讲的宋代的宋画里面的鉴藏印章，那个当然都是宋代的。但到了明代像《飞鸿堂印谱》这样的用篆，它在那时候，都用的是“传抄古文字”，类于花体杂篆又是文人随意变古字的方式。对元明以来“传抄古文字”现象，我们大家都看不起。但怎样去看待它呢？小时候学篆刻，老先生告诫说，千万不要去找《六书通》，那个东西是全部不对的。所以我们大家篆刻界中人都很鄙视《六书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需的学术立场。

我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和一部分同学在讨论金文书法创作中的用字问题。我就在想：《六书通》真的就那么“垃圾”吗？如果你站在否定“传抄古文字”的正统立场上来说，它当然一无可取。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存在的现象来看，《六书通》不就是那个曾经在民间流行的东西吗？你完全可以把“垃圾”变成金子，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混乱芜杂，为什么异类？在战国时期的文字学研究中，“战国文字异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为什么六国文字可以“异形”，后来的《六书通》异形就不可以？其中有什么规律在起作用？

我当时就跟几个研究金文大篆的同学说：你们这样的学习，第一个先找一下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还有容庚的《金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里面就是讲六国古文的。六国古文（秦籀文）是没有明确严格的“六书”规范的，但用《说文解字》去统驭它，以与今天的小篆对接。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特别提道：王福庵、罗振玉、章太炎、黄宾虹等在写小篆作品时，都可以是唐诗、宋词或者他自己撰写的对联、文章。但一到金文大篆，却全是金文的拓片的临摹，如临某某鼎、某某盘、某某敦等，这一代的大家没有一个是用金文（六国古文）来写唐诗、宋词、汉文章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又有趣的现象？

当然是因为金文大篆的“六国古文字”相对于后来的秦篆“六书”不那么规范，所以我们当时就先取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每个字的字头（部首）要求背

熟，篆字字头下面，有个“古文”条目是被特别注出来的，要学员把那儿的“古文”文字摹截整理出来，再和后来的宋代以后“传抄古文字”再来对照一下，寻找其间的规则。然后再找到元明以后类似《六书通》这样的所谓“生造古文字”，把这些内容都串起来，找到因果，你甚至能知道为什么明清的比如说像《飞鸿堂印谱》里面有那么多杜撰的篆字，它们是怎么来的。你说它不好很容易，但如果真去研究它是怎么来的，给它溯溯源，看看某一个字虽是荒谬，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六国古文字”本身就是不规范的，“战国古文字异形”，古时大家都随性写的，以后这“六国文字”为什么又会变成宋代的“传抄古文字”或“描摹古文字”在我们的宋画鉴藏印里冒出来？像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印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大印学”里未来可否有一个古文字学的目标？除了精通《说文》以外，有没有办法把“六国古文”也像《说文》对秦篆一样，也来做一下梳理？曹锦炎老师是古文字专家，从“六国古文异形”到秦篆的演进，再从“六国古文异形”到唐宋元以后的“传抄古文字”现象，如果都来做一下梳理的话，我们有很多刻古玺印、刻大篆的印家，也许运用这些古文字不同类型，马上就能找出一些运用规律来建立新规则也未可知。所以我在想：这是“大印学”在当时被提出之前，比如“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还有“印谱史”“金石拓拓”等创新的成功实践，使我们自己传统印学项目里面，有了注入新内容新形式的可能性。

西泠印社在2004年就开始提出两个对应新时代又衔接旧传统的口号。因为原来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我们就在老前辈们提出的经典口号上，增加（融进）了新时代的痕迹。

第一是“保存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博物馆，收藏家可以“保存”金石，有很多人投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博物馆，所以那个时候的“保存”“抢救”金石的功能在现在是被慢慢淡化了。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沙孟海先生当年就说过：“保存金石”，今后我们文物都是国家的，不能买卖，是禁区，所以“保存金石”的任务只能是由文管会博物馆来做，西泠印社今后不能再去致力于“保存金石”了。我当时一听，想想也的确是这个道理。那么“保存金石”的宗旨今后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在2004年百年社庆后提出来，就把它变成“重振金石学”——重振以马

衡、陈伯衡为代表的现代金石学学科建设式的学问。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文物交易已经开放了。因为在1993年，国家已明确规定《文物保护法》里禁止文物买卖的这个条款可以被取消。所以其实金石文物已经可以进入市场，而且市场其实已经发育得非常好了。但我们还是坚持“重振金石学”。“保存金石”是创社时的先贤宗旨，“重振金石学”是承传这一宗旨后在新时期的新阐述、新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对社务运作，是走“综合”的道路，对社员个人修为而言，是“兼能”。百年社庆时提出的两个目标，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大印学”在这个时候适时提出，如果能够取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做成一个继当时的“重振金石学”以后更高阶段的新概念，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社务又有本质的、符合时代的提升和进步。“重振金石学”再怎么“振”，总不见得会全部“振”到篆刻中去。在金石学格局中，印学是一个小分支，尤其是篆刻创作，逻辑上说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如果是“大印学”，就有可能包罗万象，以篆刻印学为核心，同时兼容各相关学科领域。

“大印学”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切合当下的发展思路，每个历史阶段，都设定相应的发展目标。

第一个，是推进“砚铭文化”。这段时间（近几年里面），我们和山东的淄砚创作艺术家合作，在座大部分搞创作的作者，可能都受过淄博方面的邀请，已经连续三年了。西泠印社创作类的社员和山东艺术家有关于淄砚砚铭的合作，一开始是“习近平用语”主题，这一次是讲“建党100周年”主题，每年一个主题。社员负责书写铭文，而我们也关注他们的质量：镌刻的水平到底如何？别弄得像电脑刻字一样，全是平面、“死”的。不过，淄博方面是“术业有专攻”，出来的东西我看也相当不错。他们现在连接西泠印社，又在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里，已经成为非常大的品牌。很多人都想找他们合作，地方政府也支持，因为也看到这个品牌的价值了。所以现在他们有专业的刻工与拓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水平甚至超越了部分江浙一带拓工。淄砚砚铭的拓工水平，已经非常专业化了，成为“一条龙”的分工合作模式。这是我们西泠印社在“重振金石学”旗帜下提倡砚铭文化。

第二个，是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去年做的《“金相椎痕”青铜器的全形拓大展》，也是传拓尤其是“全形拓”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费劲费力，克服困难，最后做得很成功，非常好。主要是因为从嘉德拍卖、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各大图书馆比如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都借了藏品来，外面不太容易看得到的珍品在此集中。我们自己认为，最终至少做到了百分之八十的满意度。关于青铜器的“全形拓”的产业市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今天有很多懂全形拓的年轻人，在网上一个月卖2、3张拓片，月收入就能有万元以上，已经可以活得非常小康了。而且这一行业的自主就业、形成产业链的规模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当时倡导“全形拓”时的想象程度。

现在大家都知道，青铜器的“全形拓”是濒临绝境的“绝艺”，很难得、很宝贵，也很具有价值，书法家、文人雅士都很需要也很喜欢。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找孙慰祖老师、许雄志老师、林乾良老师、戴家妙老师换题跋，如：我给你三张拓片，你帮我免费题一张，两张留给你。背后意思就是，我这个拓片也很值钱，我请你题一张，不向你付酬，送你两张拓片就两清了。这个产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趋向成熟。坦率地说，当年如果没有西泠印社在倡导青铜器“全形拓”，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拓片价值直升，现在也不会是这个局面。所以他们这些做拓片生意的，对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非常关注。因为依靠跟上倡导的节奏，日子可以过得很好，而如果没有形成风气，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价值。

第三个，是我们倡导全社在做的，也是“大印学”的一部分，是“拓片题跋”。

十几年以前，我在看很多精彩的拓片被乱题跋时，是非常心痛的。糟糕的题跋书法，简直是在糟蹋拓片。好好的拓片本身非常有价值，往上一题就没法看了。其实题跋里面有很多以前老一辈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行规”。比如说它的书法，不能是我们普通的书法创作家来写题跋。你写得张牙舞爪、喧宾夺主，你的题跋比拓片还要再醒目、还要抢眼，大家就会觉得你不懂这一行。所有的拓片题跋，一定是要突出“拓”的魅力，而“题”的部分只能作为附属。题跋必须具备较高的书法的水平、文史考证的水平、做古汉语文章的水平（你总不能在这里题白话文上去吧）、美术史知识的水平。拓片上的构图：哪里是留空白？哪里

是要重点突出作提示？我当时在《“金相椎痕”展览图册》的序言中举了拓片题跋的“题跋五功说”，即有五个规则必须遵守：书法典雅，文辞醇正，史证切实，形式美观，伦常有序。

这也是“大印学”的拓展所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古代的学者，一直到近代陈介祺、刘喜海、吴大澂这一代，他们在拓片上题跋时，是非常讲究伦常次序的。比如一件拓片里有几段前贤题跋，上面有沙孟海先生的题跋。如果藏家再让我帮忙题一下，我要是没修养不懂行，我就会在沙孟海先生书跋上面题一大堆，突出自己，但遇上懂行的一看：你没修养，不懂伦常。有悖伦理纲常，比写错字还要丢脸。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在作题的时候，如果这里已经沙孟海先生题跋，我题时一定要低他半格，甚至再低一点。然后尽量题的字数不要和沙老并列、更不能超过他（学问考证需要除外）。这些都是原来的规则。早先在上海的时候，老先生教过我：你记得题跋这个东西，这个伦常必须要严守。如果说你把前辈、老师压住，在上面肆无忌惮、张牙舞爪地乱题，别人一定会说这家伙毫无修养，根本没有传统文化的素养，是要被人鄙视、看不起的。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一般大众，题跋的风气是出来了，但是题跋的质量和这些规矩，当下有多少人懂？我们希望慢慢地通过推动拓片题跋风气，来倡导这个“题跋五功说”。

第四个，是“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西泠印社早期四位创始人中，吴隐和叶铭，最初都是“刻碑”“拓碑”出身，后来转向印学和刻印。所以，恢复“镌刻”“传拓”技艺，也是在恢复西泠的老传统。尤其是在现代摄影术照相术和制版、印刷技术高度发达时代，图像复制依赖“镌刻”“传拓”的旧做法已经被时代淘汰，其技艺也逐渐失传。20年前，我曾在山东临沂策划组织过一部三千石的古代尺牍书札的石刻刻帖，对古代“镌刻”“墨拓”技术有过较深入的追究。至于今天的篆刻艺术，石上刻印，同于碑版字迹图像之镌刻技术，而边款拓制也相当于碑志传拓的缩微版，它们之间也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争。在今后，我们也会对这门传统“绝学”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和时间。

这样的话，“大印学”因为内容丰富，构成广泛，开始在传统印学的核心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大体

格。今天这个《总结》里，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20年前治社的思想转换过程。又在本次“大印学”《会议手册》中，编印了从2004年开始的研讨会的所有总目录，这里面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大印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它的视角的问题。

王宏伟副书记是力推“大印学”的，当时印学峰会的“学术总结”阶段，他全程在场听了。事后他说，陈老师要不你再写一篇完整的“大印学”的论文？我说，我现在写论文就是总结里所提到的这点认识水平，所以我应该要听完大家的会议发言以后，才能考虑这个文章究竟怎么写。我认为，不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一个人想来想去，也就这些东西。但光是一个《会议总结》，它只是冒出来一种见解，重复这个总结的观点，还是很不够的。

但是，我们今天提“大印学”其实应该有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印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像我们刚才在说：你写的书法史论文，敢不敢和人家专门研究秦汉史、隋唐史宋元史或户籍史兵制史、农桑史、科举史的学位论文去比比看？你的文献和逻辑演绎有没有人家好？横向的就要和这些顶级的学术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比。

那么我们现在的“大印学”，首先就是印学和篆刻艺术学科研究的需要。学科建设是中心，这就是刚才孙慰祖老师也提到的，今天这个会好像是一个“印学学科建设”的会议。就是说，一定要讲究它的“科学性”、逻辑性，讲究它严格的学术分类，包括界定出它的核心和边界，这个要靠大家一起来做。不仅如此，还要关心在将来它会是 个什么东西？在哪些地方应该是可以突破的？哪些地方是必须坚守的？

“大印学”被提出来一共会有三个动机，三个比较基准。

“学科建设”是第一个基准目标，最重要的是希望“印学”不被别的学科“矮化”。不能被认为我们看看古印章真伪行，做刻印工匠行，但做学问不行。这口气我是咽不下来，我们必须要有“学科建设”这个立身之本，要做得非常严谨。

第二个基准目标，就不完全是“学科建设”，它和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有关联。我们总得要往前走，所以西

泠印社的百年已经做过哪些？还有哪些没有做？我们准备将来要做哪些？选择将来哪几个项目来做的依据是什么？在逻辑上成不成立？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二个需求。有时在第二个西泠印社百年发展的推进过程中间，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完全符合“学科”规律的。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它可能不大科学，但它是社团发展、印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会是完全离谱和不科学的。只是说也许它有时可能不是急需的，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有意打擦边球。为了“印学”的核心，在西泠印社的格局中，它的边缘在哪里？它的交集在哪里？它的每一个概念的重合度在哪里？它的分类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大印学”立足的要点，是依据我们的社务发展的需要而确立的。百年名社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这些老前辈在这里，启功老、赵朴初老一直到饶宗颐先生，宗师级人物云集，的确是不能太马虎，要对得起他们。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学科”本身必须讲科学性，第二个是“社务”发展的需要，它会考虑随机的时代需要。有的时候，时代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不未必重合，但是也要认真去做。

第三个基准目标，是要和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发展相一致。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域外印章”研究？当时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正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就在提“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构想。“一带一路”的沿线就是存在着刚才刘昌玉第一个发言时说的各种各样的滚印、筒印最多的地方，从中亚、中东地区一直伸展向西方。如果西泠印社的“印学”和我们社务的运作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完全挂不上钩，那就完全不会有丝毫社会影响力。你们就几个高人在孤山自己玩玩就可以了，对国家、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无关痛痒。原来的西泠印社就是这么在玩，自娱自乐，所以很难引起社会、业界、政府重视。

当然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去迎合各种各样高调的宣传口号。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在学术立场上来看，如果能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一带一路”有交集的内容，可以创新拓展，篆刻创作有用武之地，为什么要有意冷漠而不介入呢？所以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活动，但是到后来又忙得一直没时间推进，就是以“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地区城市作为我们篆刻创作的题材，当时甚至和商务部、发改委几个相关的司长都聊过。如果真的有一批顶级的篆刻家投入，将会如何？我说，西泠印社的篆刻家毫无疑问肯

定是顶级的。但是我们如果来做“一带一路”的篆刻巡回展，这些部委各级领导马上就会觉得，篆刻跟我的任务及国家的工作好像有关，而且我能拿这个艺术来宣传、推广“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新鲜的品牌。

西泠印社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得到国家的支持。我们当然也需要在保持独立艺术立场的同时，睁眼看一看整个国家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包括中亚也好，南亚也好，中东也好，包括汉字文化圈的日韩也好，甚至包括欧美也好，我觉得其实都应该是我们“大印学”的视野。关于这个视野，前辈大家们已经对我们有过教导。饶宗颐先生提出“东学西渐”，他是懂七国文字的人，他的学问当时在国内已经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了。他说，100年以前是“西学东渐”，我们贫穷落后，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西方的文明才是文明，我们就是不行。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文化开始对外要产生影响了，希望西泠印社带个头，做“东学西渐”的模范。当时在饶府，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翁部长与我两个人都在座，饶宗颐先生就指着我们说这番话。我表态说行，我们一定回去试试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印学”，其中有那么多的“域外印章”主题，有那么多“图形印章”主题，有那么多“非汉字系统印章”主题，有那么多“世界图纹印记”主题……孙慰祖老师说是“攻城掠地”，其实在这背后，是饶宗颐先生他们用“鞭子”在抽着督促我们，让我们必须往前走、往外走。那往外怎么走呢？往外走，就是中国的印章要影响出去。可是你如果不了解别人历史上的印章、不交流，中国的印章篆刻艺术要出去自说自话，还是不行。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印学”中的几年持续关注“域外”与“世界”命题，是一个比较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然在五年以前（2016年）我们在做“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时候，并没对大家挑明说。为什么没对大家说？因为当时研讨会开不开得起来都是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通过“大印学”提出来，可以把这个方面的努力跟大家交个底了。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希望。

我最后大概想要说的是，“大印学”对我们现在西泠印社的发展来说，其实更应该是一种“科研”。我们要准备好它可能会失败，任何一个“科研”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马上成功的。准备好它会失败，但坚持不懈，百折不

挠，反复推进，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这样。但是它对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来说，就是一种引领。引领是什么呢？大家做传统印学研究都还忙不过来时，我们突然来提“图形印”“域外印章”，包含了哪些意思？西泠印社百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正是因为别人在一个传统旧领域里认为做得已经很费劲的时候，西泠印社却早已经站在前面，要往前引导而先行了。

我们希望西泠印社对全国“印学”学术研究的引领和拓展，能够在当代起一些积极的作用。当然，从我们自己这代人，比如我、孙慰祖老师、曹锦炎老师等，包括今天在座的年轻一代学者，都是负有同样使命的人。我们这些人想做出的努力，是在“印学”这个层面上不断地去探知“未知世界”。大部分刻印章的同行，都是沉浸在已知世界“乐不思蜀”，认为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不能掌握的东西就没兴趣。这是一般人的常态，很正常。但我们特别希望西泠印社中的杰出之士、卓越之士，能够同心协力去探索我们所不知道的陌生的“未知世界”。只有这样，西泠印社才能生生不息。

不断探寻“未知世界”，是百年西泠印社，也是我们“大印学”设定的根本目标。

2021年5月5日据录音记录改定



印学的“小”与“大”

文 / 孙慰祖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是一个研讨学科建设的会议，具体各个研究方向的问题，三个小时的会议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让曹锦炎教授谈古文字研究现状，要给他几天时间；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对“印学”这个概念，我们当下如何刷新认识。

过去我们大多讨论的是“篆刻学”。后来延伸出来许多问题，需要以“印学”的概念来涵盖，把外延扩大了。几十年间研究的深化、拓展，推动了新的定义。我在80年代末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印学相比于书学和画学不景气的多，因为宋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一是利用玺印的史料考证经史，零碎的很；另外就是把它看成是“游于艺”的东西。我在文博界，一直感觉到我们自己认定这个学科，要在学术之林中站得住才行。在座的曹锦炎先生，应该知道过去其他学界如何看篆刻家的“印学”。2008年印学研讨会筹备期间，我打电话给王人聪和叶其峰两位先生，我们彼此熟悉，恳切邀请，希望二位前辈来做个主旨演讲，给社内研究者做一些学理、方法的引导。在电话中，两位几乎都对此有点诧异，具体的话我不说了。最后，二位当然还是来了。王人聪先生会后还在上海就学术规范讲了“帐一定要算清”的问题，我请学生记录后整理发表在社刊上。这次电话我很受触动：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印学，外界的认识与我们是存在差异的。学科的一些基本东西——印学研究对象，任务还有边界在那里，并没有形成定义和共识。

西泠印社的文化骨架是什么？前面几位先生讲的都或多或少触及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技道并进，技道相融。这与莫小不教授讲的“学”科和“术”科，义理相同。

“术”也很重要，这个是不用说的，当然发展还并不充分；在“学”这一点上，由于是“幼稚学科”，这几十年来提升和推广的成效是明显的。学术队伍，研究成果、社会认同，这些可以说都取得很大推进。因此，近一、二十年研究实践不断发展、深化的当下，我们对这个学科展开了比过去更明确、更宽阔的思路，今天的“大印学”命题，实际上是对学科研究对象、外延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所以十分重要。

最近一、二十年，我们有点“攻城掠地”的味道，研究领域大为开拓。其实，相互渗透、交叉和分工细化，都是当代学科发展的普遍趋势。不说其他，就说玺印文字、古文字学在研究，印学也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两方面又有不同侧重。古代职官、历史地理，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任务，但印章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印学的参与具有专业优势和专业方法，比如鉴别、断代，文字的释读等等。我想，“大印学”概念的强调，是顺应这个趋势的。

印学，过去比较内敛。这几十年实践带来现象之一就是“攻城掠地”，就是介入与参与其他专业的一些问题。安思远本《淳化阁帖》确定为“现存最善本”的一个学术支点，就是我们对其北宋收藏印记做出的断代，搞碑刻的人并不认为我是多事，个人的研究目标当然总是有限，但实际上越是投入，就发现和“印”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以我自己的研究而言，对此很有感触。2006年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研讨会上发表有关“近现代篆刻家经济生活”的演讲，傅申先生说是社会学问题，我说是印学问题。因为研究篆刻家群体，不能不联系到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后来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封泥 A 型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封泥 B 型

◎ 西汉闽越国私印封泥



乾官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官黄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居口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气结 崇安城村遗址出土

◎ 闽越国陶瓦文

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演讲，除了涉及玺印、封泥本体的形态研究外，更多是谈印文中发现的历史地理、秦汉职官制度史料的研究梳理。我在演讲中提出，印的研究与价值有“印之为艺”和“印之为学”两方面，又提出研究的“域”应当包括“印之内”与“印之外”，前者重在本体的研究，后者是本体以外的史料学研究。希望史学、古文字学界的同人们，对传统玺印篆刻的价值和研究现状有新的认同，而不是印学研究不守“本分”，假如只是研究印章的本体，比如形制、断代、鉴定、释文还有艺术审美之类，这个印学的价值就比较有限。事实上它的另外一面非常广阔，前面与会者讲到宋画上的印记对书画鉴定的意义，就是一例；而古玺印、封泥文字所蕴含的古代行政地理、官制、军事史、民族关系史、边疆史信息等，而印学如果对此熟视无睹，自限于“术”的范畴，我们就没有信心自立于学术之林。

大，就是一个“域”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存在另一个“自限”，就一直讲咱是“民族独特的艺术”。其实，篆刻是，印章却不是。中土以外有多种不同系统的早期印章，而传统上的印学基本不研究古代东方或者西方印章，这就不能很好地认识自身地位与特质。我本人即是如此。2009年我接受国家外文局任务，做《中华5000年文化》丛书中的中国印章一册，因为要向西方对话，我想也就要将中国的印章、印学放在世界范围内考量，寻绎它们同与不同，于是不得不下力气去做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近年刘昌玉先生在做着这方面深入研究，国内收藏、研究中土以外印章的人也多起来，这表明我们学术的眼界在不断地扩展。前几年西泠印社办域外印章的专题研讨会，参与的文章超出原先的估计。应该说，这是研究触角由内及外的群体性起点。

当然，我们研究基点在“印”和“从印出发”，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是相关性的延伸。印学今天强调的“大”，我理解是这么一个概念。印学仍然是一个小宗，但它的学术框架可以放大。微观的研究需要宏观的学术视野。就学科定位而言，在“印之内”与“印之外”这两个方面，应该有非常好的把握。印学的学术地位与当代价值，在于它在整个时代的精神生产中占有多少真实的份额。

【作者简介】

孙慰祖：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构建“大印学”的几点设想

文 / 林乾良

两个课题，我先讲传拓的这一方面。

古代没有照相术，因此怎么把金石上面的文字传播到世上去？中国人非常聪明的创造了传拓的方法来制作拓片。这门学科我们现在仅知道唐代已经有了。但是比它更早，到底还有没有？是哪一个人？现在还搞不清楚。刚刚讲过，拓片能最好地体现出古物上面的文字与纹饰，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原来的古物没有了。比如说我手里面有一张拓片，是清末名家邹适庐题的汉砖（急就砖）拓片。那个时候我们西泠印社的早期日本社员河井仙郎用500银圆把这块汉急就砖买去，运到日本。但是在日本东京大地震的时候，这一块砖头重新入土，没有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拓片变成这一件重要文物的唯一证据，这是拓片的第二个用处。至于拓片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方才讲到的在拓片上加以题跋。它有两个作用：一些专家把关于这个范围的研究写在拓片上；第二个作用，使拓片上面有记录，这就叫流传有序。至于拓片上再加上名人的书画，就属于艺术范畴了。我这件东西（出示一张四尺宣整张大的巨型汉灶精拓），论文上有记录，但是没有整个公布，也未在展览中出现过。这是一个汉灶，陈汉第先生收藏的，后来送给大金石家董大年先生，上有两家题与印。原物可能没有了，拓片变成唯一的证据。其上还有长篇大论，这是王国维先生在他最得意的做南书房行走的时候，为陈汉第题的。拓片本身就具有文物的功能，而且在拓片上有承载了大量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流传有序。还有书法，甚至可以在拓片和全形拓上加画，并已形成专学。已故西泠印社先贤陈伯衡就是这方面专家。我觉得关于传拓艺术在中国来讲，应该说是有多方面功能的，它不仅仅是承载文物本身。

现在，我再讲关于大印学的事。振濂兄在去年发表了关于大印学的构思，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有个前瞻的眼光，提出一个构思，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两点，在我讲到我的构想之前，我先提出来：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大学科有些内容，我们的前人、老师辈甚至再老的前人，其中的点点滴滴他们也想到了。比如说西泠印社的宗旨，第一个就是“保存金石”。虽然清代周亮工已经有了第一本《印人传》，但是印人的概念还不普遍，一般民间都称印人为金石家，那个概念是模糊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学科本身有它的一个概念，跟相关的许多学科又有种种或者讲得清或者很难讲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提出大印学以后，金石学要就不要了。实际上金石学也是很微妙的，因为它是在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古代文人为研究考古相关资料而提出来的一门学科。包括金属（青铜器）或者石刻、碑刻，因此叫金石。但是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的李济先生等现代考古学家。我们嘉善有一位张天方（张凤）先生，他是正儿八经在法国学考古学的，我认为恐怕老先生里面他是第一人。我以前都以为他跟我老师陆维钊先生是平辈人。后来看到陆先生在他写的，他到嘉兴府学做学生，受嘉善张天方的教导，才知道原来张天方比陆维钊还要长一辈。但是在考古学兴起之前，就叫金石学。现在有了考古学，是不是金石学就不要了呢？我看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每一门学科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衍变过程，也不是说谁包括谁的问题。

下面我就提出一个我自己的体系，我每部分都归纳为四个字。印当然就是篆刻艺术，因此从艺术方面来说，就是“艺兼新旧”。艺术有传统的、有创新的，我认为两者应该相互尊重、并存。不是说有了新东西以后，旧的东西就不行

了。一方白文的“西泠印社”印，是我老师韩登安先生刻的。这方印广泛地在应用。可见，也不能说传统的东西老了、不行了。我认为两者应该并存。创新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尊重，但我们也要观察，也得允许我们评价。比如说有某一个人，他在顺昌做知识青年的时候，我就很看重他。早期他跟我说：“老林，我实际上是吴昌硕的骨子穿齐白石的衣服。”后来他亲友从海外拿了很多印象派的画册回来，他从画里面搞出了一套东西，我也赞成。哪知道他还想进一步，到了北京以后露出了“狼尾巴”。我尊重创新，但是你也得允许人家评价，也许你成功，也许你不一定成功。这里面还有两个分题，一是流派印学，一是印内求印与印外求印。印外求印就与金石有关系，我不展开了。

第二个方面是学，“学贵深广”。印学是一门非常广的学问，包括它的来源、名称、历史、印人、印人传、流派印谱、印论、论印诗等。大家知道，对印章来源我观察了五十几年，论印诗我也收集了四十年，还没有整理。这个是很广泛的，任何一点都能单独成一门学问。我师兄郁重今出的《古代印谱序跋》，我在序文中就提出了印谱学的概念。

第三个方面是“西泠宗旨”。我们西泠印社的宗旨实际上非常正确，“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它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们对于先辈能够提出这么好的一个宗旨，也供我们后人前进的方向，我们真是敬佩不已。之所以我们每年春秋雅集，领导很重视拜祭我们的先辈，正是他们确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了一门艺术跟学问，而这门艺术如今受到了全世界人的爱戴。我的学生里面就有一个法国汉学家，他是欧洲第一个社员。

第四个方面是“立足中国”。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印学也应包括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我们前美院的王伯敏先生很早就提出来，印非汉人独有。少数民族也有印，这也是我们西泠印社的任务。

第五个方面，我们立足中国，还要放眼还要“放眼世界”。我的两个孩子，四个孙子都在国外，故我经常出国探亲。其中也有很多收获，一是宣扬中国文明，二是有机会考察西方的印学。1989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向我孩子讨了50块美金。我说，爸爸从来没向你开口要钱，现在要买一本书，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世界印学专家多米尼克·柯隆编辑的《世界印章七千年》，这是我买过最贵的一本书。经过学习与多次博物馆考察，我在2005年首届“孤山证

印”发表了《中西印文化概论》。中西方印章最早的应用方法都是印在泥上。像中国的封泥，或者叫泥封。中国的封泥装在木匣中，比较小。外国的滚筒印可以周而复始滚过去。例如很大的酒坛，一圈用湿泥巴围起来，用滚筒印连续不断地滚一圈。

“艺兼新旧”“学贵升华”“西泠宗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这是我对构建大印学的设想。我们要把金石学吸收到印里面来，西泠宗旨的首四字即“保存金石”。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人一个赵之谦，一个黄牧甫。赵之谦从石，黄牧甫从金，各创出一条道路来。齐白石主要是研究汉《祀三公山碑》，他的书法跟印章都是从这方面创造出来的，所以有些事前人已经帮我们做了。有些小问题，你研究进去，那就是大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我曾经问我老师沙孟海先生，“西泠八家”是谁提出来的。他说：“林乾良，这个事情我还要考虑一下。”比如说上次来了一个邓万岁（邓尔雅）的后人，到我们印博来办展览。邓尔雅老早不但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来刻印，而且他还用古希腊、巴比伦、楔形文字等文字刻印，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民国就已经做。

大家知道我叫印迷，印迷到底干点啥？我是很辛苦的，就做两样事情。我现在吹个牛，自己认为这两件事世界第一。一个就是集印，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藏印本来就有，古今什么印我都可以收藏。集印什么概念？集印是我出题目，请大家刻这几个字。比如说，我一个集印曾经在当时唯一的印学专刊《篆刻》上发表了三年多。连续发表，每期三四印。同样7个字——“金石刻画臣能为”，因为这句话是我们篆刻家的一个自豪感。我请了很多老前辈和印友，沙老、陆维钊、韩登安、方介堪、钱君匋等，都为我刻过。最早只有四个集印，我现在发展到四十几个。我本身是医学教授，我的茶医学著作翻译成三国外文，中文的不用说了。我也是戏痴，“印迷”“戏痴”，所以刻“戏印”，我也号称第一。刻了300多方京昆戏剧印，出版了《印·京腔昆韵》。刻茶文化印有三套，出版了《茶印千古迷》。我以印章为平台，跟中国的10多种传统文化，如中医、中药、气象、砖瓦、人物、福寿吉祥等结合了一遭。

【作者简介】

林乾良：西泠印社社员。



书画鉴藏印刍论

文 / 曹锦炎

21世纪以来，西泠印社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所致？这应该与西泠印社从21世纪以来一直倡导和坚持实施的学术引领有关。正因为有高屋建瓴式的学术引领，西泠印社的影响才能够不断扩大，这是作为社员的我所深切感受到的。

2008年，陈振濂先生提出“重振金石学”的口号，我当时就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是西泠印社一贯的宗旨，也与我从事的专业有关。我认为，“重振金石学”的提出是新时代落实印社宗旨的突破点。2020年秋季雅集时，陈振濂先生又提出了“大印学”概念，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今天这个座谈会，就是呼应“大印学”概念的提出。以前我们把印学看作是金石学科之下的一个层次，例如在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就已经有人开始对古代玺印加以搜集著录。当时的金石学著作如黄伯思《博古图说》、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及王黼主编的《宣和博古图》等书，都是把印章放到最后，即将印学作为金石学的附录。现在提出的“大印学”，却是将“金石学”置于“大印学”范畴之下。虽然我个人认为“大印学”这一概念非常好，但在理论建树上还需要大家进行思考并付出努力。从这一概念被提出以后，还没有多少呼应的文章。我觉得一个新的学术理论的提出，特别作为西泠印社提出“大印学”这样一个概念，必须在学术上有扎实的理论支撑。我建议《西泠艺丛》组织一批文章，开展讨论，把“大印学”的理论概念牢固树立起来。

去年，陈振濂先生提出应当把碑帖的传拓技术、域外印章、印谱史等研究，都纳入“大印学”概念，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书画鉴藏用印的问题。这些内容刚好跟我在浙大的工作有关，所以想就这方面问题再展开谈谈。

我从事古文字研究，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此前在印学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古玺文字考释。刚才许雄志先生提及，这20年来有大量私家印谱出版，特别是文雅堂和西泠印社合作，出版了一大批玺印著录专书。这些古玺资料的公布后，利用古文字知识考释古玺印，应该说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在古玺印的著录整理方面，我非常赞同许雄志先生的意见，2019年，我们就此事进行过探讨，认为如果由西泠印社牵头，新编、出版一套《古玺集成》印谱，将会大大超过陈介祺《十钟山房印谱》及罗福颐先生《古玺汇编》的影响。而且这个工作也只有西泠印社来做才“名正言顺”。对许多未识古玺文字的考释研究和印谱的整理编辑，毫无疑问是属于“大印学”的范畴。

以前我们研究古文字的人不大关心后世印章，最多讨论到秦印，汉代以下的印章基本不在研究的范围内。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加入了浙江大学张曦书记领衔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浙江文化建设工程第一期），从编辑《宋画全集》开始，我和胡小罕先生就提出，既然要编历代绘画，应该把印章和题跋放进去。后来主编采取了我们的建议，从《元画全集》开始，对每件作品上所有的印章、题跋都进行收录。这样一来，就牵涉到历代鉴藏用印的研究，包括作者姓名印、鉴赏家印及斋堂印、闲章等。



◎ “扶侯家丞”封泥

以前研究印学史也好，篆刻史也好，很少会关注这些书画作品中的鉴藏印，上海博物馆于1987年曾编辑《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后虽另有专著出版，但毕竟做专门研究者不多。经过了这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辑出版工作已接近尾声，收录的鉴藏印十分丰富。因为根据分工，玺印部分的终审由我负责。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鉴藏用印里，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元、明、清的印章，曾大量采用古文字入印。而这些印文中的古文字并非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之学是到了清代才得以发扬光大，在这以前很少见有研究成果。实际上，书画作品鉴藏印中的入印古文字，基本来源于宋代的传抄古文书，以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及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为主。宋代的传抄古文在流传过程中，又被大量收录于明末闵齐伋的《六书通》一书。当时篆刻家大量的入印文字即出自此书。所以对这些印章文字的研究，必须从古文字的源头着手。举个例子，故宫博物院藏马远《十二水图》卷，原为册页，每帧图上皆有南宋时所谓“杨妹子”题写的四字图名，并钤长方形朱文鉴赏印。我们在整理编辑宋画时，发现这几方印章的释文，在已往的著录中（包括几个大名家）都识读错了，将用传抄古文入印的印文“壬午坤宁杨姓之章”误识成“壬申贵妾杨姓之章”或“玉泉贵妾杨姓之章”。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印文用的是传抄古文。随着印章文字及干支年的正确识出，方能认定其为宋宁宗的杨皇后所用之印，这里就涉及作者身份和作品的创作时间问题。有些作者我们虽

知道他的名字，但不完全了解他所用的号。例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有一方“金回山人”名号印钤于作品上，从原印篆文看，“回”字所释不误，因此有关著录（包括搜索引擎）中称徐渭又号“金回”，其实这是误解。因为“雷”字古作“靄”，古文、籀文构形皆从古文“回”，且指雷声，故“回”字可假借为“雷”。而“垒”“靄”二字皆谐“靄”声，例可通假。所以徐渭的印文中是将传抄古文“回”字假借为“靄”而读为“垒”。传世的书画作品中，徐渭的落款有作“金靄（垒）”者，正可为证。上述考证显然超出了一般“印学”的范畴。此外，印章文字除涉及作者姓名字号外，也涉及作品真伪的鉴定。可见书画鉴藏印的识读，不是用简单的“印学”所能囊括。若回过头来思考，这已超越了一方印章文字的简单识读问题，而牵涉到“大印学”概念了。这几年，西泠印社每年举办一个学术主题会议，但从来没有将鉴藏印作为会议主题。我建议适当的时间开一次以鉴藏印为研究主题的讨论会，应该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得到很多新收获。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工作可望今年结束，其积累的大量鉴藏印资料已经做成电子文档。是书主编曾有想法，希望我牵头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所收作品中的全部印章做一个数据库，申报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个数据库的作用牵涉到各个研究层面，好处不言而喻。特别是书画作者本人所用印章，利用确定无疑的标准作品上的真印，将数据库中全部作品上的印章排列在一起，就不难知道哪些印是真，哪些印是假，知道真假以后就上升到这张作品真假的鉴定问题上了。这又牵涉到前几年陈振濂先生提出的鉴赏、鉴定技术问题，当然毫无疑问应归属于“大印学”的范畴之中。

【作者简介】

曹锦炎：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所长。



略论古玺印鉴藏与印谱

文 / 许雄志

各位专家、老师谈的都是一些宏观问题，尤其是在印谱方面，炜羽兄谈得很好，而我个人谈一些微观的话题。关于印谱，众所周知北宋宣和年间的《宣和印谱》和明代《集古印谱》，清代《十钟山房印举》，是印谱史上的三座高峰。我个人认为，研究印谱，自然离不开实物，而我的视角所关注的是古玺印的鉴藏以及古玺印印谱。

刚才子穆兄说的关于古玺印印谱研究，我赞同老兄的观点，肯定应该把封泥和印陶（当然我认为印陶分指两种，一种是印文陶，一种是刻画文陶）这两类一同纳入古玺印谱的范围之内。众所周知，近百年来像周叔弼、吴湖帆、王献唐、岳守勋，还包括香港的林章松和澳门的萧春源等，都有大量的古玺印收藏，也都有自己的藏印印谱行世，而且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做过一个粗略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吉林、四川、河南等地陆续出版的古玺印谱，林林总总有五六十种之多。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翻印的一些清代著名印谱如《十钟山房印举》《齐鲁古印摺》《赫连泉馆古印存》《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对篆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品读着这些印谱中的艺术养分成长的。而后有孙慰祖先生编《上海博物馆藏封泥大系》，以及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吉林大学、湖南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等各馆馆藏古玺印谱的出版，对篆刻艺术界影响巨大。关于国有博物馆馆藏古玺印研究及印谱的汇编整理，在坐的各位都是专家。

我想谈的是，近20年以来，古玺印的收藏进入一个热潮，各地私人藏家对个人藏印的整理、出版、研究以及原

钤本的刊行，从藏家个体数量上和收藏古玺印总量上，已经不逊于古人。我做过一些粗略的统计，比如陕西、北京、河北、河南、湖南、山东、广东、浙江、湖北、内蒙古、广西、天津、上海、江苏、安徽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等地的藏家至少有七八十家，其藏品数量少则近百枚，多的上千枚。

2019年，我和曹锦炎先生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非国有博物馆开馆时，又结识了一批古玺印收藏家与研究者。在研讨会上，我表达了一个愿望，如果有可能，利用西泠印社的资源 and 影响，编辑出版一套民间和非国有博物馆的《藏印大系》，每位藏家少则几十方多到几百上千方，或者若干藏家的藏印合成一集。这部《大系》中的藏量，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古玺印收藏的总量，把这些古玺印集结编制成谱发行，嘉惠印坛学林，其意义不亚于古代的《十钟山房印举》和《集古印谱》。

这项工程，可以用十年的时间来做编辑周期，编成一本出版一本。而论及领衔者的专业性与权威性，非西泠印社莫属、非陈振濂和孙慰祖先生等几位核心专家莫属。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结，如果能把这些新藏家的古玺印藏品（包括封泥和印文陶）整理出版，一百册的总量应该是一个可预期的范围。我想，如果陈振濂、孙慰祖几位先生牵头成立一个编委会，把这个计划启动，就目前篆刻类图书的销售情况来看，古玺印谱的发行和销售市场也非常乐观。

【作者简介】

许雄志：西泠印社理事、河南印社社长。



关于印谱研究的几点建议

文 / 张炜羽

受西泠印社委托，让我谈一谈关于印谱、印谱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今天的话题是“大印学”概念，印谱作为我们印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广泛研究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还处于起步阶段。西泠印社举办过多届的国际印学研讨会，每期研讨会上都有关于印谱研究的论文。我仔细看过，挖掘得很深，但还处于相对零散的状态。2012年西泠印社举办了一场“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大型联展，至2019年为了配合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又举办了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印谱展，真正的印谱研究高潮，已经开启。

印谱的研究为什么重要？我个人认为，其一，印谱除了史料价值之外；其二，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印章往往是“有谱无印”，就是有印谱而没有印章实物。如著名的吴昌硕《朴巢印存》，这本印谱的发现对研究吴昌硕早年的治印风貌，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批印章未见实物。此类情况还有很多。

关于当代印谱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主要分两块，一是文字方面，一是图版方面。关于图版方面，除了上面两次印谱史的研讨会、展览图录之外，像陈振濂先生主编的《中国印谱史图典》，主要对西泠印社藏谱进行逐一介绍。文字方面，韩天衡先生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有专门的印谱序跋著录，黄惇老师的《中国印论类编》，郁重今先生的《历代印谱序跋汇编》等。不管从图版还是文字资料整理，已经为我们现在印谱研究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因为印谱比较珍贵，一般的研究者无法看到原件，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出版的高清原色印谱，这是非常好的势头。



◎ 《西泠八家印选》三十卷本

过去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印谱，用宣纸印刷，但效果总感觉有点欠缺，因为这方面技术上的难关没有完全突破。对比原打印谱，在还原印泥颜色或者印蜕精细度上，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在技术上没有完全突破和在没有办法看到原打印谱的前提下，看高清原色出版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目前从事印谱研究的人员主要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篆刻作者与印学理论研究者，但是他们更注重艺术类方面，比如关注印章的线条、艺术风貌，包括印人的交友等。还有一部分是高校中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印谱研究总体的发展趋势很好，但是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对印谱研究，我个人有几点建议：

第一，在如何开展研究方面，可以考虑与古籍版本专家联手。前几年香港的林章松先生把自己收藏的一千种印谱资料交给了上海复旦大学，并把资料公开，供广大的印



◎ 《学山堂印谱》

谱研究者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是古籍版本专家跟篆刻作者还是有区别，因为他们比较注重版本、纸张或者板框，对篆书、印人的研究或许没有篆刻作者精通。故双方联手可取长补短。

第二，关于某流派印谱的研究。过去大家比较成熟的有《西泠八家印谱》。2019年12月在韩天衡美术馆举办的“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得到了西泠印社、河南印社等印学团体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印谱方面，从西泠四家到西泠六家，再到西泠四家附四家，一直到西泠八家，对这样一个篆刻流派形成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印谱都做了一个完整的展示。让普通的观众对这一流派的形成，特别是名称、成员的组成，到最后西泠八家的定名，都能对照着实物一一了解，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目前学界对西泠八家的研究相对成熟，而对其他流派的研究相对薄弱，比如过去吴隐编辑过《鹭湖四家印谱》等，但毕竟影响还不是太广。所以我建议可以从其他的流派，甚至某一个地域入手，如杭州有浙派，上海有海派，广州有黄牧甫的黟山派，北京有齐白石一脉，通过印谱来研究一个地域的流派。过去洗玉清著有《粤东印谱考》，对岭南地区印谱做了系统研究，文字详尽，但没有图片。

第三，前几年西泠印社举办过域外印章研讨会，使我联想到关于日本印谱的研究。日本印谱也属于汉字篆刻印谱的范畴，但是苦于国内实物资料稀少，业内人士很难见到。另外我也不太清楚就日本印学界有没有关于日本印谱



◎ 《顾氏集古印谱》

的研究，所以这也是一块可以发掘的领域。

关于印章流向的研究，包括古玺印、流派印。过去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即朱鸿达的《宾鸿堂藏印》，后来发现他收藏的许多明清流派印章现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但这一块研究的工作量非常大，对这么一大批古玺印章要从一本本印谱里面去比对，所幸我们现在有电脑可以加快比对速度。除了研究印章的流向，对印谱版本也需研究。一些名家印章原来是完好的，后来破损了。如西泠八家印章中丁敬身的一方“杭州郡”，我看到过两个版本，其一杭州的“杭”上部完整；而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是“杭”字上部缺损。这一缺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需要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印谱来进行。

【作者简介】

张炜羽：西泠印社理事、韩天衡美术馆副馆长。



关于“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古印文字历史溯源研究的断想

文 / 莫小不

先谈篆刻学科。我们最开始多是讲篆刻，后来在我印象当中，沙老在写印学史的时候，其内容比篆刻更扩展和深化，就称为《印学史》。现在，印学研究范围、深度和规模又有了显见的进展，“大印学”的概念应运而生，而陈振濂先生适时将这个概念点破了，提出来了。多年前有人让我研究杭州篆刻史，后来经斟酌、商议，改成“杭州印学史”。在“大印学”中，“篆刻学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什么叫学科？查工具书可知，“学科”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是按照学问性质来说的。从学科的学术性质而分出诸门类，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科中的历史学、语言学等等。二是按照学校教学设立的科目，像我们常见的语文、数学等，而我们现在高校书法教学中，包括篆刻这个分枝科目。第三个是我们平时不太想到的，在军事训练或者体育训练当中，这个学科是针对术科提出来的，术科为纯粹技法技能训练，学科就是相关的理论知识。我仔细一想，其实这三个义项都跟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主题有关。

首先从学术意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立足于本体，即篆刻本身，但是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延伸，正如刚才很多老师都说到了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等。我曾经从事图书馆学和文献分类研究。就我们对学科的理解，认为它其实是两种状态：一种树状的，我们现在的学科体系基本上借鉴于西方的那种树状系统。一个主干，然后再层层分枝分叉。社会科学里面分出好多，自然科学里面分出好多，这就是分析思维。刚才有老师发言，也说我们是艺术学科下面的

美术学下面的书法学下面的篆刻，就是从这个逻辑关系来说的。但是中国的理论过去被认为是很零散的，好像不成体系；其实中国的理论有一个特点，是互相交叉的；不是树状，而是网状的，是关联思维的产物。事实上，西方很早就有人关注并研究着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思想。“葛氏（按：即葛瑞汉 A.C.Graham）利用西方当代哲学的概念对中国传统的关联思维做了新的阐释。他指出关联思想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普遍形式，具有分析思维所不可取代的作用，阴阳理论就是建立在关联思维上的一种‘前科学’思想。”（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果不其然，当代网络发展以后，很多看似遥远而毫不相干的事物、数据，忽然就连起来了。在树，连理枝相当罕见；而在网，就时时处处在“链接”。这一连接、一碰撞就有了新火花、新思路。所以现在包括课题申报、研究论文等，如同陈道义老师刚才所说，国家倡导跨学科研究，去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正是在这些地方能够产生新奇的东西。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原先篆刻主体上拼命去挖掘，而是像刚才徐清老师讲的，跟印刷、跟商业等都会联系起来。本来我们篆刻跟隶属于工业的印刷、隶属于经济的商业，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从高校的学科建设来说，从理论研究、项目申报来说，领域的拓展、延伸、交叉，产生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东西，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的“大印学”概念，恰恰是把把边缘做得更大了。刚才老师们的发言提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纠结，是不是跨到人家的领域里面去了。我觉得，从关联这个角度来说是没关系的，

跨过去就跨过去。但是我们不要去长在他别的“枝”上，只是跟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单独或一起做某件边缘的或跨界的事情。如果我们填补了一个从来没人想到过的领域的空白，会觉得很高兴；但也可能在某一领域与他学科连接、重合，恰好跟原来不是同行的一个人相遇、相知、牵手并合作，做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果，这可能更伟大、更有价值。从“学科”的学问性质角度来说，“大印学”概念的提出，让我们用关联思维去涉足新的领域，创造新的成果。

第二，从教学的角度来说，篆刻作为高校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本身也是“大印学”中的一个部分，是印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因为过去的印学是没有专门探究这种高等篆刻教育的。如果说杭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印学中心，其代表我认为除了西泠印社之外，还有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中最早的高等书法专业教育（包括篆刻教育）。过去的高等教育里面，书法、篆刻也有，但都作为辅助学科或者仅是一门课程。但是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了。这个也是杭州作为印学重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高校教育跟过去师徒授受式的人才培养不一样，现在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非常多，并且开创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在发散性思维之下，大胆地探索和开创。当然，我们既然讲到书法、篆刻是高等教育的学科，它就经常会受到开设的课程的影响和牵制。高校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的教师、课程、教材等。前面我已说到，一个学科要建立起来，肯定要申报科研项目，出科研成果。这样，学科才能经得起评估，站稳脚跟，不断发展。但是从课程来说，一方面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专业兴趣与研究主题，可以发散地去想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课程开设肯定对他的思考、定题有很大影响。所以高校的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课程，我认为应该既是一个稳定基础的，围绕学科主干的课程体系；同时又是灵活的，应该随着时代的进展、变化，与时俱进，调整探索方向与相应课程。

第三，刚才说到学科是作为训练中对应于术科的一个理论知识方面的东西。所以牵涉到这么一个问题：假如对高校的本科生纯粹地去讲理论、讲学术，他们今后可能没饭吃，这是个明摆着的问题。所以国家也意识到这一点，近些年来高校招收硕士研究生，增加了很多专业硕士名额，而减少了学术硕士。对于专业硕士，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陈

道义老师也说到，即我们要去关注创作的技法。这一点过去可能被看轻了，但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在我印象当中，最早蔡元培倡导成立西湖国立艺术学院的时候，其实他最在意的就是创作，他说“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院所最希望的”。过去也有人认为中国美术学院是“重技法不重理论”的，其实不然，不是重技法，而是重创作。重创作跟重技法不一样。创作还有创作理论，所以我们现在的本科的学生，其实有时候要去研究一下创作的理论，包括研究创作思想和技法。古人很多的印论，也就是在研究技法和创作。然后到硕士博士阶段，研究方向越来越确定，思维更有深度，就可去做更庞大的研究。

第二个题目，是“古印文字的历史溯源研究”。印章，人们一直在研究它的文字。搞篆刻的人，大多会去研究怎么去用文字，以此来进行创作。怎么样将古文字用对、用好很重要。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篆刻家没有这个能力、精力等去研究古文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看，篆刻家的“文字学”跟文字学家的文字学不一样，研究用字和研究文字系统、造字法、构形、释读等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古玺印所用的文字，特别是汉字，有时候被统称为摹印篆。具体来说，古玺印里面的文字大体上分成籀文、秦代摹印篆、汉魏缪篆，后面还有九叠篆，我称其为“印用文字”。如《说文解字》序所言，当时有好多种篆书，每个时代，分别有一种篆书专门用于制作印章，属印用文字。这个概念，区别于后来那种我们所谓“入印文字”。

后来有了文人篆刻。文人们除了“印宗秦汉”，学其风格，也用其文字之外，还以其他非印用的文字入印。“入印文字”有两类，一类是刚才徐清老师也说到“印外求印”，即把其他的诸如镜铭文字、钱币文字、兵器文字等，包括金文、传抄古文、甲骨文、简帛文、石刻文等，用到篆刻里面来。还有一类就是书法家自家的字，像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有自成一体的篆书。故他们刻印就会用属于自己风格的文字。后人或称其为“印从书出”。所以我觉得，印章所有文字大概就分成这两类，一类是印用的，这类文字是专为印章而篆的；一类就是文人为篆刻而特选文字入印，这有利于自己风格特色的形成，借助书法独树一帜。

再说“溯源”。实际上，关于古代的文字到底怎么去

用的问题，现在也有很多争论。我觉得这里面牵涉到两个词，一个叫“讹变”，文字它本身是在讹变的。讹变是在古人在用文字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的信息不畅通，国家又分成若干个诸侯国等，而文字都是手写的，没有专门的印刷机，经长时间的流传，到一定的时候就渐变为跟原先对不上的文字，其实已经是错了。但是大家都错，法不责众，故约定俗成，将错就错。后人观其全貌，只能称之为讹变。但这个已成事实的变，是必须被承认的，文字官方在用，老百姓也在用。讹变往往产生在民间，而国家会在某个时间段进行文字整理，承认这种讹变，予以扶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编了《干禄字书》，里面有正、通、俗三体，适应社会不同的用字需求。但我认为当代的文字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讹变。当代文字已经基本定型，加之信息传递便利顺畅。但在篆刻创作的过程中，总有一些用错却还认为是对的情况，导致越弄越错，以讹传讹。曾有人主张，刻印的文字只要有个依据就可以了，这个依据可以是比如“哪个名家刻过的”等。但是名家偶尔也会刻错，工具书也会编错。所以对搞篆刻的人来说，不必去做文字考释，但是要用字就要多查工具书，然后多打几个问号，把文字用对。

另外一个词，是“俗体”。现在有一种倾向是，比较在乎篆刻文字要让大众看得懂。这样我们就会更多地倾向于简单的印文，如果查不到就动手造一个字、拼一个字。这就导致生造的俗字，甚至错字会变得越来越，然后大众都相信了更俗的那个，原先的“正宗”却被废弃。我认为，应该认真地、仔细地甚至有技巧地去查较权威的工具书，证实没有的才可以去拼接组合。过去有人说，人名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拼搭成字没有太大关系，但有时篆刻的内容是有整体文本含义的，这个时候就不可以轻易地拼。当然，现在也有特别“顶真”的篆刻家，只要查不到某个字就不刻这个印，或者换一种字体。比如大篆没有就整印换成小篆来刻；小篆没有就用隶、楷来刻。我们主张篆刻尚古求雅，可以有俗体，但不倡导从俗、添俗，而追求用字规范，讲学问，得文人气。

刚才陈道义老师也说到，我们现在的艺术院校有时候也会将书法篆刻附设在设计学下面。其实我觉得设计是个比较实用的艺术，对社会的影响远比书法、篆刻大得多。一个篆刻作品再好，在整个社会来说，看过的人其实占比

很小。但是设计的一个作品，把一个文字用上去，很多人都会看到。我很早就已经提过一个事例，杭州有一家非常著名的老字号饮食店叫“知味观”，知味观有一个标志就是做成印章的样子，其主体是左边一个“口”，右上部一个U形，中间一横，再一个倒U形。假如《说文解字》上没有这个“味”字，也就勉强就算是艺术变形，但是《说文解字》上恰有这个字，“口”字旁右边一个“朱”，是鸟的嘴巴的意思（鸟口也。从口朱声）。那么“知味观”的“味”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字。这个标志影响甚广，很多人会产生“知味观是这样的，我也可以这样写”的想法，这个字就可能讹变。这是糟践汉字、篆字，是很不幸的。设计中用印章形式做标志、图饰、海报等情况日益增多，我们“大印学”、高校篆刻教学，也应对此予以关注。

【作者简介】

莫小不：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关于当代书法学科建设及“大印学”概念产生的认识

文 / 陈道义

我来谈谈书法学科的建设。学科建设往往不是教师个人所能思考得比较全面的，就我作为高校书法专业教师而言，感觉目前书法学科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欣欣向荣。据统计，现在全国已经有 142 所高等院校在招书法本科生，而且招收书法研究生的院校有可能更多。据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的感悟加之个人的理解，书法学科建设方面各个学校有所不同，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主要还是以导师的研究兴趣而有偏向，这种偏向对学位论文选题或其他研究都有影响。但是，我想书法学科在基础知识与理论构建方面，应该有很多共性的。我曾提出过书法学科建设需要“艺文并进”，即以手上的技法功夫为主体，文化方面如文学、古汉语、美术史、博物馆学、图像学等，都必须兼修。就像由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概念，实际上还是要以印为主体，再汲取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或研究方法来扩大我们印学研究的外延。由此说来，高校书法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根据学校的学术构建方向与书法教师的资源量力而行，比如苏州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书法学科在艺术学院。艺术学院是以设计艺术为主导方向的，因此书法学硕士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是隶属于设计学专业的。这样的现状有不足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好处——即能够推动这些研究生在选题时必须要向设计艺术方面靠拢，这样会出新意，也有多样性。

最近，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也在召开一个座谈会，提倡要做交叉学科选题合作研究。我想，这种要求在综合性大学或许可以做到，但对于艺术院校来说，本身只有艺术学各个门类，跨学科或者说是交叉学科合作，又怎么进行呢？

当然，高校会考虑到现在学科发展的这一态势。由此我想到，“大印学”的提出，正符合这个态势的方向。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要借助于一切与印学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为我们印学研究服务。因为学科的问题上，正如刚才其他专家、老师也讲到了，从国家层面到各个地方，会有一些长期以来的分类法。书法学是在美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我以前一直认为学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我还清楚地记得 1997 年在河北参加“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战略发展研讨会”的时候，我讲了这样一句话：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艺术学已作为大学科门类与文学、历史学等齐肩，我们的印学和书法学可以说是并列了。那么印学在现在的学术背景下，也应该不断地发展。2004 年，著名学者王人聪先生提出“希望印学将来也能够发展成为像古文字学这样的显学”。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觉得西泠印社相关的号召和提倡，是一种大能量。现在，“大印学”概念的提出，更能够引导大家去朝这些方面努力，我们的学科发展很有可能就更有主题方向，而不仅仅是“个人散打式”的想到什么就研究什么。

我感到，“大印学”概念虽是刚被提出，但其实这些年来西泠印社一直在践行。西泠印社每年一次的印学研讨会的主题早已有此倾向，尤其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域外印章研究”，可以说是由此而一时火热。西泠印社一旦有这样一个主题性选题号召，研究者基本上就朝这方面努力去撰写论文，再经过研讨会现场交流和论文集对外发行之后，可以吸引大家的研究兴趣。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留洋的学生，比如刘昌玉老师，还有一些年轻的专家，能

够把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用到了我们印学当中，我觉得这些“印外”人才的集聚并向西泠靠拢，也是“大印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除了提倡和引导，我们还可以为“大印学”研究的平台搭建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借此机会我提一个小小的提议：比如印学资料数据库的建设，西泠印社有不少可供研究的资源，以前印学研究者一直希望能更多地拜读、拜赏印社藏品，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如果说印社也能够有这样大的环境下合力做一些数据库的建设工作，让更多人分享印学资源，可能会拓宽广大印学研究者的思路而扩大印学研究的外延。甚至还会有一些现在暂未进入到印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看到我们的数据库而大为惊讶，会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印学研究来。

还有一个是“大印学”如何做到“请进来走出去”的问题。其一，我们可以把海外研究印章的一些成果翻译成中文，比如林乾良先生就曾大幅度介绍过《7000 Years of Seals》，前些年，我就已开始与我的博士生进行这本书的

翻译工作，但因版权的问题，难度很大。几年前，陈振濂先生，曾提出要助推我们这项翻译工作，我很受鼓舞，后来西泠印社出版社等也为此联系了大英博物馆出版社，然而至今未能如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印学”研究在面上要做的一些工作，也应该考虑到在这个范围内有所作为。其二，现在高校中以及国家社科层面一直在征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我看有不少高校将一些经典著作外译而申报并获批了这类项目。我想我们“大印学”可以从西泠印社这样大的团体角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组织有关人才，把印学里边的一些经典名著，比如将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等翻译成英文或其他外文，让我们中国的印学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

【作者简介】

陈道义：西泠印社社员、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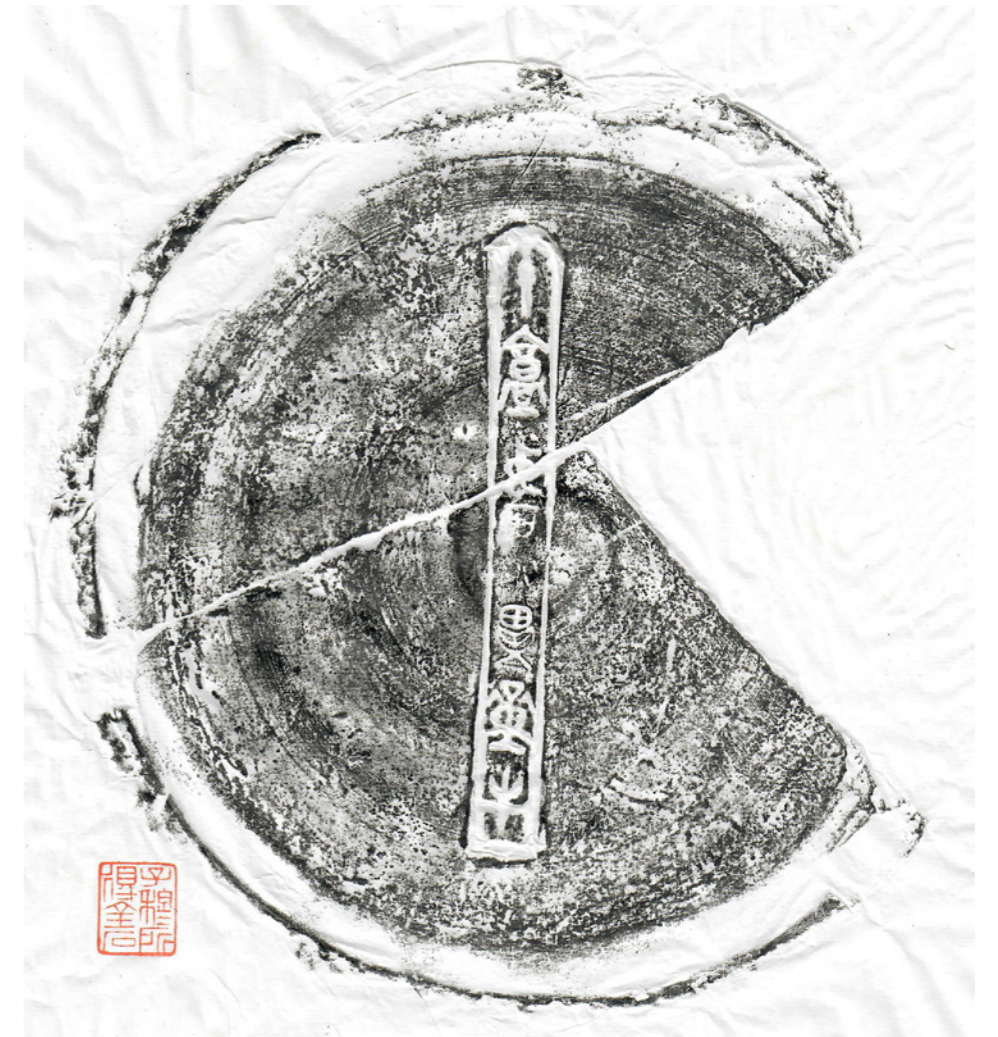
以古陶文为例浅析“大印学”学术概念产生的意义

文 / 唐存才

我想用两个方向的汇报来完成今天的发言。

首先，西泠印社从2008年所提出“重振金石学”这个理念以后，经过了10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今天提出了“大印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这是西泠印社在百年发展中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一种学术态度。第一，“大印学”的概念应该是“重振金石学”理念的内涵与深化建设，或许说是重振金石学更为重要的落脚点。第

二，“大印学”的概念，是在“重振金石学”宏观指导、推进基础之上的精准突破。第三，“大印学”为以后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指明了道路。第四，“大印学”的概念并非局限于简单艺术范畴中的技术讨论，而更多的是反映我们在印学艺术表现形式背后的一个学术和文化意义上的考量。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西泠印社提出“大印学”的概念，可以说是真正顺应了时代对于主流文化艺术呼唤的一



◎ 十罇中石基异量牛

种积极响应。

其次，我们倡导理论都应该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实践永远是文化艺术发展的两个相关联的重要方向。理论的进步会指导实践的提高；同样，实践的深入一定也会让我们总结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突破前人经验基础上的理论。

我在理解“大印学”概念的过程中，也从自身所实践的一个特定的金石艺术角度出发，认为是不是可以将对中国古陶文的研究作为“大印学”范畴中的项目，更好地梳理与展示中国古代玺印艺术及其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座的很多的老师与专家都曾经从传世的印章中研究总结出很多艺术和文化的成果，而古陶文除了玺印所具备的姓氏、人名、官职等元素外，还具有确凿的年份、特殊量制的单位、远古的地名、专用属性、陶工里籍机构等信

息，所以从“大印学”的范畴来看，古陶文所包含的玺印及其相关信息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陶文主要是指先秦玺印或者说秦汉印章在陶器上抑印的实用痕迹，也有部分为刻划文字。囿于历史传承的某些因素，很多的印学实践者和爱好者，没有获得更多的资料去对这个古老的玺印领域展开应有的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古陶文的材料进入人们的视野，我想这些崭新的古陶文资料，完全可以成为“大印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版块。

也正因为想更好地表述古陶文对“大印学”研究的意义，参加此次研讨会前，我专门从藏品中间选择了两品做了传拓。第一枚古陶文“十罇中石基异量牛”，可以确定是突破或者说颠覆传世先秦古陶文长度之最佳的案例。考传世古代方形玺印尺寸最大的是在今天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



○ □ (羗) 市

“日庚都萃车马”，边长 6.9 厘米；单边最长的应该是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单佑都市王口端”，长 7.6 厘米。但古陶文“十罇中石基异量牛”长度为 11.2 厘米，为尖角的圭形。这个抑印案例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先秦古玺印长度之最的认知。著名的古文字家裘锡圭先生见后即说“前所未见”，可见其除了印学意义外，还有古文字学的价值。此外陶文内容对三晋地区量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枚陶文引发了“大印学”范畴中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马衡在其著金石学讲义中指明：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

第二枚古陶文恰好给予我们这方面的信息，这枚陶文出土于山东临淄地区，抑印释文为：“□ (羗) 市”。据史料记载，“羗”即当时西域的“羌族”，“□ (羗) 市”当为羌人所集聚的市场，未见先贤的古陶文资料著录。但是这枚“□ (羗) 市”陶文的出土，说明了在先秦时期齐

国故城存在有西域迁徙过来的羌人集聚形成的市场，佐证了史料中关于山东早期民众中存在西域迁徙到此的相关记载的正确性。先秦齐国开国国君姜尚，其“姜”字就是羌族的别称。

今天西泠印社关于“大印学”的研讨会非常重要，我仅以此二枚古陶文谈个人的认识。我相信，在西泠印社的引领下，传统印学将被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和文化前沿。

【作者简介】

唐存才：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



关于“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大印学”概念联系的几点想法

文 / 金丹

关于篆刻学科的研究，我想讲三点。

第一点，关于篆刻学。篆刻学相比于书法学来说，其发展是远远滞后的。所以今天提出“大印学”对于篆刻学学科的建设，应该是顺应潮流，并且有其迫切性。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篆刻学，它包含了哪些层面？比如，从邓散木先生所著《篆刻学》到今天学科意义上的篆刻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天衡先生曾经开玩笑说，邓散木的“篆刻学”等于是“学篆刻”。《篆刻学》确实是一部篆刻入门级的教材，不具有学科意义上的概念。

我们今天讲的篆刻学，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是篆刻学科的构建。篆刻学学科的体系框架和基本内容，以及与分支学科、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架构一个完整的篆刻学的基本内容。

第二点，作为学科概念的篆刻学在篆刻教育当中的作用。近现代的高等篆刻教育起源于学校的篆刻课程，比如上海美专，刘海粟于 1912 年创办上海美专（南京艺术学院前身）时，聘请了如钱瘦铁、方介堪、朱复戡、诸乐三、李健、王个簃、朱其石、顾燮光等进行金石篆刻课程的教学，不仅有教学计划，还有自编教材，在上海美专第一届毕业生纪念册上就刊有方介堪的《治印概论》，实际上开启了近现代高等篆刻教育崭新的一页。上海美专的课表当中，有金石学和篆刻两种课程。而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没有金石学这一门课程了。再就是近现代书法篆刻专业教育，比如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以沙孟海为代表的书法专业当中的篆刻课程，再到如今的高等书法篆刻教

育当中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科越来越细化的今天，其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篆刻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许在硕士、博士阶段有一个印学研究的方向，可能也是在书法篆刻专业当中，因个人的选择，研究方向可能偏向于篆刻。这就是在当代篆刻教育的现状。

篆刻专业与书法专业相比当属小众，远不能相提并论。当代硕士、博士当中从事篆刻研究的这一部分人，已经渐渐地跻身于历届全国书学讨论会和西泠印社举办的国际印学研讨会当中。这些平台为身处高校的印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同样，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也依靠着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们而不断地向前走。我认为，篆刻学科的发展，是和高等篆刻教育相辅相成、一路向前的。

第三点，篆刻学与“大印学”。篆刻学就是印学，也就是说，我们要谈论的是印学与“大印学”。不谈印学，就无法谈“大印学”。应该说一个完整的印学（篆刻学），应该包括篆刻史的研究、篆刻理论的研究（即印论的研究），当然也应该包括篆刻原理的研究，技法史、批评史、接受史、观念史、印谱史，还有包括篆刻美学、篆刻心理学、篆刻教育学等，甚至还应包括当代的篆刻创作、展览与批评、篆刻文化转型等。“大印学”的提出，应该是印学的一种延展和放大，有重合也有外延，重合的是印学学科的基本内容；外延的是非印学学科本身必须具备的内容，这已经扩展到相关领域。这样一种生发，是和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契合的，一开始就没

有局限在“就篆刻而篆刻”的层面上。我是“孤山证印”的“常客”，每一届研讨会都会有论文参加，包括“重振金石学”。但近几年的主题多为如“域外印章研究”“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研究”“世界图纹与印记研究”“金石全形拓研究”等，不属于我擅长的领域，便没法参加了。我想这就是西泠印社对于印学研究有意识的拓展吧。

在学科细化的今天，“大印学”的提出，可以避免印学研究往更加细枝末节的方面一味去走，越走越狭窄，而是以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印学周边的东西，是篆刻史论之外的很多方面的研究，包括了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反过来说，“大印学”的提出，也会促进印学作为学科研究视野的拓展，提示我们印学研究应该还具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有，“大印学”可以解决印学以外被人忽视



“大印学”概念的历史意义

文 / 戴家妙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创国内书法篆刻高等教育时，沙孟海先生受邀来校担任“印学史”的教学任务，其讲义即是后来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印学史》。20世纪80年代初，沙老接任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多次在筹备工作会议上提出“篆刻学”学科独立发展的呼吁。如今，回过头来思考，沙老的前后两次命名，都是富有前瞻性的眼光的。

同时，也说明沙老一直在思考：如何将篆刻同晚清以来的“金石家”作区隔，赋之于现代学科的意义？在著述时，可能遇上商周以来的印章发展史，所以用“印学史”来概括。当他进入西泠印社社庆或研讨会现场时，可能又

的交叉学科甚至是其他学科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如果没有印学研究的支撑往往又难以深入，于是就会出现某个真空状态。这样，“大印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但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印学还是“大印学”，都应该重视这个边界。特别是“大印学”，如果完全突破了边界，就会成为一个大杂烩；突破了边界，可能不但不能称之为“大印学”，而变成什么学都不是。因此要把握一个度。当下可能需要靠研究者去主观把握，但将来应该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概念和标准去规定它，让它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作者简介】

金丹：西泠印社社员、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

觉得“印学”这一概念，还不足唤起大家对新学科发展形势的注意，于是又提出了“篆刻学”。其核心的要义就是使篆刻或者说印学摆脱晚清以来金石家的概念。目前，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的课程表上，还是“中国印学史”这一名称，而精神指向也是希望在教学中将“篆刻”的技艺上升到学科层面，即构建“中国印学体系”。

几十年过去了，学术发展的步伐似又超乎了沙老当时的预想。如今，各学科领域都在摸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期有新发现、新发明。西泠印社近年来的“印学峰会”就是缩影，峰会的主题从域内印章跨到了域外，从文字印到图形印，从印内到印外，从东方从西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于是，“大印学”的概念就在2020年被提出了。

“大印学”的概念，是一个文化范畴的概念。或许有人会觉得“大印学”是不是又回到晚清以来“金石学”的老路？在我看来，“大印学”是基于“文以载道”的思考，而一个甲子前沙老所思考的或许是“技近乎道”的思考。两者之间，有一个时空上的移位，很值得深入思考。都是基于现实情境而提出的前瞻思考，都是为了丰富扩大印学领域的影响力。

因为是“大印学”的立场，其中就包括了“金石全形拓”这一领域。海宁历史上是全形拓的中心，从清嘉庆到道光，创于马起凤之手，后经六舟和尚推广，而至陈介祺、吴大澂等人发扬光大。马起凤是嘉兴人，六舟达受是海宁人。再到后来的王国维、朱剑心，全是此道中坚人物。前二者是全形拓技艺的发端者，后二者是把全形拓导入金石学范畴的关键人物。还有邹安、褚德彝等，均与全形拓结下学缘。

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以及两位社长吴昌硕、马衡，也很热衷于全形拓。因此，前年举办的“金相椎痕——百

年金石学发展及青铜器传拓（全形拓）精品展”，是继承了前贤的作风。同时，又是站在百年金石学发展的立场来策展的，更具有现代学科的意义。全形拓与印学的关联，除了金石这一层的密切联系外，全形拓中包涵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以及历史学，是相互交织的。

从百年全形拓的发展过程来说，似乎是技艺操作多过理论总结，传拓实践超过全形拓如何利用的思考，青铜器的传拓又明显多于以石、木、竹、玉之类的传拓……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在呼吁“金石全形拓学”在新时期的构建。目前来看，北京、上海、陕西、河南、浙江、四川等地，是研究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从社团机构来看，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外，西泠印社当属这一潮流中的先行者。可以预见，金石全形拓热一定会促进该门学问向着学科化的特性靠拢，也会和“大印学”范畴的拓疆形成呼应。

【作者简介】

戴家妙：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主任。



关于印学观念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文 / 徐清

这次座谈会的筹备组建议我的发言主题是“印学观念史研究”。围绕“印学观念史”，我首先想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什么是“印学”，二什么是“观念史”。再进一步，“印学观念史”到底研究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路径去做研究。

以往通常的印学观念研究，如果从研究的内容侧重

和时段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篆刻艺术观念史。一些核心的论题如“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等，这些论题中所说的“印”基本建立在明清文人对“印”的界定基础之上。往前追溯，从先秦到隋唐以至两宋辽金、元代，这么长一个时段的印章使用及观念，总体来说研究得还是不够充分，有待于进一步推

进。研究时段上的轻重失衡，跟印论、印谱文献的存世和流传情况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再往后看，当代的篆刻艺术发展，它的创新探索和观念梳理，这类研究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缺乏的。所以以往的印学观念研究呈现出重明清而轻前后两大时段的现象。如果从研究的方法路径上来看，以往研究侧重于“内向”观照，多从审美品评的角度把握古代的篆刻艺术观念，分析技法背后的审美追求，以及“有限的外向”观照，比如将印论与文论、书论、画论等联系对照。今后需要积极地寻求一种“外向”的观照，或“内外双向的、互生式的”观照。

印学观念史的研究，虽然落在“观念”上，但也要依托三要素来做分析。这三要素——“印章、印谱、印人”都不是先在的、狭义的限定。“大印学”概念的提出以及西泠印社近年研讨会的某些专题设置，都表明了这一思路和各种拓展，比如从地域、国别、民族，从印文内容、印体载体，再到工艺、方式、手段，都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固有认知。再具体来讲，印章包括封泥的使用、功能、形制；印谱，除了我们通常认定的成熟的印谱之外，其他各种印式图谱图样的编撰、出版和各自功用；还有印人，不单指明清时期的篆刻家或职业印人，他们的构成、身份阶层、技能和文化等，都有很多可继续阐述的空间。

印学观念史研究应该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特征，作为一项综合研究，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辐射性。观念史这个学科原本是从哲学史分离出来的，它自身也经历了将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历程。最初缘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的倡导，他曾创办《观念史学刊》杂志和“国际观念史协会”。当然，后来的西方学界对于观念史这个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分析。比如“观念史”这个词在英文里会有不同的翻译表述，有时指向概念史、智力史、思想史等，有研究者指出“idea”包括至少25种含义。这反映出英、德、法各国学者在观念史研究中所注意到的不同路径和方式。由此可以想见，如果落到印学观念史研究上，到底哪些内容可以纳入进来做考察，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无论如何，对于观念的认知必定要同时倚赖其他很多因素，观念和社会、历史、物质、科技、宗教、政治等，互为联通。那么“印学观念史”其实可以跟很多的学科领域产生关联，除了我们通常知晓的文字学、金石学之外，还有政治制度、经济商业制度、宗

教民俗观念，及物质技术史、出版史、新闻传播史、教育史等，都可以借此考察观念的生成、发展演变和互相影响。

2020年第六届印学峰会有几篇入选论文，被列入“印学观念”这一专题中。其中一篇对古代印章神异观念的考察，涉及早期道教用印观念、民间信仰等，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另外，比如从教育史角度来看，我指导的研究生在做“晚清民国书法篆刻教育理念”的选题论文时，发现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实践者——李健，曾在上海美专任教长达17年之久，他的一部著作《金石篆刻研究》就是篆刻课程的教材讲义。书中明确讲到，虽然是研究篆刻之书，但命名为金石篆刻，而且书中汇编了几十张勾摹的钟鼎彝器和古玉图，书后附列了详细的古器物图谱书目。李健还把篆刻一直追溯到甲骨文，他认为古玉、甲骨等都应囊括在篆刻的范围里面。李健的这些想法一部分是来自于金石学，来自于李瑞清一脉，同时跟他所受的教育（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有很大关系。由李瑞清主持的两江师范学堂当时聘请了很多日本的教员，是仿日的新式教育，重科学实证、重图谱绘制，所以李健的篆刻教育思路、对篆刻的范围界定以及认知方式，我们需要从其所受教育背景以及任教履历等层面去把握。再比如，从出版史角度，晚明时期的商业出版非常兴盛，有很多实用类的艺术图集的出版，这对于当时印谱的面貌呈现是否会有影响，之间是否有联系，也值得探讨。南京艺术学院有一位博士在2020年完成的学位论文有关“宋元明印谱史研究”，该论文谈到，唐代以及更早的一些文献里面就已出现对印章的勾摹，虽然不是后世成熟的印谱形式，但已经具有印谱之实。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不少勾摹的印章，但到了《历代名画记》的明代刻本里，这些勾摹的印图都改变了，变成了印刷体字样。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不是跟明代的出版业、出版的功用需要以及背后的观念渗透有关，这也使得我们后来再去关注印谱史的时候，一度忽略了唐代或更早的印谱雏形。

总之，印学观念史研究应该要充分拓展外向视角、深入内向观照，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古今印学的发展，思考未来的方向，为“印学”确立更广阔的学科视野和更扎实的学科基础。

【作者简介】

徐清：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传统碑帖学”研究的几个视点

文 / 林如

昨天刚刚拿到会议的一个研讨内容，看到会议组给了我一个关于“传统碑帖学研究”的发言主题。其实我未专门对碑帖学作为一个学科或者说一个宏观的学问概念进行过研究，之前也仅仅是站在书法史的立场做过一些个案的研究。但是“传统碑帖学研究”的题目又比较广泛的，所以我在想既然会议是围绕着“大印学”的概念进行，必然会涉及到它与金石学的关系、和印学的关系，是一个“大印学”研究视野当中的传统碑帖学研究，是印学研究的一个延伸和扩展。

我想有这样几点内容可以作为研究的视点，可以进行讨论：

第一，碑帖学和金石学、印学之间的概念及所包含的研究内容的界定。碑帖学、金石学、印学作为现代独立学科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不成熟的，它们更多的是指向一门传统的知识学问系统。印学在当代的专业教学当中还相对突出一些，因为现在的美术院校中，有书法篆刻这门专业，有篆刻这样一门课程。但它还是基本依附于美术学当中的书法学科，而书法目前还只能是美术学一级学科或艺术学下面美术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专业方向。那么金石学、碑帖学，我们可以在专业当中开设相关的课程，这个“学”的概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个学问知识的概念。

那么碑帖之学包含的内容，首先是与书法艺术密切相关的，它是书法临摹取法的对象，我们可以站在书法艺术的立场研究碑帖发展的历史，两大书法风格系统，不同的

技法语汇，还有文字书体；另一个，我们整理前人碑帖研究的成果，包括碑刻和刻帖的镌刻技术、拓碑的方式和碑帖印刷技术，碑帖的目录版本，还有碑帖的文献史料价值等，都可以包含在碑帖之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铜器与石刻，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要》当中把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定为金文碑版，也就是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和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我们现在把金石学研究扩展到砖瓦、封泥、甲骨、简牍，各种杂器等，所以碑帖学当中的碑学显然应该被金石学涵盖在内。除了包含碑学当中的碑刻传拓、碑文研究、碑刻文献等，金石学的研究还侧重器型研究，器物的分类、定名、铭文文字的考释梳证等，但这些都集中在碑帖学的研究当中应该并不是重点。那么碑帖学和金石学研究范围有一个不重叠的部分就是碑帖学当中的帖。最早的帖虽然指的也是刻帖，但是材料一般不是金石，到后来帖学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江左风流的文人行草墨迹等，应该都是在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外的。

按照一般的传统印学概念，印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篆刻艺术风格流派、印学社团、印文、印谱、印人、印材、印文和边款的钤拓技术等，因为它的载体基本是属于金石的范围，所以被包含在金石学范畴之内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有关于西泠印社早期提出的“金石家书画”的概念。以前的印社前辈们就有把篆刻家称为金石学家的，认为篆刻家就是金石学家。后来沙孟海先生主张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篆刻是归为美术方面

的学问，而金石学是属于史学、考古学方面的学问，两者属性并不相同。马衡先生也认为，金石学可以包含篆刻，但两者并不能相等。这是一个大（金石学）、一个小（篆刻）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印学扩展到一个“大印学”的概念，那么这个“大印学”反过来涵盖了碑帖学、金石学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它们的大小关系就恰好反过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关于“大印学”的研讨内容中会包括碑帖、金石、鉴藏等诸多内容。这是概念和研究内容的界定。

第二，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印学”的概念和“碑帖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研究篆刻和碑学的关系，提到印、篆刻对于清代碑学兴盛的影响关系，这个当然指的是明代晚期文人篆刻的兴起、推广所带来的影响，这些还只是比较狭义的篆刻、印学视野中的关联。这次会议资料里面整理了历年印学峰会和国际印学研讨会的论文目录，比如其中的域外印章和世界图纹印记，就属于“大印学”范畴，它不仅仅只是研究与中国印直接相关联的印章本身、艺术风格流派、印谱、印人、印学社团，而是扩展到与印相关的符号。那么域外印章还是一个印章的概念，但是图纹印记的“印”就不仅仅包含印章，还有包括碑刻、刻帖、传拓的“印迹”含义，即只要不是直接书写的，只要是通过对刻，通过拓出来、印出来的文字图像，都是属于印记（迹）的范围，也都是属于“大印学”的范围。如此，碑版、刻帖，碑帖之学就能和“大印学”联系起来。当然，原有印学研究当中的边款捶拓、印谱的制作也是属于“印记（迹）”的内容。那么，书法艺术范围内的碑刻，它也是以拓片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它当然也是属于印记（迹）；而帖呢，最初也是刻帖，刻帖也是通过对刻和传拓技术流传下来的，只是它和碑所刻的材料不一样、书法内容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但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印记（迹）。它们和原有印学研究中的印文铃印、印章边款刻制及捶拓、印谱的制作是同一范畴的。当然，它同样也可以和金石学当中的传拓技术相关联，印社去年做过关于“全形拓”的研讨会和“金相椎痕”青铜器传拓精品特展，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相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书法家、金石学家、印学家的三个角度，来看碑帖学研究的视角，站在不同的身份立场、学术背景来看碑帖学，应该是侧重哪个方面的研究。

书法家对于碑帖的研究比较侧重文字的书法艺术风格，偏向于美学范畴的研究；金石学家比较侧重的是访碑、记录整理，以及碑帖文字的校勘、考释等方面的研究；那么印学家则可以侧重碑帖当中的古代文字如何运用到篆刻当中来，字法章法如何处理等。我们知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当中的两位——吴隐和叶铭，都是刻碑匠出身，后来成为了有名的篆刻家、印学家。

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从“大印学”的角度，就可以关注到碑帖学当中的碑拓印记以及它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从不同角度把碑帖学和金石学、印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

林如：西泠印社社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以滚印为例略谈域外印章研究

文 / 刘昌玉

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探讨域外印章的研究。我的专业是亚述学，研究的是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和历史文化。在古代西亚文化艺术中，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印章形式，叫做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简称滚印，或者圆筒印章）。这种印章，是在圆柱体的上面刻了一些花纹、图案以及文字，然后在湿的软泥上滚出连续的图案（或印纹）。这是我所研究的滚印的简单介绍。

滚印是域外印章领域里十分重要的组织部分。简单地说，域外的印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地区：一个是古代近东，近东也可以对应于现在的中东地区，包括两河流域（Mesopotamia），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版图，还有伊朗高原、小亚细亚半岛、埃及以及阿伯半岛南部等地区，在这些地区都发现有滚印（当然也有平印，平印和中国古代的印章类似）。滚印起源于两河流域，后来被周边地区（像叙利亚、伊朗和安纳托里亚）所借用，所以在整个近东地区，滚印是一种独特的印章形式。

域外印章的另外一个地区是古代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印章非常独特，上面刻有文字，但是这个文字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识读成功。

希腊和罗马也是域外印章非常重要的地区，也很有特色。当然有的学者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印章，尤其希腊的印章受到了近东印章的影响，做过此方面的研究。

接下来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因为时间上距离现在比较近，在西方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另外就是东亚，日本、韩国等地区皆受了中国印章的影响。

以上这就是域外印章大概的一个地理范围。

因我主要研究滚印，所以讲一下滚印的概况。滚印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还有一种说法是距今有9000年的历史。现在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也是诞生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时间上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滚印的发明要比文字至少要早2000年。

滚印一直被使用到波斯帝国时期，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后被平印取代。从希腊和罗马时期，一直到中世纪，近东地区的印章形式不再是滚印，而是平印。所以，滚印的使用时间大概有5000年左右。在形态上，滚印呈圆柱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实心的，一种是空心的，即在中间穿孔，可以用绳子挂在胸前，类似于护身符的作用。

滚印按照图文的形式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图文的；第二类是有图无文的，这种最早出现，产生于文字被发明之前；第三类无图有文则比较少见，主要出现在后期，尤其是巴比伦和亚述时期。

单从图案来讲，根据其所描绘的不同场景，可以细分为很多种。一般而言，最早的滚印场景，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相关。当时人类处于史前时代，或者刚刚步入文明社会，所描述的滚印图案都是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场景，还有一些表现生产的，比如纺织、农耕等。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大概是公元前

27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即两河流域历史上的早王朝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所谓“织锦”图案，这个场景只出现在这一时期。再接下来，出现的这些图案场景在发展史上就比较常见和典型了，比如争斗，表现为人和牛之间争斗，人和兽之间争斗等。争斗场景的滚印使用的时间非常长，从最早的时候一直到滚印的末期都出现过。另外一种宴会场景，表现为国王或统治者打胜仗之后所举办的一个宴会，在宴会上人们饮用啤酒（啤酒最早是由西亚地区人们发明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图案。这一滚印场景主要也是在早王朝时期常见。还有一种是神话题材的场景，包括朝拜或者觐见的主题，表现为一个地方长官去觐见国王，或者觐见神。需要注意的是，在亚述和波斯统治时期，出现了狩猎场景的滚印，尤其是亚述时期的猎狮场景，体现了亚述民族的特性。而在波斯时期，出现了许多带有异域风格的滚印题材，比如一些穿着打扮带有异域风格的人物，这个是在到了后期才有的。滚印主要包括以上所述的这些场景。

接下来，我非常简短地讲述一下滚印的研究史。滚印研究的前提是近东考古学的兴起，只有考古发掘先出土滚印，才能被学者们研究。

在滚印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学者们的主要工作是编制图录，把每个滚印的图案和文字拍成照片，然后将其编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编制图录的方式，主要是根据某个博物馆所收藏的滚印，或者根据某个时期的滚印，或者某个地区的滚印等。第三个阶段是从事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滚印的制造技术（比如滚印是如何制造的）以及滚印的材料进行研究，涉及技术层面的研究，一般跟考古学或者文物学有密切关联。二是对从事滚印的总体研究，研究滚印的发展演变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滚印有什么特性和共性，还有滚印图像学、文字学的含义，也包括编写滚印介绍类的普及读物。

滚印研究的第四个阶段是滚印数据库建设以及滚印的数字化。有些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在国际上主要有两个涉及滚印研究的数据库，一个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牛津大学共同负责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工程”（CDLI），这个数据库汇集了目前世界上最全的楔形文字材料（一共有100多万件），其中就包括32450件左右的滚印。另外一个数据库是2019年法国巴黎大学联合其他机

构共同负责的一个古代近东印章与印文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更具专业性，把目前已知几乎所有的滚印用数字化技术呈现出来，比如三维动画、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人们可以直接在电脑屏幕上触摸、翻转立体的滚印。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说是未来滚印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最后，我来展望一下滚印研究以及域外印章研究的未来。首先，域外印章的研究不仅仅是单个的个案研究，其实它可以与中国的印章进行比较研究，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印学”今后的研究领域之一，即中外印章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范围可以很广泛，比如印章的功能性，印章体现的社会性，印章在不同文明所起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印章对一个文明的发展有什么历史作用，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大印学”研究的内容。其次，从印章图像学和材料学着手研究，不同的印章用什么材料去制作的，这些材料是不是当地所产的，这些材料在当地文化中具有何种意义。比如在滚印材料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是青金石，这类滚印一般都是非常珍贵的、高级的，是当地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再次，从古文字学考虑，域外印章也可以同中国的印章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比如从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去研究不同文化的内涵以及不同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等。

【作者简介】

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

2004—2020年西泠印社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及“孤山证印”峰会论文集目录汇总

一、“纪念吴昌硕先生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

时间：2004年10月24日 地点：浙江杭州

吴昌硕：艺术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丁羲元
吴昌硕绘画的现代价值 洪惠镇
画之所贵存我 卢浙
民族精神的浓郁表现 刘江
考鉴缶庐法绘三题 韩天衡
吴昌硕先生晚年砚铭创作活动初探 任道斌
壬子开社 碑书不误 余正
吴涵与吴昌硕篆刻的风格关联 孙慰祖
三绝四全 独张异军 徐建融
下笔力重金鼎扛 梅墨生
吴昌硕印谱校勘 黄华源
从《刻印诗》看吴昌硕的印学观 蔡显良
从吴、王所书《西泠印社记》谈王福厂书学的发展与成就 简英智
吴昌硕诗篆双绝之结晶 林乾良
家父诸乐三谈大师吴昌硕 诸涵
重气·养气·写气 杜高杰
消费吴昌硕 曹工化
百年沧桑谁是雄 姜澄清
对吴昌硕重气的一点认识 张耕源
金石能为臣刻画 舒文扬
印继八家传一脉 书工二篆卓千秋 周建国
篆刻家朱尊一与黄宾虹的金石缘 张炜羽
西泠印社24位早期社员亟须追认 林乾良

二、“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

时间：2005年7月23日至24日 地点：山东潍坊

传说时代的开启 张业法
陈介祺与中国金石学 孙敬明
论陈介祺与金石学 范正红
陈介祺与陶文 王思田
从西泠印社宗旨论陈簠斋之伟大成就 林乾良

秦汉文字瓦当界定的标准——试论陈介祺对秦汉瓦当断代的贡献 徐畅
陈介祺战国古玺确认的印学史贡献 姜寿民
收藏家陈介祺的出现与其研究略史——附交友人物简表 [日]田上惠一（谷川雅夫、和田广幸译）
陈介祺研究三题 俞黎华
簠斋印谱 陈继揆
西泠印社藏《簠斋印集》 余正
簠斋印事七题——关于《十钟山房印举》和《封泥考略》 孙慰祖
“万印楼”藏印及《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过程、体例及版本考说 陆明君
《十钟山房印举》及其编印过程 余彦焱
从《十钟山房印举》的编例看陈簠斋对古玺的认识 贺文荣
从《十钟山房印举》看陈簠斋的古玺印专题收藏 林如

陈介祺的收藏 [日]清原实门（和田广幸译）
陈介祺所用印谱 [日]萩信雄（和田广幸译）
从《秦前文字之语》探陈介祺的印学成就与思想 曲彬
读《簠斋尺牍》想到的 古心
周鼎齐曩有述作 秦玺汉印共研求——陈簠斋与吴平斋交往考述 张炜羽
刘嘉海对陈介祺的影响考释 张其凤
陈介祺与王懿荣交往鄙视 吕金成
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关于陈氏的古董的搜集 [日]松丸道雄（和田广幸译）
陈介祺印学思想探赜 蔡显良
陈介祺篆刻家身份再讨论 江涵
论陈介祺的传古思想及其使用西洋照相术的尝试 胡志平
从簠斋用印看陈介祺的篆刻审美和创作思想——兼论翁大年和王石经的篆刻 舒文扬
陈介祺篆刻思想的实践者——王石经 王庆忠

三、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时间：2005年10月16日至17日 地点：山东潍坊

篆刻学学科研究

印学是一座宏伟的学科建设 刘江
关于篆刻艺术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陈振濂
关于篆刻学的思考 李刚田
篆刻艺术之内容与形式 林乾良
“篆刻文献学”构建初探 徐清
篆刻创作与批评二题 韩天衡
制度、技术、观念：论印学的学术结构 张建军
印学史研究
“長郢君玺”金印考 王人聪
古代的医官和医人——先秦医官医人玺印揭秘 徐畅
战国古陶文考 尾崎苍石
秦私印综述 萧春源
古印收藏概说 叶其峰
寻找真实的宋元——宋元篆刻家及其审美观的考察 孙向群
台湾明郑时期、清朝时期文人用印初探 简英智
乾隆与清官玺印收藏 郭福祥
论清代学者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证》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与意义 孙洵
陈鸿寿：在仕途与艺术之间 孙慰祖
圆朱文印及王福庵、陈巨来印风解析 冯宝麟
中西印文化概论 林乾良
古代印论中的四个专题 蔡显良
近百年印学研究之辩证发展 陈道义
吴昌硕与赵之谦研究
吴昌硕作品展观和搜集的回顾 梅舒适
吴昌硕篆刻作品别探 黄华源
赵之谦日本收藏史综考 陈振濂
赵之谦无年款篆刻作品年代考 邹涛

《印人传》所见明末清初的福建印坛 赖伟宏
 印灯一脉传娄东——太仓明清篆刻史实述略 周新月
 沧海遗珠：缙丝印谱考——兼及印谱形态之研究 李瑞振、绳博
 丹青朱迹——十七世纪画家治印、用印现象综述 杨亮
 龙凤祥《麝香山印存》与清代文字狱 朱琪
 文献学视野下的王大圻印章款识研究 王梦笔
 “唯古为则”——论马光楣《三续三十五举》中的印学观 康佳琦、唐柱华
 论邓散木篆刻风格的生成 林立
 古玺印研 颠覆古玺印发展时段的穿带印“萧伟谨封”——试释中古时期私押印的复古之风 孙家潭
 古玺抉遗 19 则 林文彦
 新见“邑司空”玺考释 陈斯鹏
 《古玺汇编》玺印释文补遗及相关文字构形演变探析 庄哲彦
 附录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介绍 吴格、秦颖

十八、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时间：2020年11月13日至14日 地点：浙江杭州

印人与篆刻流派研究
 明清江南地区文人篆刻艺术 韩天衡
 李叔同常用印“文涛长寿”作者考 何连海
 黄易和陈焯交游考略——以陈焯致黄易三札为中心 梅松
 民国时期上海篆刻教育状况探析 张学津
 “古篆破金石”——胡正言篆刻研究 宋立
 金石友声，意在传古——吴让之与吴云交游考述 郑力胜、周逸阳
 “今日言印而曰不受西泠影响者，吾不信也”——傅抱石与西泠印社及名社员的交集考略 潘敏钟
 唐醉石先生早年汉上金石交游考 沈必展
 清初云间派交游考述 宋长吴
 赖少其篆刻三题 周新月
 印学文献研究
 学山堂中的汪关影子 孙慰祖
 汪启淑辑谱谱名、辑谱数量新考 杨庆
 《承清馆印谱》印章考略 郝长宁
 云斋事辑 杜志强
 《吴赵印存》及葛昌楹印谱辑拓史 戴丛洁
 《传朴堂藏印菁华》版本研究 何碧琪
 印学观念史研究
 大主吉凶：汉魏时期的相印术考论——兼谈中

国古代的“印章神异”观念与印学史之关系 孙志强
 张灏建学山园、辑《学山堂印谱》再研究——基于古代文人隐匿及空间艺术史的一种思考 周松林、张惠淇
 文献·器物·书艺——砖文书法在清代的审美寄兴与接受过程 刘昕
 “鉴赏考据”视域下的黄易金石研究 方小壮
 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
 余刃庖丁解 风斤郢匠成——元代篆刻的书刻分工与自书自刻 李庶民
 与丁敬、黄易并世善用碎切刀的印人——以《飞鸿堂印谱》为例 张炜羽
 试论“巧工司马”印断代与风格特征问题 朱琪
 吴咨古玺和“金文入印”研究 谢俊峰
 论清代学者篆书艺术之得失——以乾嘉时期《说文》学者为例 杨帆
 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
 宋代书画鉴藏印考辨二题——关于“文武师曹芾章”、“希世藏”及南宋绍兴装 田振宇
 耿昭忠、耿嘉祚父子鉴藏印研究 孙迦南
 王鸿绪书画鉴藏及聚散考 刘勇
 尽洗靡曼 曼玉敲金——《毛公鼎》出土时地与流传研究考释 孙洵
 无锡博物院藏黄易书画的再认识 秦明
 沈右《楷书送医师沈伯新序卷》题跋款印探析 陈道义
 革命先驱王秋涓的艺术品位及其交游考——以王氏旧藏北周造像拓片及题跋为研究资料 邹典飞
 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以陈介祺金石圈为中心的考察 徐发
 玺印文字研究
 後漢許慎の「説文解字」と近代以降の甲骨文・金文研究—白川静博士の東洋文字文化研究とわたしの印学（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与近代以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论及白川静博士的中国文字文化研究和我的印学） [日]久米雅雄
 《古玺汇编》释文补遗及相关文字构形演变探析——庄哲彦
 古玺印考证释注的多维博辨与音韵审定——以“甫易”四玺为例兼论“浮阳”假音转义及其渊源 郭清华
 秦文锦《金文集联》误字研究——以周毛公鼎铭集联为例 孙海燕
 古玺披遗（十则）——《匭鈇室藏古玺印选》释文订补（古玺篇） 林文彦
 域外印章研究
 西儒初问金石：阿塔纳修斯·吉歇尔论古文字

初探 [法]龙乐恒
 印信亦或护身符？古埃及的贝印——兼论古代中国的“贝” 杨斌
 中国境内出土萨珊波斯风格印章考略 吴佳玮
 中国东汉皇帝向罗马帝国来使颁印并授罗马皇帝金质官印考辨 蒋七二
 金石全形拓研究
 甲骨全形：殷商鹿头骨刻辞综考 李瑞振
 清许棫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及相关问题 李霁
 浙禾金石圈与全形拓的肇始 陆蕾平
 拓古为图：全形拓与晚清民国金石学术研究——兼论国图藏全形拓题跋中的考证与鉴藏 赵明
 全形拓入画的审美机制与文人意趣——以释达受、吴昌硕和黄士陵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冯健
 歙县程氏“铜鼓斋”收藏与释达受之交游考 董建
 清仪阁与早期全形拓 王艳明
 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时（1873—1876）的金石椎拓活动 胡鹏
 全形拓题跋、钤印的学术格辙与价值 葛复昌
 宝器名人巨拓——介绍两件百年前全形拓珍品 林乾良
 书迹版本良工论——以翁方纲为中心之考察 祝童
 附录
 马衡金石研究与全形拓技术的传薪——兼论马子云《金石传拓技法》的价值和意义 张雷
 全形拓早期图形考及发展流变研究 王仁海
 台北公藏《毛公鼎全形拓》调查和探讨其上题跋价值——兼论其在收藏上的定位 邓君浩

古玺印考证释注的多维博辨与音韵审定——以“甫易”四玺为例兼论“浮阳”假音转义及其渊源

文 / 郭清华

【摘要】

本文以“甫易”四玺、“浮阳”封泥与例印为参照，通过对玺文识形、辨字、释义、孳乳、假借等隶变的考察；援以古音生发、声转调变、讹变转注中音义关联的追溯；辅之地理、礼制、职官、印制钩稽的综合考量，从“形、音、义、理”析定诠释“甫易”之渊源流变以及“浮阳”置设的成因沿革。旨在就文取譬探寻“辨字隶古寻声求义，整体多维博辨论证”的思维模式与学术理念，希冀于古文字的阐释运用中，借以减除一意几出、义骈冗杂之误。

【关键词】 玺印考释 多维博辨 音韵审定 甫易 浮阳

文字作为考证历史的原始文本，自生发便承载着丰厚的人文信息；而能以自身直观辨识和确切表意绵连沿用至今者，唯汉字尤甚。然上从声发义例考定，下至艺术鉴赏，泛及承载者，皆不费声韵。虽古今音韵有别，缘其形义的相对稳定，故今多可独解且能寻迹辨字、溯音求其义；然有双音或多音多字如“参差”者，若崩析则其义不明而难于言表。唐兰先生曾曰：

旧式的训诂学家，往往不懂得“字”和“语”的分别，被字面所误，把双音节语拆开来，一个一个去解释。^[1]

若桎梏于此者易出多解和疑误，抑或导致强行附会训诂现象。故于此类时双声、时叠韵之双音节者，可弃文字之表以泝音浙义而悟之；但作为多个单音节构成的词语来说，它却可既生新意，又可拆分字表而溯及义变。这种“双音节从音领意”与“单音节复合词拆字溯变”的音韵学变通法则，加以旁征互考的辩证关系，为正确释读、辨义古玺印文字，拓展了宽泛的追究途径。



◎图1 甫（浮）易（阳）鑄市（师）鈇

本文撷取“甫易鑄市鈇”，“甫易都鈇、甫易都封人、甫易都右司马”与“浮阳丞印”封泥、“浮阳丞印”



◎图2 陈介祺《兮甲盘》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例印等为参照；依文字之本，从识形、辨字、释义、孳乳、假借与古音生发、声转调变、讹变转注的音义关联角度，以“形音义理”辨析兼辅地理、礼制、职官、印制为考据；尊经注互证从前说，以多维博辨参己意，借以隶定其时代、文字、形制抑或阐发国别、都邑置设与玺印规制的社会成因。个中实欲探寻一种“辨字隶古寻声求义，整体多维博辨论证”的思维模式与学术理念，谬误之处，尚乞方家指摘。

一、“甫易鑄币鈔”的释注与“甫易”考究

古玺印中，反映同一都邑置设、建制与官置者并非多见。“甫易”四玺与“浮阳丞印”封泥及印例的存世，为咨于故实究其沿革，提供了系列可证实物。

(一)“甫易鑄币鈔”文字略考

“甫易鑄币鈔”^[2]（图1），横3.9厘米，纵3.9厘米，现为天津博物馆藏品。陈紫蓬《燕陶馆藏印》1953年初录，原属天津艺术博物馆旧藏之物；罗福颐《古玺汇编》页二七 0158^[3]、李东琬《博物馆藏古玺印》^[4]、徐畅

《先秦玺印图说》有录，今释“甫阳铸师玺”。

“甫”，甲骨文为“𠂔”^[5]；西周《兮甲盘》^[6]（图2）为“甫”^[7]。该玺“𠂔”字，叶其峰先生等以多例“可证‘𠂔’为甫字”^[8]。“𠂔”字原多不辨识，由叶先生最先释出曰“鑄”^[9]；肖易夫先生依“中山王鼎”“信阳长台关楚简”等战国器铭文字也释为“鑄”^[10]；徐畅先生有考并援同叶释^[11]，印文释“甫易鑄币鈔”确切无疑。该玺印属，罗福颐定为战国燕系。叶其峰先生说：

甫易殆即文献的蒲阳。《史记·魏世家》：魏襄王六年，“秦降我蒲阳。”《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攻魏垣、蒲阳。”正义引《括地志》：“蒲邑故城在隰州县……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阳。”说明蒲阳战国是属魏，此可能是魏印。^[12]

徐畅先生以“战国燕玺”之论，未予认可叶说；仅凭一据，定为战国魏系“蒲阳”印属，窃以为似有不妥。从印例文字等辅征与罗氏《玺汇》二七页 0159号“郟铸师玺”（见下文）当系同类，定为燕系印属更为准确。

“甫易”词例，何琳仪先生释“浮阳”^[13]，依地缘应为秦统后之“浮阳”故地，即指今河北沧县东南旧州一带。何琳仪、肖易夫、徐畅等先生所考当有理据，窃附议“浮阳”之前有古为“甫易”一说。

(二)“甫易”词例之典出推勘

考“甫易”词例不见史典，然“甫侯”却有资可寻。

1. “甫、易”释注与构词

(1)“甫”，《说文》曰：“男子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方矩切。”^[14]“甫”字作为男子美称出于《礼记·曲礼下》，“临诸侯，眡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曰：“以不亲往，故祝辞称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称也。”^[15]本作“父”。清阮元《经籍纂诂》有：

父，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甫，甫始也。《周礼·小宗伯》“甫龔亦如之。”……《老子》王注：甫大也。……《仪礼·士冠礼》“曰伯某甫”，注：甫者，男子之美称。……《礼记·杂记上》称“阳童某甫”，注：甫，诸姜也。《诗·扬之水》“不与我戍甫”，传：甫，甫侯也。^[16]

又，“孔安国云：吕侯后为甫侯。”^[17]《诗·齐风·甫田》释为大也。《尔雅·释诂》亦为：“甫，大也。”又：“甫，我也。《礼记》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阳，予也。《鲁诗》云：‘阳如之何。’”^[18]

故甫字之释泛“父、始、我、大、美男、丈夫”等。

(2)“易”，甲骨文“𠂔”^[19]，金文增“彡”为“𠂔”^[20]。《说文》曰：“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彊者，众貌。与章切。”^[2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会易废矣。辟户谓之乾，故曰开也。从日一勿。从勿者，取开展意。^[22]

又《汉书·地理志》作“易”，交趾郡曲易县，颜师古释为古“阳”字。《说文》曰：“阳，高明也。从白易声。与章切。”^[23]《说文解字诂林》曰：“不言山南曰易者、阴之解可错见也。山南曰阳，故从白。”^[24]《释名·释天》曰：“阳扬也，气在外发扬也。”^[25]所存诸解多泛衍其类。

《说文》曰“浮”：“汜也”，实“汎也”。段《注》说汜为浮，“是汎、浮二字互训，与汜、濫二字互训义别。”^[26]《广雅》曰：“浮，漂也。浮游也。”《释名·释言语》曰：“浮，孚也。孚甲在上称也。”^[27]依阴阳五行学说，上为阳，下为阴。汉代刘向认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28]，《易·说卦传》曰“乾为冰”，阳也，故冰浮之于水者亦为阳。

甫、易二字组合成“甫易”一词，依字义析之，应具“父始或诸姜裔男于广大高明阳气外发之地”的显性词意，从玺文看为封邑地名无疑。然“甫易”一词究竟何解？其隐义信息缘出何时、何处？遂上搜下逮，据丝理禁，可见端倪。

2. “甫易”晦义之类推

据《史记·周本纪》载：“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29]有“甫侯”“甫刑”之说。有汉孔安国所云，即此“甫侯”指“吕侯”。南宋蔡沈《书经集解·周书》中于“吕刑”注曰：

吕侯为天子〔周穆王四十年（前937）〕司寇。穆王命训刑，以诒四方。……《书》《传》引此多称《甫刑》，《史记》作“甫侯……”吕，后为甫欵。^[30]

《竹书纪年》确切记为（周穆王）“五十一年（前926）作《吕刑》，命甫侯于丰”^[31]。由此可知，“吕侯”即“甫侯”，《吕刑》即《甫刑》。然为何“吕、甫”互称，而《史记》作“甫”呢？

《国语·周语》有曰：齐、许、申、吕由太姜。据宋郑樵《通志·氏族略》载：

吕氏，姜姓，……炎帝之后也，虞、夏之际，受封为诸侯，……佐禹有功，封于吕。^[32]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河南六》曰：

……虞夏时国，周亦为吕侯国。穆王以吕侯为司寇，作《吕刑》。《国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是也。^[33]

也就是说，吕氏系炎帝后裔，授赐姓姜氏吕，因夏时封侯爵，遂有姜姓诸侯之吕。至周穆王五十一年（前926），缘赖吕氏为其所用，遂有“吕侯”受命修订“刑辟”，时称“吕侯”之《吕刑》。宋王应麟《诗地理考》有引：

甫，《书》吕刑；孔氏注：吕侯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唐世系表》“宣王世改吕为甫”；朱氏曰：“甫即吕也，亦姜姓”；吕刑《礼记》作“甫刑”，当时盖以申故而并戎之。^[34]

周宣王静（前827—前782）复兴间，或缘“诸姜”“吕侯”与周室同祖“甫”，为有别于前“吕侯”改封其（或后嗣）为“甫侯”，是为确切初缘，此为其一因。后人因之，或揣测穆王昭示《吕刑》^[35]，于诸侯、大臣等贵族诸“甫”者存有告诫之意，而后改曰“甫侯”并《甫刑》，此为其二因。太史公作《周本纪》称“甫侯”与《甫刑》或盖因此。

同属“甫，诸姜也”，还有炎帝后裔姜姓有郅（封于郅）氏之女姜原所属。《周本纪》载“姜原为帝誉（高辛氏）元妃”^[36]，系“后稷”（弃）之母，“后稷”缘其太王所居周原故得号为周。“姜原”因出外野游，踩巨人足迹而得孕生“后稷”，“以为不祥”，遂弃之多处，然众生皆佑之^[37]，后因“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遂以为神示而养育，故有“初欲弃之，因名曰弃”一说。尧帝“举弃为农师”，因“有郅氏”生“弃”而封于郅；舜亦“封弃于郅，号曰后稷，别姓姬氏”^[38]。故说“周后稷（弃）”实为炎帝后裔姜姓有郅氏之外戚、帝誉之贵裔。遂有周男子之“甫”称，是为称“甫”为“父、始”缘起。

从所考典籍看，按前析“甫易”之义，全备其要素者唯周后稷（弃）一人。据《周本纪》“别姓姬氏”裴骈《集解》载“《礼纬》曰：祖以履大迹而生”，视后稷（弃）

为周之祖（始父）；后稷男身生于冬为阳，被弃浮冰上为阳，冰浮于水为阳。或为“甫易”典出之初。

综上所述，“甫易”之出，盖有以下几点：

一是视后稷（弃）为周之始父（甫）祖，因被弃于浮冰而有覆荐，实为否极泰来上上阳之象，故有“甫易”之义。西周时或因此假祖迹托其名，封诸侯赐“甫”地授“甫易”之称。

二是上古炎帝后裔姜姓吕氏，夏时封有“吕侯”；周穆王命吕氏“修刑辟”称《吕刑》，宣王因“诸姜”之“吕”与周室同祖甫，为别前“侯”改“甫侯”。后人因其“父始或诸姜裔男于广大高明阳气外发之地”而曰“甫易”。

三是抑或宣王间，因改封“甫侯”后，有承继于周召公奭的燕属边鄙阳广阔之新地者，缘继“甫侯”前名，遂渐成“甫易”之聚邑，后为都；或由“甫侯”后人承继再次封用而得之^[39]，姑视“甫易”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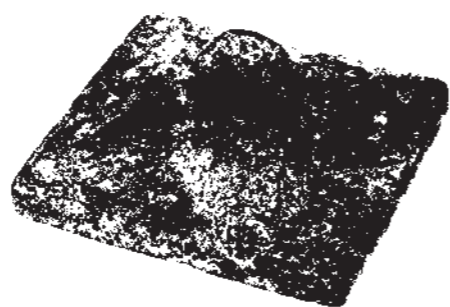
从上述梳理看，“甫易”缘起与周室相关联无疑。此虽为类推，然不失为一说多解。“甫易”一词，虽非典故，然确有“典”之“故”，当视为典故之出，或有说与周之尹吉甫相关者，以待详考。

（三）“甫易鑄币鈔”与“郟鑄币鈔”同为燕系印属与“甫易鑄币鈔”同类者，有罗福颐《古玺汇编》页二七 0159“郟鑄币鈔”，横 4.3 厘米，纵 4.3 厘米，又有页二 0010“郟都司徒”^[40]（图 3），横 2.05 厘米，纵 2.05 厘米。“郟鑄币鈔”第一字“𠄎”，徐畅^[41]、王辉释为“郟”，有释“𠄎”者，似为不妥，窃依其形变历经“辞例推勘”认与两先生同。



◎ 图 3 郟都司徒

王辉说：“从邑豕声，应读同涿，涿原为水名，见《水经注》，汉置县，唐改为范阳，今仍名涿县。”^[42]即今之“涿州”，古曾为上谷之属。依文字演变分析，经历了“郟”从古“涿”音，去“水”增“邑”变为其都邑专属字，又从“郟”重回“涿”字为后用的过程。从邑豕声之“郟”者，古当有都邑也。其“甫易”用“甫”不用



◎ 图 4 郟铸师玺

“郟”，或有别于“亭名也，在上蔡”^[43]之“郟亭”。《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有“郟铸师玺”^[44]（图 4）著录，经与《玺汇》0159 号相比较，虽稍有别，但应属同物抑埴轻重所致；初录见黄濬《尊古斋印存》，后为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所藏之物。

汉横宽《盐铁论》载，御史大夫桑弘羊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45]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涿邑系燕属之（上谷）重地，缘邑东南有“燕国粮仓”之称的“督亢”膏腴之地，时名甲天下，遂有燕太子丹遣荆轲献“督亢地图”刺秦王的“图穷匕见”之说。于此，《战国策·燕策三》、《史记》世家列传等均有记述且有详者，荆轲所献之图即涿邑所属“督亢”一带地域。时因“郟”邑属燕地，故“郟鑄币鈔”为燕系印属的涿邑官署“铸工”之印信。

“甫易鑄币鈔”与“郟鑄币鈔”字形篆法、印制相类同，故“甫易鑄币鈔”也当属燕系印制。

（四）关于“铸师”

“𠄎”字依前文叶其峰说，释为“铸”。通检甲骨文见有“𠄎”（五期金五一—）、“𠄎”^[46]等与金文“𠄎”、“𠄎”、“𠄎”（鄒子妆簠）、“𠄎”（艾伯鬲）、“𠄎”^[47]（汤叔尊）等字构成，其形多上存双手持作之状，下具炉

火熔金之皿态，皆相类。西周早期会意加声符者较少，后渐趋转化形声现象较普遍，至春秋近乎小篆的形声构字已有形成。在文字从会意向形声、从大篆向小篆的渐进过程中，除字形演变的简化原因外，其声符添省的随意性，或与地域冶铸文化发展因素有关。就目前可见吉金资料反映的文字状况看，春秋战国仍以会意文字为主流。^[48]从叶先生之释，是为确切。

“币”，今读为“匝”，《说文解字》曰：“周也。从反之而币也，凡币之属，皆从币。”^[49]即反“业”为币，意指围周、群集也；师字“从自，自四币，众意也”。《师寰敦》《蔡大师鼎》《钟伯鼎》之“师”，其书体皆为“币”之金文，孳乳为师字^[50]，故“币”释为“师”已为共识。

“铸师”不见《周礼》，然其《考工记》总叙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为冬官之记载。百工泛指制造器物各业工匠或管理者，缘其事涉国之营造，故百工为司空之属。郑玄《注》曰：

百工，司空事官之属。……掌管城郭，……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51]

虽无“铸师”但有“筑氏”，《周礼》载曰：

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剂），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铸器，桃氏为刃。^[52]

实为掌管冶铸配方与铸造金属乐器、量器、农具、兵器的铸工工匠，故凡事关冶铸之个人、群体或官职皆可称“铸师”。^[53]

先秦燕属地域，其冶铸业非常发达，在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境内）的多次发掘中，有多处冶铸遗址发现，出土文物涵盖了各类铜铁器具，其中铸铁锻化、渗碳钢、脱碳钢以及铁范铸器技术的发现，突显了当时燕国冶铸工业的领先地位。“甫易”即考之“浮阳”，东周属燕境，距燕下都较近，受其影响，当时“甫易”都邑的冶铸业也颇为兴盛，其地望在今河北沧县东南旧州一带。

有鉴于此，可以推定：春秋战国时，作为手工业管理者的工官称为某师（工币），而从事冶铸业或管理者，同如“甸、医”等应为“铸师”，故此玺属“甫易”都邑职掌冶铸的工官玺印。以音韵分析，“铸师”为“筑氏”应系近古音系中的转注古音现象。

综合以上诸说，文释“甫易铸师玺”可谓确切，印系

归类也当无疑。无论从文字、形制、地理、地名乃至音韵学等多维分析，该玺应为周宣王之后至春秋早期燕系所属“甫易”邑中职掌冶铸的工官凭信之物。

二、甫易“都、封人、司马”的钩稽

“甫易都鈔、甫易都封人、甫易都右司马”三玺，缘于形制、规格、文字、铸造乃至制度等基本属于同系所出，故列同考。

（一）“甫易都鈔”之“都”析

“甫易都鈔”，横 2.25 厘米，纵 2.15 厘米。林廷勋辑《玺印集林》有录^[54]；徐畅《古玺印图典》3865 转录^[55]（图 5）。同类属有“郟都吴（虞）”^[56]（图 6）可参，横 2.1 厘米，纵 2.05 厘米。



◎ 图 5 甫（浮）易（阳）都鈔



◎ 图 6 郟都吴（虞）

“𠄎”^[57]、“𠄎”释“都”。其原篆左从古“旅”字，右从“邑”，然此“都”左右结构互换，其“印文‘都’的写法为燕国官印所独有。地名称‘都’，也是燕的一个显著特点。……‘都’即有城郭的大邑”^[58]。

在早期字书中，与此结构类同者仅见北宋郭忠恕《汗简》^[59]之“都”字，故多释为“都”。在考古发现的玺印、青铜与陶器铭文中，也只有战国燕属“都”字别于他国，故凡此“都”者皆从燕国之属。

“都”者，古文为“𠄎”^[60]，《说文》曰：“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赞声。”^[61]《春秋·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曰：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62]

又《隐公元年》记说，依先王之制，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周礼·小司徒》载有“乃经土地……四县为都，以任地事”^[63]，并分别叙述了其置设礼制；《礼记·坊记》有“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64]之制。《周礼注疏》孔颖达疏曰：

云“造都邑”者，谓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边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诸侯有四疆也。^[65]

据《周礼》郑玄《注》说：家邑最小系大夫采地；小都为卿采地；大都是公（包括王子弟）的采地。贾公彦《疏》曰：家邑最小，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王都外二百与三百里的家稍之地，常为大夫采地；距王都三百至四百里间的邦县之地，有卿之采邑者，称小都。^[66]

由此可见，周代除天子之都外，大凡封国，其君居之地有城垣，且封有置设象征宗法地位的太庙或先君祀庙之城邑皆称“都”；个中规模虽达定制，但未有封宗庙社稷供奉者皆为“邑、筑、城”。

关于都的说法，《周礼·大司马》有载：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之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67]

其“九畿、国畿、侯畿”的界定与职限，等同于（职方氏）方域中“九服、王畿、侯服”的规制；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68]。《书·禹贡》也说：“五百里侯服。”^[69]皆类同。夏制与周制均指王（天子）城周围千里以外方五百里的地区，旧说以（禹贡）所记为夏制，（职方氏）所记为周制，实为周承夏制。

按古代量器之“度”制，有“引、丈、尺、寸、分”，合谓“五度”。春秋有三百步为一里曰井田之说；汉有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之记载，其制唐后有改。今见汉物实尺长 23.2 厘米，依此推算，先秦的里约今 415.8 米。

“甫易”春秋属燕，其故址与燕都之蓟直距约 200 千米，计周秦汉制 490 余里，属国之五百里定置。1992 年中日《穆天子传》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秦前之“里”指“短里”，约 77 米，尚在争议。依周制计，“甫易”（依浮阳计）距周（天子）之两都，其直距均为逾千里之外所属，当系附庸小封“都”；按当时封都之侯，其族、仆、役、卫、司人等置设及所需生产人口，也为小封君之“都”；故又推，假设燕国之都有一二万人，其下属旁邑，若系小封君宗邑或都邑，则至少应有一二千人，也符合“小都”规制的置设。

综合上述，前文“甫易鑄币鈔”应为封“都”之前的大夫采地家“邑”所属，即称“邑或筑”而不称都，时限约在西周宣王至春秋；依典制分析，“甫易都鈔”铸用称

“都”时，当为邦县之地的卿采地小都，且有宗庙社稷或先君供奉，并置设各类职官，依文字参比应限定在春秋中期燕属期间所属。

换言之，“甫易都鈔”系“都”后之物，前文所析“甫易鑄币鈔”为成“都”前物。鉴于史上僭越与循守共存，因托邑做大，假“循守”实“违僭”而得封都者，也并非鲜见。

（二）“甫易都封人”之“封人”

“甫易都封人”，横 2.0 厘米，纵 2.0 厘米。罗福颐《古玺汇编》页三三 0192^[70]有录；徐畅《古玺印图典》3869^[71]（图 7）等多转录，现藏故宫博物院。



◎ 图 7 甫（浮）易（阳）都封人

“甫易都封人”第四字，释为“封”，其甲骨文为“𠄎”（一期合五七）、“𠄎”（五期合集三五六三〇）、“𠄎”（三期京四四九九）等^[72]；金文为“𠄎”（康侯丰鼎·西周早期·04.2153）、“𠄎”（六年珣生簋·西周早期·08.4293）、“𠄎”（伊簋·西周晚期·08.4287）等^[73]。甲骨文“丰”似以土聚堆，植树木于其上形状，为封字初文。^[74]《说文》释“封”曰：“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75]又《金文形义通解》于“封”所解可谓详尽。^[76]从玺文分析，应为上下合书之金文“封”字。

徐畅先生释该玺四、五两字为合文“封人”，曰：

“封人”典籍中习见，职掌封疆事物之官。郡县也设封人。^[77]

其理据缘同汤馮惠所述^[78]，笔者附议，故说“甫易都封人”玺印证了“甫易”当时已是具有城郭的大邑，同时也完备了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

“封人”源起周司徒之属官，掌“邦教”，职守帝王社坛及京畿边界；其“封”指聚土植树以识疆界，后引为疆界。据《周礼·封人》载：

掌设王之社壇，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79]也就是说，依周制，除王之社稷与畿封事物设“封人”

掌管，其诸侯国与各地所建都邑，都应依此制设置“封人”一职。除负有沟封划定疆界之责，又有各类兼职，其下也应有属吏辅之。

春秋战国时，疆域变化频频，大国置“封人”勘定镇守边鄙较为普遍；有典籍记载，小国抑或戎狄之邦也有“封人”之置。春秋“封人”的最早记录见于《左传·隐公元年》：“遂置姜氏于城颍……颍考叔为颍谷封人。”西晋杜预注：“封人，典封疆者。”唐孔颖达释曰：

天子封人取典封疆，知诸侯封人亦然也。《传》言祭仲足为祭封人，宋高哀为萧封人，《论语》有仪封人。此言颍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盖封人取典封疆，居在边邑。^[80]

依孔说，周的典守封疆之官至春秋时，于“封人”之前冠地名，变为驻防边鄙的疆吏，而且多设置于诸侯之国。故陈士元认为：西周“封人”一职主要掌管置设社壇、造都邑；凡属祭拜、丧纪与来宾送客、军旅会盟之事，只管准备牺牲祭品与物什。

其曰凡封国，封其四疆，谓其封建如此，非谓其守封也。故封人属于司徒，掌疆属于司马。亦以国之大故及用兵之时，掌疆乃其所及耳。然春秋封人皆在边邑，实掌疆之职，岂成周之初以封人分疆？^[81]

由此看来，作为西周大司徒属官的“封人”，掌开掘畿上沟堑、土封树固疆界，兼及诸事，并无常驻守边防御敌职能。从世存与新见资料分析，周制“封人”与“司徒”皆系中央之官，“司徒”等同或高于“封人”。至春秋后，“封人”则由中央属官变为强化驻防边鄙职能的疆吏，虽所掌聚土封疆职责未变，但已无祭拜、治丧、盟会等兼职；其职守边域的地方化功用，仍承继周制“为畿封树”的职能划定。依此玺看，当与前玺同属春秋中期燕系，且为“封人”前冠“甫易都”地名的都邑属官之信玺。

（三）“甫易都右司马”之“右司马”

“甫易都右司马”玺，横 2.1 厘米，纵 2.1 厘米。罗福颐《古玺汇编》页一〇 0060^[82]有录；徐畅《古玺印图典》3835^[83]（图 8）等多转录，现藏故宫博物院。与前例“邾都司徒”同系属。

“司马”作为古职官名，缘于冷兵器时代马匹与战车的重要性，实指专司马匹之官。其职传始少昊，实为殷商始置。《周礼》有“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



◎ 图 8 甫（浮）易（阳）都右司马

以佐王平邦国”^[84]之载，周为夏官大司马之属官，位次三公，与六卿相类，与“徒、空、士、寇”司职者合称五官，掌辅邦政，职军旅理赋事。缘其“寓兵于农”“寓将于卿”之故，周“司马”作为军事要职，与司徒、司空共掌国事，是为“三司”。除主田猎操教、执赏诛、掌军赋外，兼有“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85]等非军事职能。春秋晋作三军，每军别置司马；战国沿置，其后延之有改。

《史记·曹相国世家》有曹参“西击秦将杨熊军……，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86]之载，故说秦因之。汉武帝初期置大司马加封大将军号，后于骠骑将军者有之；其宫门、大将军乃至校尉属官皆置司马；时边郡亦置千人司马，掌兵不理民事。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改太尉为大司马；后汉因之，旋改名太尉。魏晋后，州刺史带将军开府者，置府僚司马；南北朝与大将军并称二大。至隋唐州府之任，无复司马，而有治中。其后考于此文无意义。

《周礼·夏官》有“都司马，每都上士二人，……家司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马”^[87]等定置；又谓：“都司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掌其政学，以听国司马。家司马亦如之。”^[88]个中不难看出“都司马”是指大小采邑之都或士大夫采邑私家之司马，分左右掌职，虽以事类附列《周礼·夏官》且听命于国大司马，但实非大司马之属官。司马于《左传》《国语》《荀子》《汉书》等典籍史载颇为详繁，无一僭越《周礼》，实皆承周制，故从略释不再引征，此玺“右司马”当为春秋中期或下不过战国的燕属“都”邑司马之一。

由此，结合文字、形制，定为与前两玺同期的燕系“地名+官职”都邑属官之玺。

（四）小结

古之城置，《史记·五帝本纪》有：一年所居为之聚，二年可为邑，“三年成都”^[89]之说，应指都邑的形成过程，而非典制。依前文所析“都、邑”之置制，虽非单指置官职务或有宗庙社祀者而言，但从“铸师玺”印例看，

应有未成“都”前之所用玺印皆不加“都”字定制。故有文曰“甫易铸师玺”，其出现年代应上不过周宣王静（前827—前782）下可至春秋早期。

春秋战国，缘旧制受封诸侯于属内可再行封置，且允置官建武，征赋役，以致其城邑势力作大为“都”；或有周室所封享宗庙社祀之礼的同祖之系属者，以“都”称。依周制计，“甫易”直距周之丰镐、洛邑二都均系逾千里所属之地，属“千里、五百里之外”规制而置都。遂有“甫易都”之建置与管理，并以“地名+都+官职”印式而成制，是为“甫易都”三玺所来源。

上述三玺之“司马”之属为周置而于后世有承置，然“封人”仅见《周礼》或因周后乱废无载或未见实物有出，若依“封人”玺为分水，缘三者之文、形、制相同，故说“甫易都鉢、甫易都封人、甫易都右司马”属同期之物，当为春秋中期或至晚不过战国前期的燕属承周之都国所用。

三、“甫易”与“浮阳”假音转义的音韵追溯

汉字的生发传用进程中，一直存在着通假现象。在汉字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前提下，伴随其“语言中的绝大多数词在书写时都各有专字，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仍不写本字而以音同或音近的字代用”^[90]。这种可相互替换的近音代用通假现象，存在着有本字“代”用与本字“通”用两种情况。然个中无论其义与本字有无关联，纯假音托义、引申、转注或改赋新意的近音代用现象也属常见。“甫易”变“浮阳”即属上古、近古音系统中，近同音代用现象的典型词例。

（一）“甫”“易”的音韵分析

1. “甫”，甲骨文为“𠂔”。《说文》反切为曰“从用父，父亦声。方矩切”^[91]；《唐韵》方矩切，《集韵》《韵会》匪父切，《正韵》斐古切，从音斧；音 fǔ。

考上古音系的先秦声韵，高本汉系统未注韵部，其声母 [p]，韵母 [iwo]；王力考韵部归“鱼”，声母 [p]，韵母 [iŋwa]。中古音时期的（魏晋）韵部归“鱼”，韵母 [juo]；南北朝（齐、梁、陈、北周、隋）音系的韵部归“虞模”，韵母 [ju]，则少了 [o] 音；（隋唐）时高本汉系统拟音声母 [p]，韵母 [i.u]；王力系统声母 [p]，韵母 [i.ü]。以此分析，“甫”的中上古音读作“pú（菩蒲）、pǔ（普

谱）”。那么为何后来读“fǔ”了，究其因在于古唇音之重（双唇）、轻（唇齿）不清无分之故（详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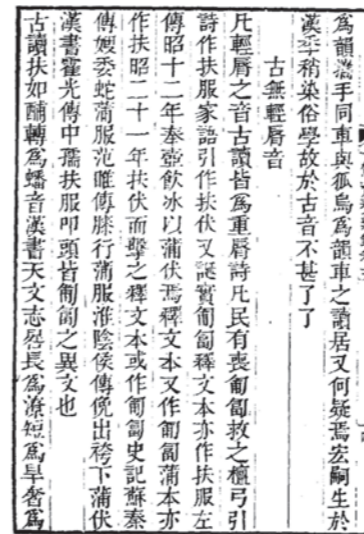
从上古声韵追究，其声符为“甫”、韵部“鱼”，对应《广韵》的小韵为“甫”，拟 [pa.] 声；依甲骨文字形析之，更像蔬在田而不似父声。《广韵》为声母“帮”，韵母“虞”，属上声三等调值，韵“虞”之目，韵系属“虞”、摄（概括）“遇”，“方矩切十九”^[92]。《中原音韵》其声母则明确为“非”，韵母“鱼模合”，属“鱼模”部上声，宁继福先生直注为 [fu]。至明《洪武正韵笺》小韵为“抚”，韵目“五姥”、韵部“模”，反切“斐古”，声调与前同。清道光十八年（1738）的《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93]作为该书可见最早本，虽为刊载粤语音的韵书，但属源自北方古汉语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其所录音韵系统不可能早于明末清初，书中“甫”字归类则为声“非”、拟 [q] 音、韵“孤”，韵部虽确切为“第十二孤古故”，然却拟 [o] 音，更未注反切，而美国《英华分韵撮要》^[94]则记为 [ú、ò]；有认为拟 [o]，也有认为是在裂化过程中 [o]、[u] 渐为不清了。窃虽倾后说，但个人以为：自明洪武后的一统，尤其是北方汉语的直白生硬更是逐渐省略或丢掉了这个介音（韵头）[o] 直呼为“fǔ”了。

2. “易”字，甲骨文“𠂔”，金文“𠂔”，诸解多通。《说文》《唐韵》皆“与章切”，《集韵》余章切，《正韵》移章切，皆音阳。前述“曲易”之易，颜师古曰为阳之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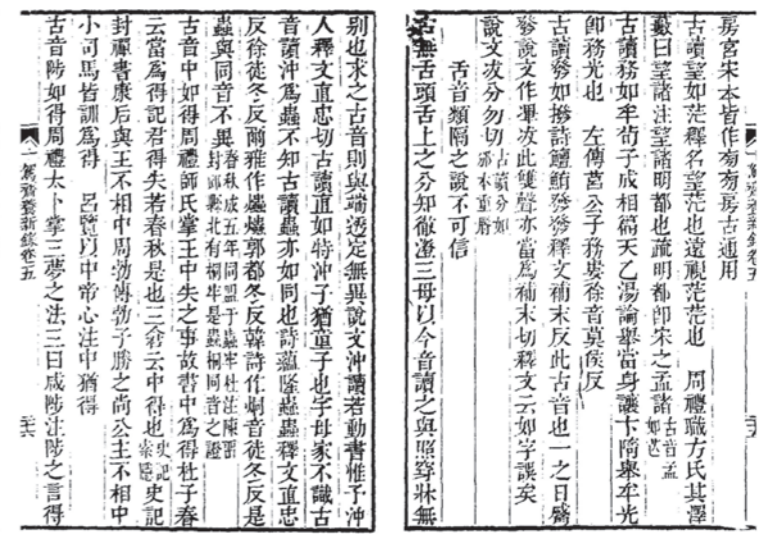
考“易”上古音系，声符为“易”、韵部“阳”，对应《广韵》小韵“阳”，拟 [la.] 音；甲金文均像日光下射，为阳之初始文。《广韵》声母“以”，韵母“阳开”，平声三等值，韵“阳”之目^[95]，韵系属“阳”、韵摄“宕”，与章切。《中原音韵》声母“影”，韵母“江阳齐”，属“江阳”韵部上声阳平。《洪武正韵笺》小韵系“阳”，韵目“十七阳”、韵部“阳”，反切“移章”。《分韵撮要》曰字头为“阳”字归小韵，声“以”韵“张”，韵部为“第九张掌帐着”，未注反切。“易”字古今音韵追溯皆无变化，至今认读“yáng”，无争辩。

（二）“浮阳”之“浮”的音韵分析

浮，《说文》“浮，汜也。从水孚声。缚牟切”^[96]；《唐韵》缚牟切，《韵会》与《集韵》皆房尤切，《正韵》房鸠切，音从果。《论语》：“乘桴浮于海。”又《集



◎ 图9 钱大昕著《古无轻唇音》



◎ 图10 钱大昕著《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

韵》：“浮沟切，音桴；漂也。”段氏《说文解字注》有曰：“汎也，各本汎作‘汜’，正为‘浮’。即汎，浮也，二字互训，与汜、濫二字互训义别。”

凡“浮”字之释注，无论从其本义或变化词性及引申，皆存“表、面、不实、虚空”或兼有“上”之义。

“浮”字在上古音系中，声符为“孚”、韵部“幽”，与《广韵》小韵“浮”对应，拟 [bu] 音；《广韵》声母“并”，韵母“尤”，平声三等值，韵“尤”之目^[97]，韵属“尤”、摄“流”，缚谋切。高本汉曰 [b^hiaŋ]，王力、邵荣芬为 [biəu]，推导现代汉语为 [fouǎ]。《中原音韵》为小韵“扶”，声母“非”，韵母“鱼模合”，属“鱼模”部阳平。《洪武正韵笺》小韵为“浮”，属韵目“十九尤”、“尤”部，反切“房鸠”，声调平声。《分韵撮要》曰字头为“浮”字归小韵，声“非”韵“修”，韵部为“第五修秀”，声用阳平调。据此可推为，“浮”字声调的演化，同属于 [o]、[u] 的裂化过程中含混不分，进而省略丢掉 [o] 呼为“fú”，而非非高本汉、王力、邵荣芬等所指上古音系“上声”字的“fǔ”了。

（三）“甫”、“浮”同（谱）声假借转义（近音代用）的孳乳理据

在《广韵》中，“甫”声“帮”，“浮”声“并”，两者虽声母部属不同，但同系汉语“三十六字母”^[98]第一行唇音中的“帮滂并明”双唇重音，现代语言学为双唇

音；“浮”属轻唇音，是现代的唇齿音。然而，在唐宋前的中、上古音系中没有轻唇音（唇齿音）吗？

清人钱大昕在前人声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99]（图9）的演化规律，他通过大量文字语音实例证明了汉语声母《古无轻唇音》与“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100]（图10）的论断。也就是说，在“三十六字母”中，唇音声母“非”组的“非 [pf]、敷 [pf]、奉 [Á]、微 [w]”音在中、上古音系里不单独排列；这组音在中、上古读若“帮”组的重（双）唇音声母“帮 [p]、滂 [pʰ]、并 [b]、明 [m]”。换言之，依照轻唇（唇齿）音声母出于重（双）唇音声母的演变规律，“非、敷、奉、微”之音是在唐末宋初时从“帮、滂、并、明”四声母列化而来的，也就是由 p→f，双唇塞音变成了唇齿擦音。

然而，钱氏《古无轻唇音》的论断并非新出与独见，同期前贤惠栋已有归纳，其例证是在传世典籍中发现了重唇字与轻唇字读音相通，然而相通并非证明古无轻唇音。钱氏虽从谐声偏旁、文字通假、方音以及域外对照音等加以比较，缘于诸多因素制约，其阐发未必逻辑的科学严谨。但其所论，仍被现代学者视为定论而认可。从现在来看，其论断规律的发现与汉字的字、音孳乳现象不无关系。

仓颉造字之初，多据其类而像其形，视为纹（文），

故许慎《说文》序曰：“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01]

从许说，汉字自始，便有谐声孳乳现象存在；今实可系统考查者，则见于甲骨时期。早期谐声多先假借，而后于假借之字加形、声符而替之。自周后，随着字形表意的构字式微与形声构成功用的加强，同声通假现象也趋日盛。依语言“社会经济性”原则，周至汉初，使用同声通假的人口、文字数量存在与形声构成的生发是一致的；其假借字创制增加的目的是构成专属用字，借以减少假借之误。^[102] 仅就形声字中形、声直接结合的统计文字数据比例分析，验证了其后的同（谐）声通假现象。

汉字“一音表数义，数义共一音”现象源自造始，文字的假借与谐声有着相同的规律。在上古语例中一字多音是常态，借与被借者必音相同，不然无以为借。然而，随着一字数音向一字一音转变之趋，诸多假借与被借之间本应同音，却出现了异读，这便出现了近音可假借假象。谐声者同样如此，潘悟云先生拓宽了段玉裁《古谐声说》中“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谐声必同部”^[103] 的说法，他认为：如两字可互为谐声，必为完全同音者，“如果不同音，一定要是语音上形态相关”^[104]。正如“甫、浮”，在中上古与今虽不同音，但两字发声送气属于语音上的形态相关，同时这种观点也证实了前面所说的重唇音与轻唇音分化问题。

早期文字学家多“重形不重音”，清人戴震系首倡，他在序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曰：

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105]

即说意义指内容，声音是形式，故他提出考求词义理当打破字形约束而“各从其声，以原其意”的“因声求义”主张。这种在清代被视为“科学的音义关系”理论得到了弟子王念孙与段玉裁的发扬，以至于沿用至今。王念孙因古音“音转”规律，故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

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106]

故沈兼士亦曰：

语异而义可通，字别而音犹近，词类无间于事物，

音读不拘于单复，所谓“孳乳”“字族”者。^[107]

依上述的逻辑推导，“甫”从上、近古重（双）唇音为“pú、pǔ”，“甫易”则属就古音求古义之例。当“甫”分化为轻唇（齿）音“fǔ”后，“甫、浮”则系“字别而音犹近”，应属同谐声必同音必同声部，但借“浮”代“甫”有违规之嫌。在考其“浮阳”地缘后，当系为假古音“孳乳”转注法，以非同一“字族”转义之现象，故有“浮阳”词例构成，实为假近借音实转另义而为之。

在“甫易”与“浮阳”的转化过程中，因近音谐声中同音转注现象，故“甫、浮”属同声部，同为 fou 声，两者在“浊音清化”的变进中皆省略了 [o]，将“甫易”释曰“浮阳”，于音韵学上可谓有据可依。从词源学角度看，两者同属“语音、形态、语义”相似对应同构；系同一维度不“再分析”整体“词义”，且共有孳乳“事、义”类的音转、理据同源词性，如：前缀词+山南水北（阳）。^[108] 从地理渊源考证，有释别地者，其地缘史载与该印属多不相干，故“甫易”释指后来的“浮阳”更为确切，但实属音同地同而内涵不同的两个名词。

四、秦“浮阳丞印”封泥与汉“浮阳丞印”所属置制及地理因缘

今见之“浮阳丞印”封泥与“浮阳丞印”，可为“浮阳”城置历史提供实物见证。

“浮阳丞印”封泥^[109]（图 11），《秦封泥汇考》^[110] 著录。从封泥文字及田字界格形制与早期“甫易都”三玺相较，印风绝异，抑埴之印当属秦系印风，应为秦统一六国前灭燕有置或统一六国后之物，当系秦置县遗物无疑。



◎ 图 11 “浮阳丞印”封泥



◎ 图 12 浮阳丞印

另见故宫博物院藏“浮阳丞印”（图 12），横 2.25 厘米，纵 2.25 厘米，《秦封泥汇考》《汉印三百品》^[111] 有

转录。该印无界格边栏，为阴文凿式印制。印文之“阳、丞、印”与西汉“山阳尉丞”“阳曲令印”等诸印篆法皆同，应为秦末汉初官印。

“浮阳”于秦置三十六郡时，或无详载或有纰漏，然其封泥实物的出现，足以证明系秦统一六国（前 221）前后之物；故说“浮阳”应初置于秦，而非汉始，抑或汉初承秦制而为之也无不可？而无界格“浮阳丞印”，当系汉高祖（帝）五年（前 202）后置设之物无疑。

（一）“浮水”略说

“浮阳”一词，多释为：“地名。汉县，以在浮水之阳而得名，属渤海郡。隋开皇十八年改为清池县。”^[112] 据《汉书·地理志》载：

渤海郡，高帝（前 206—前 195）置。莽曰迎河。属幽州。……县二十六：浮阳，莽曰浮城……^[113]

时郡治浮阳，这是较为确切的始置记载，后汉改属冀州。《读史方輿纪要》载沧州乾符城说，其州（治饶安）东北八十里为浮阳县之地，意指旧城在今河北沧县东南旧州。

浮阳之来素有多说，通行指今沧县旧州城南有浮河，也称浮水，东入盐山县境。据《水经注》曰淇水又往东北经广宗县之东，为清河，其《经》载清河又向东北经浮阳县西；酈注曰：“清河东北，浮水故渎出焉。”酈又自考断曰：

按《史记》，赵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阳之称者。盖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渎，河之旧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别，是县有浮阳之名也。（浮水）首受清河于县界，东北径……，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浮阳县，浮水所出，入海潮汐，往来日再。今沟无复有水也。^[114]

“清河”又北分二渎，所谓：“枝分东出，有谓之浮渎。”“又北径浮阳县故城西，王莽之浮城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骁骑将军平乡侯刘歆为侯国，浮阳郡治。”^[115]

其支分东流称浮水者，即指此。《水经注》扩略了汉代“浮水”的流经与浮阳来源。由此可知，至东汉应劭考证时浮水早已枯竭。缘于隋大运河开凿与人工干渠地挖掘，河道走向几变，今已难辨古浮水之流经。至宋，据《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有“沧州”“治清池县”，“……望，清池：有浮阳水、徒骇河。”^[116] 其志所述，延之旧说。

（二）“浮阳”起迭

唐《元和郡县图志》作为古代政区沿革有系统记述的地理总志，其卷十八“清池县”条有“清池县：紧，郭下。本汉浮阳县，属渤海郡，在浮水之阳。后魏属沧州。隋开皇十八年改为清池县，以县东有倅清池，因以为名。倅清池，在县东南一十五里”^[117] 的记载，是说有河床高于地如悬浮之河水流经城邑东南。《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清池县”有更为确切的记述：

本汉浮阳县，……以在浮水之阳。……浮水，源自东光县南界，永济渠（原淇水）分出，东北流经州……，又东北入于海。故《土地十三州志》云：“浮水所出，东入海。”……永济河，在县西三十里，自南皮县来，入乾宁军，今亦呼为御河。迎河，在县西南二十三里，从南皮来；《輿地志》云：“南皮北有迎河，分漳河，入浮水。”^[118]

上述记载多有复录与略考，其河渠流水皆指《尚书·禹贡》描述的黄河泛滥所播九河下梢支流之河。《太平寰宇记》明确指出：“浮水”自东光县南界的隋永济（亦称御河、卫河，即南运河）渠分出向东北而流，向东终入渤海。实上游源于古淇水过广宗县为清河（渎），分清漳二渎有故道，且首受清河（渎）于浮阳县界，流经诸地入海，与酈考无悖，缘其改道开凿而另有别名之故。“浮阳”一名缘《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之说，因地处浮水之阳或曰“浮水在阳”^[119] 而得名。

浮阳，故地“甫阳”属西周封燕之东南境；春秋为燕、齐之域，有都邑；战国属燕、赵、齐三交壤。秦属巨鹿、济北两郡之交地，始置县；秦统一六国后属冀州巨鹿郡为“浮阳”，汉前史载未详且不见物证，今有“浮阳丞印”封泥证之。

西汉高帝间依旧置浮阳县，设渤海郡领 26 县（含中邑），浮阳县、郡同治（今旧州）改属于幽州；东汉建武时封刘歆为浮阳侯国，后除国复县，废中邑入浮阳县，属冀州之渤海郡。三国魏，浮阳县仍属冀州渤海郡。西晋，渤海改封国后又复郡，仍辖浮阳县；又改隶清河国，后还隶渤海郡。

北魏初，渤海改称沧水郡，太和十一年（487）析渤海（改渤海郡，治徙南皮城）、章武二郡地设浮阳郡辖浮阳县为郡治，后沧水复渤海旧郡，治移今东光县；熙平二年

〔517〕析瀛冀二州之地取沧海之意始置沧州，治在饶安县（今盐山赵村），为沧州最早治所。

隋开皇十八年（598），浮阳之大浪淀水因浮溢泛漫淹伴清村，遂改称清池，“此后浮阳即不再见于史册”〔120〕，遂称清池县，治所故浮阳今旧州。唐改渤海郡为沧州；曾于长芦县（沧州城内）城置景州，清池属之。

《太平寰宇记》有载曰，北宋乾德二年（964），废长芦割入清池县，清池仍为沧州治。也就是说，宋之长芦县治在今沧州市，而沧州治所则位于清池县治的故浮阳旧治。元代原浮阳所属之地，归属中书省河间路沧州景城郡，清池为州、郡、县三级治所。明永乐二年（1404）后，三级治所城毁，撤清池县，遂徙州治于长芦（今市区）属河间府，其后浮阳故城荒废。据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五”考载，今之清池，即汉浮阳县，在浮水之阳。

从历代记载指向看，浮阳均指今沧县东南旧州；虽地理名称沿革繁变，但皆与今之沧州更迭由来有关。鉴于所处渤海之滨海拔8—18米的甫滩辽阔舆地，援古“甫阳”音义，附会浮水之北滩涂阳阔古义，而于古尚且不悖，遂假古音改赋新意置“浮阳”，借以昭示天下之尊与亘古唯一的秦始皇威仪，实为不可详载于典史之故。



◎ 图13 邗（曲）夫（阜）相欽

“甫易”释“浮阳”，正如“邗夫相欽”〔121〕（图13）释“邗夫”为“曲阜”之类，依音韵学母、韵、调“三要素”并援引地理域名综合考证，皆“读若”之，然“甫易”与“浮阳”确有其别。历代典籍多以汉置“浮阳县”为例说，皆因未曾得见秦时“浮阳丞印”封泥与实印之故。

五、余论

中国的青铜时代，城邑作为基本社会单位，有“盖千八百国”遍布于华北地貌之上。“作邑”一词，在商代多见于卜辞之中〔122〕，《诗·绵篇》详细地描述了城邑方位的卜定与建造过程，这种“作邑”形制适用三代也延制其后。西周时，在“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思想前提下，

逐渐形成了别都、县、鄙制度；其城邑置建初衷并非单一的建筑工程，而是用以维系宗族权力的政治行为。这种在古代以“分枝宗（亲）族”系统为特征的社会中，当分枝之际，便由族长率众族人新建城邑，其建置等级与宗族地位、土地、资源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作为以宗庙社祀崇拜为最高的城邑置设，在周至春秋时段内，有大量文献资料记录了当时封建状况的大略事项。

从周初情况看，天子外放亲族或大臣建立城邑时，为彰显恩德故有所封，其封赐概有以下事项：

一是赐予原始氏族之姓；

二是给予一定范围的土地；

三是分给一定数量的以宗（亲）族为基本单元的庶民；

四是封以新的氏名，从而昭示其新的政治单元；

五是赠以标识其新政治地位与其新置城邑地位的礼仪性凭信之物事，如宗庙社祀、鼎彝、印信等。〔123〕

这种昭示源出正统的官方仪式性肯定，给予了受封者一定势力范围，缘其宗法礼制及所居地理位置、领域与城邑等大小的不同，便有了大小国与大小都邑之别。就西周都邑历史形态而言，除天子之都镐京以外，他都别邑数繁布广，在其存续期间大多有资可寻，且从地理上多可以找到大致方位。个中不乏由于历史典籍所载内容与个别列国来源无关而未录者；但于后世地理发现中有实物证明确实存在的并非少见。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与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在证明确有“霸国”且与晋、燕、周王室相往来的同时，也坐实了历史典籍的阙如。从“甫易”四玺例证看，颇有承周封建的诸项元素；对其系列的追究，足以证实“甫易”都邑曾经在历史上存在。

故说自周宣王静（前827—前782）改“甫”后，赐“甫易”聚邑；春秋战国封“甫易都”；秦统一六国前后假原音借地义改赋新意而易“浮阳”，实为上古与近古音系中近（同）音代用现象的典型词例。

【注 释】

-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图13—30。

- 〔3〕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0158号。
〔4〕李东璇：《博物馆藏古玺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5〕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5页。
〔6〕陈介祺：《兮甲盘》铭文拓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十六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82页，10174号。
〔8〕叶其峰：《试释几方工官玺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72页。
〔9〕同上。按：“𠄎”字，近年有学者隶“婁”读“婁”，尚在探讨。
〔10〕肖易夫：《文物中见到的古代冶铸》，《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第14页。
〔11〕同〔2〕，第166页。
〔12〕同〔8〕。
〔13〕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版，第124页，0060、0158号。
〔14〕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0页。
〔15〕陈澧注：《礼记集说》卷一“曲礼下第二”，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第八种”，中国书店2015年版，第20页。
〔16〕阮元：《经籍纂诂》，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第497页。
〔17〕《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01页。
〔18〕郭璞注：《尔雅》，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页。
〔19〕刘钊等：《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合11499宾组。
〔20〕同〔5〕，第1044页。
〔21〕同〔14〕，第196页。
〔2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九篇下，经韵楼藏版清嘉庆二十年（1815），第34页正。
〔23〕同〔14〕，第304页。
〔24〕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上海医学书局民国17年（1928）影印本，第6477页背（段注）。
〔25〕刘熙：《释名》，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26〕同〔22〕，第7页背。
〔27〕同〔25〕，第54页。
〔28〕班固：《汉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47页。
〔2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页。
〔30〕蔡沈注：《书经集传》，天津古籍书店《四书五经》上册“第六种”，第132页。
〔31〕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下，台湾“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1980年，“穆王”条，第10页背。
〔32〕郑樵：《通志》卷二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清内府刊本，“以国为氏·周异姓国·吕氏”条。
〔3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河南六》“南阳府·申城”条。
〔34〕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钦定四库全书会要》“经部”，清内府刊本，第4页“甫”条。
〔35〕有考说《尚书·吕刑》非原篇，而系指穆王昭告《吕刑》的讲话记录，其所载比通行本少。
〔36〕《史记·周本纪》《汉书·古今人物表》均有载。
〔37〕《诗经·大雅·生民》“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即指其事。
〔38〕同〔29〕，第111—138页。
〔39〕“改吕为甫”实国、地两名互称，为后人久不分己之误。古族迁徙，原地名留存；迁新地后，有名者仍旧，无名者则用迁前原居地名或重新

命名之。

- 〔40〕徐畅：《古玺印图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3852。
〔41〕同〔2〕，第166页。
〔42〕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
〔43〕《宋本广韵》，据张氏泽存堂本，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241页。
〔44〕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编：《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5号。
〔45〕横宽：《盐铁论》“通有第三”，载于横宽著、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46〕同〔5〕，第1483页。
〔47〕同〔24〕，第6252页。
〔48〕同〔8〕。
〔49〕同〔14〕，第127页上。
〔50〕同〔24〕，第2675页背。
〔51〕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59页。
〔52〕同上，第910页。
〔53〕赵超：《“铸师”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6页。
〔54〕林廷勳辑：《玺印集林》，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1938）影印本；林廷勳藏辑：《玺印集林》，上海书店1991年据1919年原版影印本。
〔55〕同〔2〕，第204页，3865。
〔56〕同〔2〕，第203页，3859。
〔57〕董莲池：《新金文编》（全三册），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825页，“庚都司马𠄎11909”。
〔58〕方斌：《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官印》，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59〕郭忠恕：《汗简》卷中之一，《篆学丛书》（下），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页。
〔60〕张廷玉：《康熙字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9页。
〔61〕同〔14〕，第131页。
〔62〕《春秋三传》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郕·左（传）》，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下册“第九种”，第134页。
〔63〕同〔51〕，第238页。
〔64〕陈澧注：《礼记集说》卷九“坊记第三十”，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第八种”，第284页。
〔6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50页。
〔66〕同〔51〕，第281页。
〔67〕同〔51〕，第612页。
〔68〕同〔51〕，第703、815页。
〔69〕蔡沈：《书经集传》卷二“夏书·禹贡”，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第六种”，第37页。
〔70〕同〔3〕，第33页，0192号。
〔71〕同〔40〕，第204页，3869。
〔72〕同〔5〕，第1457、303页。
〔73〕同〔57〕，第1875页。
〔74〕同〔5〕，第689页。
〔75〕同〔14〕，第287页。
〔76〕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日本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8页3164。
〔77〕同〔40〕，第204页，3869。

- [78] 汤餘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79] 同 [51]，第 266 页。
- [80]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3726 页。
- [81] 陈士元：《论语类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41 页。
- [82] 同 [3]，第 10 页，0060 号。
- [83] 同 [40]，第 202 页，3835。
- [84] 同 [51]，第 586—588 页。
- [85] 《春秋三传》卷之十一“（襄公）[癸丑]二十有五年…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下册“第九种”，第 386 页。
- [86] 同 [29]，第 3023 页。
- [87] 同 [51]，第 608—609 页。
- [88] 同 [51]，第 710—711 页。
- [89] 同 [29]，第 34 页。
- [90] 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自序，《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9 页。
- [91] 同 [14]，第 70 页上。
- [92] 《宋本广韵》，中国书店 1982 年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本，第 240 页。
- [93] 参见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
- [94] [美] Williams, S.Wells：《英华分韵撮要》，据《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刻本编，1856 年，美国洛杉矶大学图书馆藏本。
- [95] 同 [92]，第 150 页。
- [96] 同 [14]，第 230 页上。
- [97] 同 [92]，第 191 页。
- [98] 指宋代语音三十六个声母代字。系在南朝梁僧人守温选定三十字为“纽”的基础上，宋人增非、敷、奉、微、床、娘六母，合称“三十六字母”，正式见于（宋）郑樵《通志·七音略》。字序为“帮滂并明；非敷奉微；……来；日。”
- [99] 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浙江书局刊本清光绪二年（1876），第 14 页背。
- [100] 钱大昕：《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浙江书局刊本清光绪二年（1876），第 25 背、26 页正。
- [101] 同 [14]，第 314 页下。
- [102] 陈鸿：《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5 页。
- [103]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7 页。
- [104]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7 页。
- [105] 戴震：《六书音韵表序》，《戴震全书》卷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374 页。
- [106]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107] 沈兼士著，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5 页。
- [108] 杨光荣：《元历史比较语言学导言》，《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76—80 页。
- [109]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彩色图版页五四 1346。
- [110] 同上，第 204 页，1346、1347。
- [111] 艺术类聚金石书画馆藏编：《汉印三百品》，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6 页 260。
- [112] 同 [17]，第 1799 页。

- [113] 同 [28]，第 636 页。
- [114] 邴道元：《水经注》，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8 页。
- [115] 同上。
- [116]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金陵书局清光绪八年（1882），第 2 页沧州诸条。
- [11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河北道三”，金陵书局校刊清光绪六年（1880），第 8 页。
- [118]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河北道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本，第 5 页“清池县”条。
- [119] 沧县志书局：《沧县志》，天津文竹斋南纸印刷局版民国 22 年（1933），卷之二“河流”，卷之三“建置”。
- [120] 同上，卷之一“方輿志”。
- [121] 同 [40]，第 116 页 2468。
- [122] [日]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日本东京汲古书房 1971 年版，第 43 页。
- [12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108—114 页。

考据之风与晚清印谱的编纂

——以陈介祺金石圈为中心的考察

文 / 徐 发

【摘 要】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以金石证史蔚成风尚，而此时期金石学家的印谱编纂也反映了这种考据之风的影响。本文通过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圈诸友的印谱编纂考察，指出陈介祺在编选《十钟山房印举》中，屡屡致函金石诸友搜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欲参考其书对《印举》加以释例。正是由于陈介祺对瞿书的推崇，其金石圈诸友如吴云、吴大澂、吴重熹、孙文楷、高庆龄、郭裕之的印谱编纂，无论在考据思想还是编纂体例上，都受瞿书影响，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几乎囊括了晚清考据印学著作的全部。而此时期印谱编纂中将印章与经传史籍相互参证，考察印章的职官、地理、文字，补史籍之缺漏，不仅成为此一时期印谱编纂的主要特征，也是此时金石考据风气在印谱编纂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考据之风 陈介祺 瞿中溶 集古官印考证 金石圈 印谱编纂

有清一代，考据学大兴，蔚成一代风气。举凡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无不受其影响。而此时，金石学又成一学科，流风所染，以金石考经证史成一风尚。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寝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式芬有《据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憲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以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1]

梁启超所举金石诸家，多以所藏钟鼎彝器与经史互相印证，而此时金石诸家考证所得，多函札往来、群体合力而成。陈介祺在述及金石之交时曾云：“文达公为先

文憲公童试受知师，以某耽古文字，特加奖勉，手书见赐，有‘天机清妙’之誉。南中金石交则嘉兴张叔未（廷济），徐籀庄（同柏）、子士燕，鲍子年（康），吕尧仙（佺孙），吴康甫（廷康），翁叔均（大年），陈粟园（峻），何子贞（绍基），朱筱沅（钧），韩履卿（崇），严眉岑（福基），叶东卿（志诜），吴平斋（云），许珊林（樵），吴我鸥（珩），沈西雍，张小馀（荐染），甘实庵（熙）。同乡则先外舅李方赤（璋煜）、刘燕庭（喜海）、吴子苾（式芬）、许印林（瀚）、翟文泉（云升）、李竹朋（佐贤）。”^[2]

可见，梁启超所举诸家，除罗振玉外，多与陈介祺有交往。可以说，陈介祺作为晚清金石学家的代表，因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成就最大，是这一时期金石学圈的“枢纽”，被金石同道誉为“山斗”。而陈介祺在与金石诸友收藏钟鼎彝器的同时，因晚清古印出土众多，诸家多有所藏，自然也编有印谱。因此，以陈介祺为中心

【作者简介】

郭清华：河北省河间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正高级工程师。

的金石“朋友圈”，函札往来，疑义相析，在钟鼎彝器证史的同时，诸家也以所藏印章与史书互证，形成一股以印证史的风气。这种印史互证的考据风气，在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诸友的印谱编纂上表现尤为突出，且金石诸友之间相互影响，一脉相承，贯穿于晚清至民国的印谱编纂，几乎囊括了晚清考据印谱的全部，这也是此时金石考据风气在印谱编纂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本文以陈介祺为中心，具体考察其金石诸友在考据风气影响下的印谱编纂及内在联系。

一、张廷济与《清仪阁古印偶存》

张廷济（1768—1848），字叔未，号未亭，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人。精于书画及金石考据之学。著有《桂馨堂集》《清仪阁题跋》《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清仪阁古印偶存》等。张廷济为陈介祺早年之金石交，曾为其所藏汉“刘虺”六面印作赋以颂。而张廷济师事阮元、翁方纲，二人皆擅金石考据之学，故其学问思想不免受其影响，因此张廷济的印谱编纂也体现了这种考据之风。

清道光四年（1824）八月，张廷济在庄罔生《漆园印型》跋中云：

余观秦汉印谱，明上海顾氏所集印，印止二十部者，古玉印以百计，诚为古今独绝之品。顾后《稽古斋印谱》至五千零，天都汪氏《集古印存》亦至数千。然《稽古》失之太密；汪氏晶石杂糅，失之太乱；查氏《铜鼓书堂》、张子原《师汉斋》、黄椒升《续古印式》精矣，然收录俱不盈千。^[3]

张廷济对以上诸家印谱进行点评，认为吴观均《稽古斋印谱》太密，汪启淑《集古印存》晶石杂糅、编次太乱，查礼《铜鼓书堂藏印》、张子原《师汉斋》、黄锡藩《续古印式》虽然精，但收录太少，独对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推崇有加。而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已含有考据的成分，其所列吴观均《稽古斋印谱》、查礼《铜鼓书堂藏印》、黄锡藩《续古印式》皆是印谱考据之作，而张廷济之评价必然建立在对诸印谱熟知的基础上，再加上当时考据风气的影响，因此其所编印谱也不免受其影响。

道光八年（1828），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目并附注》六卷成书，徐同柏为其逐印考释并附注。兹举一例：

校尉之印章：龟钮。《汉书·武帝纪》注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两汉金石记》曰：“案，此印于数用五之义相合。”^[4]徐同柏在考释时标明印章形制，引《汉书》《两汉金石记》与印文互相印证。而徐同柏与陈介祺交往密切，徐同柏的这种考释体例必然对陈介祺的印谱编纂产生影响。

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辑成《清仪阁古印偶存》重订本六册。其在序中云：

今并筐中所积，得四百六十六印，印二十部，视戊子之夏所印三十五部者又增多百余印。为官，为私，为古文，为铜、为银、为涂金；为一面、二面、三面、四面、六面；为子母；为龟钮、兽钮、螭螭钮，为坛钮、鼻钮、瓦钮、桥钮、覆斗钮、亭钮、重屋钮，种种备具。以审其文字，不可以秦汉限也；戢集尚隘，不得以谱称也；选择必慎，不敢以假混也：故仍以《古印偶存》名之。而数十年铢积寸累，仁和赵晋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孙戢斋圻，海盐黄椒升锡蕃、钱寄坤以发、家质夫开福，平湖钱梦庐天树，同里葛见岩澄、葛春屿嵩、葛向之时微、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而汪友铁庵，来自吴门；金友兰坡，来自邗上，所携致皆佳好，是亦可识也。道光乙未春日，嘉兴张廷济书，时年六十八。^[5]

张廷济在体例上以印材、印面、印纽划分，编排合理，不使假印混入，选择审慎。这种体例的合理及编排的审慎必然对金石诸友产生影响。而在其成书过程中，金石诸友多有助力，其中有一位重要的金石助手：徐籀庄。

徐同柏（1775—1854），字寿藏，号籀庄，浙江海盐人。著有《从古堂款识学》。徐同柏为张廷济外甥。因徐同柏精研六书篆籀，于古文奇字多能通释，故张廷济所得金石拓片文字多由其考释，而张廷济也在金石题识中多次赞赏其考释水平。

因其舅张廷济之介，陈介祺与徐同柏函札往来（另，陈介祺与张廷济侄张受之亦函札往来，陈介祺与徐同柏函札多由其居中转达），所获金石也多请其考释。如陈介祺曾请其分修刘喜海所著《金石苑》“金部”商周款识。咸丰元年（1851）六月，又致徐同柏，求其为所藏吉金拓本共一百三四十种考释。书中云：

屡与张叔未先生、受之兄书中钦仰道范，复得读大著《从古堂款识学》稿本，审释精详，征引典坟，尤钦好学深思精博为今所未有，景仰之怀六七年于兹矣。伏想起居日强，著述日富，心驰无已。粟园先生相聚二载，时常道及先生。兹因粟园归里之便，寄上敝藏吉金拓本全分百三四十种，敬求考释，如蒙赐考，俾古人文字得大作而益传，祺亦以附名为幸矣。敝藏汉印亦有成书，粟园先生只为代作数部，仅携一册归，属为代请真鉴，官名人篆体并求考释。年来始能再成数部，当再寄奉左右也。大著求借录副本一读为幸。自愧浅陋，惟望教之。令郎大兄克承家学，又深心仰，并乞不吝远诲为企。人便尚望赐复，并乞法篆直纸联语暨宝簠斋、碑画轩额。^[6]

从上面可以看出，陈介祺对徐同柏之考释水平深表佩服，故将自己所藏之吉金拓本请其考释。而此时，陈介祺所藏汉印亦有成书，陈介祺亦请其考释。此后，陈介祺所藏最著名之毛公鼎，陈介祺也请其考释，后徐释陈多引其说，足见陈介祺对其考释之重视。而徐同柏为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所作考释必然对陈介祺也有所影响。检索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一书，徐为簠斋考释即有三卷。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簠斋致吴云书：“筱沅兄家如何？吴侃叔、瞿木夫、徐问蘧、籀庄诸先生著作可觅钞否？”^[7]代求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吴东发《商周文字拾遗》、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等著作。而后，光绪三年（1877）七月，复吴大澂书中又代求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书中云：“徐籀庄《从古堂款识学》，昔曾得一二册，乱后屡访之并其后人存否，云俱无存。今闻竟为尊藏所得，不审八册完否？有拓本否？有摹字否？实为二十年来之幸事，必不可不早公之于世，一如原稿以存其真，即引用少有可删，亦不必去，它书采取则在作者矣。不识可专足取读十日否？可代钞一部否？能不误又如原字，少费无惜，唯乞厚爱。”^[8]陈介祺早年曾得徐同柏之《从古堂款识学》，但为残本，而此时复函吴大澂，询问此书之具体详情，或代钞，或派专足取读，急欲得之而参考其释例。此后，陈介祺终于得阅此书，并作批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陈介祺与张廷济早年为金石交，张廷济印谱编纂审慎、求精的态度，必然对陈介祺有所影响，但因其印谱体例未善^[9]，这种影响有限。张

廷济死后，陈介祺与其外甥徐同柏函札往来，所获吉金拓片多请其为之考释，且多次致函金石诸友求其著作，因而在金石考释上，陈介祺多受徐同柏影响。而徐同柏为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所作考释体例必然也影响了陈介祺。张廷济死后，张氏藏印多为吴云所得，即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所收之印。“余喜蓄古印，生平所藏先秦、两汉以来官私各印，类多得自东南故家，嘉兴张氏清仪阁四百钮，尤为一大宗也。”^[10]而陈、吴为金石至交，且陈介祺曾致函吴云为其代寻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一书。因此，张廷济、徐同柏的考据思想和印谱编纂体例必然也影响到吴云。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所提到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瞿中溶，其必然也受到张廷济、徐桐柏的这种考据影响。这也是下文陈介祺一直屡屡致函金石诸友欲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的原因。

二、陈介祺与《集古官印考证》

陈介祺一生有功于印学者，当首推《十钟山房印举》。陈介祺在编选《十钟山房印举》过程中，与金石诸友函牍往还，多次提及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可谓念兹在兹，屡屡征询。那么，陈介祺对此书为何如此重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又有何特色？本章从《簠斋尺牋》中拈出陈介祺与金石诸友对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所言之处，并对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的成书特色、陈介祺对《集古官印考证》的批校作一介绍，从而理清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与《集古官印考证》之间的关系。

陈介祺一生于印学之最大贡献在于编纂《十钟山房印举》一书。而《十钟山房印举》版本众多，“世无完本，亦无定本”^[11]。那么为什么此书“世无完本，亦无定本”？究其原因何在？吴云在致潘祖荫函札中曾云：

子年书来，谓簠斋收藏豪富，乃谆劝他人刻书，而自己转无著作，且编纂之书亦所未见。子年深以为异。实则簠斋心眼过高，不肯稍稍率就。前年来信，欲荟萃先秦两汉以至六朝官私古印，成《印举》一书，以己之所藏，再合他人所有，汇为一书，洵属大观。云虽心以为然，却知其未必能成。盖簠斋作事每每精益求精，务欲人人叹为空前绝后，无毫发之憾而后已，任此役者势必因难生畏，望而却走。今阅三年，鄙言

果不幸而中。^{〔12〕}

从吴云函札可知,陈介祺收藏丰富,但无著作,即使编纂之书友朋之间也所未见。虽然簠斋欲以自己所藏及友朋所藏古印成《印举》一书,但其著述谨慎,追求完美,故难以成书。吴云虽认可簠斋的这种态度,但认为陈介祺著述过于追求完美,以此种态度著书,其书不但难以完成,且具体执行编书任务的人亦畏难而走。

吴云所言亦合理,但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一书的编纂是否像吴云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十钟山房印举》一直难以成书呢?我们先来看其《印举》的体例:光绪八年(1882),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言其体例:

自叙。

凡例。

目录。

考释: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

分时代。

分印文。

分朱白。

分闌文。

分象形间以印文。

分玉、水石、琉璃、松石、水晶、白石、蚌(云母也)、象牙、骨角、干漆、黑珀、瓦。

分印纽。

分印侧字及象形。

古玺有玉玺,有君玺,有官玺,有银、有玉,有摹刻石印。

私玺别为一举,分朱白文,闌文。

古玺有钩印,有象形,有奇纽。

符节亦印类,附之。拓图,石与木二种,银错字非图不传。

龙节传世惟一。汉至隋有虎符,唐有龟鱼符。半钩,余曰合符钩,私符也,亦符类也,并举之。

封泥,印所出也,并举之。《封泥考略》,海丰吴氏有专书,余藏亦附焉。今止附自藏有五百余而已,考见专稿。

……

考释别刻,附后自成一书。^{〔13〕}

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事记》可见,陈介祺对《印举》所收印章的时代、形制、文字、类别、考释等诸方面都有涉及,足见簠斋编辑此书时谋划之细,心思之密。而体例划分的详细,及精益求精的态度必然带来工作量的增大,这也是吴云所预言其书难成的一个原因。然而,陈介祺在凡例中所言《封泥考略》《印举》“考见专稿”“考释别刻”,欲对所藏印章加以考释,这也是其书难成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印举》“世无完本,亦无定本”。

陈介祺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光绪九年(1883)这一期间,与吴云、吴大澂、鲍康、潘祖荫、王懿荣等金石诸友函牍往还,其中陈介祺多次提及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或求访,或代钞,或助金刊刻,急欲得之并参考其考释体例。兹将《簠斋尺牍》中陈介祺与金石诸友对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所提之处拈出,以见陈介祺对此书的重视,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十钟山房印举》与《集古官印考证》之间的关系。^{〔14〕}

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夏间,朱钧致陈介祺一书函中云:“《官印考》已倩人另抄一册,并托叔钧校对,秋间一并寄呈。《印考》倘欲付梓,钧有至好川沙沈韵初茂才,风雅士也,亦愿出刻资一半,附骥列名,未稔雅意如何?”^{〔15〕}

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翁大年(叔均)寄其所作《瞿中溶〈古官印考〉补遗目录》。瞿中溶《古官印考》翁大年补遗目录中有簠斋题跋:“乙巳八月叔均寄。当以所藏官印及虎符鱼符即寄之,并属其代购印谱。古泥封亦当采人。”^{〔16〕}按:此跋语中已反映出簠斋对印谱体例的考虑与关注。

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一日,簠斋致翁大年(叔均)书。书中云:“木夫先生《古官印考》如有存本暨足下增辑者,乞为觅人抄寄。活字版字多者久思之,不知可物色否?”^{〔17〕}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三日,簠斋致吴云书:“筱沅兄家如何?吴佩叔、瞿木夫、徐问蘧、籀庄诸先生著作可觅钞否?”^{〔18〕}

按:此时簠斋给“别来二十余年”的吴云作书,书中所询“吴佩叔、瞿木夫、徐籀庄诸先生著作”。从簠斋致吴云信札中可知乃指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吴东发《商

周文字拾遗》、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等。簠斋欲通过吴云了解江南金石学情况并欲得到诸家著作钞本。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日,簠斋致吴云书:“瞿木夫先生《古官印考》,有处借钞否。”^{〔19〕}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廿四日,簠斋致吴云书:“瞿木夫集古官印考证,有刻本写本可假钞否?(翁叔均有《古官印考略》,曾寄一目)与吴佩叔《商周文字拾遗》诸书,均乞切为访致。徐籀庄《从古堂款识学》,仅有敝藏器,余亦念切。弟欲以诸治说文家言,分字剪贴。苏坊所售,乞示一目,无者当求代购也(凡字学、韵学皆可通附,以一字为一卷,以便增补)。”附笺中又嘱:“瞿木夫先生考据著作,乞访借抄寄,抄直即缴(《集古官印》考证,尤切企)。吴佩叔、徐籀庄(子士燕)金文著作均乞留意访借钞寄。”^{〔20〕}按:时隔一年,簠斋又托吴云觅访南方金石诸家著作,瞿中溶、翁叔均、徐同柏、吴东发诸家著作急欲得之,而此时陈介祺已有以《说文》为例、以金文等古文字增补《说文》的言论。

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十二日,簠斋致鲍康书:“《印举》恐须八九月乃成。甚望得瞿木夫《古官印考证》一看(已见面),乞一代访。”^{〔21〕}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廿九日,簠斋致吴云书:“瞿木夫《集古官印考证》,亟思求钞一副本。吴佩叔《商周文字拾遗》,乞切访之。《从古堂款识学》,何不为刻之。”^{〔22〕}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廿四日,簠斋致吴云书:“瞿木夫《古官印考证》及叔均兄所续辑者,昔年只得目录,乞详致翁世兄,为钞副本见寄(能即假尤妙)。必有以报,想必念旧,早为发寄,需费均由韩伟功代假也。”^{〔23〕}

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廿九日,簠斋致鲍康书:“《印举》后十部已成十余本,每部竟至八十本,所费不意过多。此次之编,弟为古人传。伯瑜虽为谋利,然其远来久稽之劳,功亦不可没,观者坐享其成,亦不可太与计较。恐启中所言尚须增十金也。《凡例》《目录》已命次儿厚滋创稿,惟求瞿木夫《古官印考》与翁叔均续者不可得,已切托吴平斋。再则弟与小倩仲怡之泥封六百枚,未能刻附,斗检封、虎鱼龟符亦同(印钮、泉钮有字者同)。惜无博物君子助为之,诸须迟迟耳。”^{〔24〕}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八日,簠斋致吴云书:“瞿氏《印证》究可假钞否,念切,翁世兄处望托人代致,至

企至企,不敢夺其旧藏与均兄遗著也。甲戌浴佛日。”^{〔25〕}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十三日,簠斋致吴云书:“五月十三日,得四月廿二日书。……前乞假尊藏秦汉私印一读,切企切企。《古印考证》仍乞在念。叔均曾寄《续考印目》,当必有说。胡氏混泥封目录,则见于叔均参订吴子苾《古泥封考略》中。”^{〔26〕}按:吴云在复书中言:“瞿木夫《古官印考证》,昨得伯寅书,知其嗣君瞿经孳树镐已在西安授梓。去年经孳曾回里门,或觅得原稿,真快事也。因兄念之甚切,故特驰告。考证颇为详核,然半从顾谱,影摹所释亦本诸顾谱及《山左金石志》等书居多,以兄之眼力,他日见之,未必叹为杰作也。”^{〔27〕}

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十三日,簠斋致吴云书:“《古官印考证》,其季子经孳将刊之关中,袁筱坞已叙之,当可成矣。”^{〔28〕}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十一日,簠斋致潘祖荫书:“《集古印证》刻成未,佳纸二部,当具印费廿金。惜《印举》各官印,及收藏家各新得,有所遗耳。叔均有续者,未知附刻否,此事乞询之。”^{〔29〕}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晦,陈介祺又致潘祖荫书:“顷得瞿经孳兄来书,即当作复求寄。翁叔均有《续考证》,当附刻。近见各印,亦当并续,但摹刻不失真为难耳。”^{〔30〕}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三十日,簠斋致鲍康书:“瞿木夫《官印考证》已刊,甚慰。拟寄廿金求二部。未审清卿可借交由京还之否?”^{〔31〕}

光绪元年(1875)正月十二日,簠斋致鲍康书:“复瞿经孳兄书希交妥,赴粤东亦确寄,内有要语。祺助刻费三十金,由伯寅廉生处借用均可,乞代达。”^{〔32〕}

光绪元年(1875)二月十三日,簠斋致鲍康书:“经孳兄处助刻卅金,廉生有存寄者即可交,否则再寄,先乞无印者一二部一读。此书考证是一事,印是一事,摹则必求似,不似则无味,而似实难。经孳兄言,其刻者每印制钱五十文,则每月不过钱一千五百,吃着且不足。子振仿古玺印,自为一书,每印助以百文,且为销布,若意不足者。今欲令逼真,二百五十文一印,已畏其不易,不似则少亦多,似则不为过矣。因适有此人,故代谋之,亦须摹数印作式乃定,非为子振谋也。且能否刻竟,亦须经手者监刻而又司出入乃能不苛。此为传古,

非好多事。晤经孳言及时，乞致此意。”^[33]按：簠斋致鲍康书中言及助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摹印似与不似事，言此书考证是一事，印是一事，这也在陈《印举》中得以体现，其荐陈子振可为之摹印，可见陈不在玩物，志在传古。

光绪元年（1875）三月三日，簠斋致鲍康书：“经孳旋秦，望属其寄拓本。银项如廉生手无之，即乞向徐东甫太史处借支，缘廉生代存者已交与否未定，故不敢说真耳。”^[34]按：徐东甫为簠斋之外甥，廉生王懿荣与簠斋有姻亲关系。

光绪元年（1875）四月廿二日，簠斋致王懿荣书：“晤子年乞为道念。并乞致书经孳，先求无印《古官印考证》二部，其目“候”有误“侯”者，其他尚未能细校。”^[35]按：“候”与“侯”不同，对此二字之误者，簠斋多有批校。

光绪元年（1875）五月六日，簠斋致王懿荣书：“经孳处书无印亦重思先得之，乞代致子年，并候近况。”^[36]

光绪元年（1875）六月既望，簠斋致鲍康书：“经孳欲传父书，而所得不为刻费用，欲摹印而不求精，而不知木夫先生之传在考证不在谱印，印精亦复自佳耳。乞兄与伯寅敦致，先寄无印者全部数函来，吾数人分读之，不必俟其摹印也。”^[37]按：以上两条可知瞿书之胜处在于考证，不在摹印。

光绪元年（1875）七月廿六日，簠斋致潘祖荫书：“瞿刻书竟觅不得，拟托人刷印，尚未知版存处。”^[38]

光绪元年（1875）九月十日，簠斋致吴大澂书：“木夫先生《古官印考证》，当已刻就，曾赠经孳三十金，求二部，以摹印未成未得，所摹亦甚失真，愿求无印者二部（订而不必裁），乞切致。如经孳力无暇及，则乞付印费（由厂中印），如少不肯印，即十部亦可，与同人分，佳处原在考也。”^[39]按：簠斋再次强调其书在于考证。

光绪三年（1877）正月二十五日，瞿树镛致簠斋书：“承谕镌印，尚有介，弟并订定每字二百五十文，谨以便悉，树铭现刻之字不过五十文，今加以数倍自然精益求精。惟妙手空空，深盼长者助予，将全书竟，否则直有中道而止之叹。京朝人士除伯寅、子年二公解囊外，余者寂然。”^[40]按：此时瞿树镛欲印父书，但缺少印费，故向金石诸友求助，唯簠斋、潘祖荫、鲍康慷慨解囊。

光绪三年（1877）三月二十日，瞿树镛致簠斋书：“树镛定于廿七日买车旋陕，大约秋间或再北来，昨鲍子年翁传谕，拓本及印谱俟归后寄都，现在全书刻完，均须补印耳。《梅花三十韵》已承转寄徐太史，昨由廉生兄交来，拜领。”^[41]

光绪三年（1877），瞿树镛致簠斋书：“子年丈示及尊函云助资三十金，即向王君处兑取。因彼时尚无行期，全书亦竣工无日，是以久未问及，顷十七卷一律刻完，而在京购买石章，亦正需款，孔急承廉兄枉遇，是以今日函索也。……先公遗者三十六篇，顷承彭芍庭京兆代梓，即日可以开雕。知承垂注，谨以奉闻，虔请道安。”^[42]按：此时瞿树镛提及簠斋助刊《集古官印考证》三十金，而簠斋光绪元年（1875）正月十二日致鲍康书中言助刻费三十金，由伯寅廉生处领取，可见当时瞿氏未及领取，此时函索。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十四日，簠斋致吴大澂书：“奉缴徐籀庄先生《从古堂款识学》八册，新得古匋拓八十八纸，均乞察入。徐书如刊，当助成之。瞿氏《古官印考证》，不必有印，急思一读，乞留意。《长安获古编》稿本乞交东甫寄下。松竹斋湖色东笺如装徐书者，乞手选色雅一律又光不易毛者百余幅，亦固护交东甫寄，直（值）由东甫代归。以欲装匋拓二部，又齐法化范千枚，已拓成一分，均待装也。”^[43]按：陈多次提及瞿书可先不必有印，可知瞿书之胜在于考证。

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二十七日，陈介祺得西安古董商苏景瑀书函及所寄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七册十三卷未竣之本。瞿氏此书，簠斋曾多方索求数年，然此时亦未刻全，至卒也未得见全本。王献唐在《陈簠斋批集古官印考证》一文中言：“近为山东省图书馆收得潍县陈氏旧藏原刻本凡十二卷，未钤印章，每印考证之前，皆留空隙。簠斋题云：‘光绪壬子十二月廿七日己卯立春，苏景瑀自长安寄至，至卷十三’云云。盖方刻至十三卷，故以寄来也。书内笔画错处，簠斋皆以朱笔校正，批注甚夥，多辅到语。”^[44]

从以上所列陈介祺与金石诸友的函牍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介祺一生可谓对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念兹在兹，屡屡征询。那么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究竟有何特色，让陈介祺如此重视，急欲得之呢？

三、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的成书及其特色

瞿木夫（1769—1842）^[45]，名中溶，字莼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精于金石之学，著有《汉石经考异补证》《魏石经遗字举正》《唐石经考异补正》《蜀石经考异补正》《三礼石经辨正》《校勘〈隶释〉〈隶续〉古义拾补》《吴郡金石志》《古泉山馆彝器图释》《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汉武梁祠堂画像考》等。

清代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一为吴派，以惠栋为中心；一为皖派，以戴震为中心。瞿中溶为惠栋之学生、钱大昕之婿，学术上自然承继考据之风，从其著作名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考据风尚的影响。而瞿中溶曾助理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一书，张廷济、徐同柏的印谱编纂体例自然也影响到瞿中溶。兹就《集古官印考证》作一介绍。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46]十七卷，辑官印自汉魏迄宋元九百余钮，末附虎符、鱼符一卷，先后历经三十余年，生前未刻。王献唐在《陈簠斋批〈集古官印考证〉》一文中言：“道光庚戌（1850），树镛试吏西安。咸丰壬子岁（1852），子苾先生开藩关辅，询及此书，欲谋锓版，遂囑五兄向吴门翁叔均丈家取归。未几，先生与张诗舲中丞俱内召，其时同志如何子贞丈督学西川，亦以言事去职。时之一谋助刻资者风流云散，比意遂辍。”^[47]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运动，“诂料庚申之变，家藏之名书善画、吉金乐石，悉付劫灰；即遗稿瘞诸土中，亦经搜掘焚毁。”而《集古官印考证》手稿因携往西安，“向非子苾先生议刻，则亦决不能独存，今存矣。”^[48]后，“瞿树镛因驰书中外，求助梓费，爰于甲戌岁五月开雕，倩松江王子萱茂才（寿光）摹印于石，以存矩矱。”^[49]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集古官印考证》上册有王献唐《代前言》^[50]，何绍基咸丰壬子（1852）冬初题端，瞿中溶、吴大澂、袁保恒序，印章采集各家谱录；下册有瞿树镛后跋、瞿光业补跋、寄赠集古官印姓氏、参校《集古官印考证》姓氏、后续《集古官印考证》参校姓氏、参考印谱目录等。而此书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吴大澂督东河时才成书，“迄光绪丙子（1876）冬甫成十四卷，篆刻石印二百方。次年（1877）先大夫（瞿树镛）亦歿（仍未刊成）。己丑（光绪十五年）春，清卿师督东河，始取已刊之板暨石章等至署，賡续将后三卷刊

竣。”^[51]而此时簠斋早已作古。

以上可见，吴式芬正是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刊刻的倡议者，出力尤多，而吴式芬与陈介祺又有通家之好，陈氏长女嫁与吴式芬次子吴重熹。而在瞿书后附《寄赠集古官印姓氏》《参校〈集古官印考证〉姓氏》《后续〈集古官印考证〉参校姓氏》中，陈介祺之金石好友如张廷济、刘喜海、李璋煜、吴式芬、翁大年、何绍基、吴云、潘祖荫、鲍康、吴大澂或寄赠，或参校，都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其后，正是有了诸位金石友人的资助，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才得以印行。而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有何特色，竟使金石诸友纷纷助资，更使陈介祺屡屡关注？从此书的序与跋中，我们可一观此书之特色。

瞿中溶自序中云，历代古铜印章之著录“谨堪供鉴赏之具，要无关于学问也”。“手摩古今谱录，又博访收藏之家，证以正史中官制、地理，为之分别时代，辩其异同，正其讹谬。……于历代文字之变更，与夫制度之因革，皆可一览而知，庶几亦考古者之一助欤。”^[52]吴大澂序云：“鉴别之精，考据之确，与历代职官与地志书相印证，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元明以来著录家所不逮。”^[53]袁保恒序云：“凡两汉迄宋元及伪朝官印，或收藏于家，或借观他氏，或本储旧谱，概摹成帙，附鱼虎符于末卷，证以正史地志，详其设官刻印之源流，赅博如数掌上螺纹。”^[54]王献唐云：“盖先后考官印者，未有如此君之精且勤者也。”^[55]罗随祖在《论秦汉南北朝官印的断代》一文中将玺印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以玺印证史籍、考文字、断时代：“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古玺印，也从地理、职官、姓氏等方面印证史籍，补典籍之失，探究古代名物制度。……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一部就是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开考证玺印专书之先河；另一部是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其首列战国古玺于秦汉印之先，又是轰动一时的集大成之作。从而使玺印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56]而罗氏在下文又言：“瞿中溶所撰《集古官印考证》十七卷，是当时了不起的一部巨著。”^[57]

而在体例上，《集古官印考证》将印面附于上，释文附于下，印面右侧附释文、出处、材质、印纽。所收之印多采集各家谱录，如杨遵《杨氏集古印谱》、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吴观均《稽古斋印谱》、查礼《铜

鼓书堂藏印》、黄锡藩《续古印式》等。在印章释文中，多援引历代职官志、地理志、金石典籍与印章内容相对，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元史·地理志》《隶释》《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山左金石志》等。兹举一例：

博望侯印。范氏。镀金。龟钮。

博望侯印。案《地理志》，博望属南阳郡，侯国。莽曰宜乐。考《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朔六年三月封张敖为博望侯，元狩二年以罪赎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同。又孝宣时，许舜以平安侯许广汉第，封博望侯，子延年代立。《汉表》云子孙党，曾孙并，报皆嗣封，王莽败绝。故《郡国志》不云侯国，则当为西京时印，而形制文字亦不类，恐是后代物。^[58]

在“博望侯印”一印中，瞿中溶首先注明此印采集自《范氏集古印谱》，然后标其材质和形状；再次，引《地理志》《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表》《郡国志》诸书与印章内容相互印证；最后，得出印章与史传记载不符且形制文字亦不类，推测其为后代物。

由上可见，历代古铜印章之著录多为印章之摹录，无关学问。而瞿氏此书摹录印章的同时，考证所摹印章的时代、地理、官制、形制、姓氏、文字等多项内容，并附鱼虎符于末卷，其书考证精审故为当时金石诸家所推许。而当时陈介祺编纂《十钟山房印举》欲加考释，故欲得瞿书而参考其考释体例，并非仅为摹印成书。

四、陈介祺批注《集古官印考证》

光绪九年（1883）正月，陈介祺阅读并批校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十三卷未竣本。山东省图书馆所藏《集古官印考证》陈介祺批校本十三卷末，陈介祺记：“光绪九年正月十四日丙申校毕，并浚人再致后四卷。”^[59]

按：簠斋一生搜求此书，光绪九年（1883）正月终于得到。簠斋此时所得之本为十三卷本^[60]，尚未钤刻印章，每印考证之前皆留空隙，簠斋以朱笔批之甚多。其在卷一副页上题云：“所收之印，当再校并补（印不能无可疑者）。所引之书当再校并正字。摹印似不如以今洋法点石

为之，并补未收之官印，或并别仿照私印传之。此书刻太不致，可再精刻。”^[61]由簠斋所题可知，《集古官印考证》所刻未精，书中所收官印亦有存疑和待补之处，关于印章考证所引之书，亦有错误之处。簠斋对于此书批注达40处，涉及玺印的时代、地理、官制、形制、文字等多项内容，或正其误，或补其阙，或引其说，从中可见簠斋之精论卓识。

陈介祺一生搜集古玺，编纂《十钟山房印举》，其在编纂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印章的时代、地理、官制、形制、文字等多项内容。而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考证精审，作为当时官印研究的重要成果，陈氏非常关注，故陈介祺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光绪九年（1883），其与金石诸友的函牍中屡次提及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急于得之而后快。光绪九年（1883）正月，陈介祺终于得到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十三卷未竣本，并做批校。陈氏一生念兹在兹，屡屡提及此书，反映了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编纂过程中欲参考其体例及考释成果，在治学上注重吸收他人成果的治学精神。^[62]而此后，陈介祺与金石诸友的印谱编纂，大都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之影响，参考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的体例与格局。可以说，正是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影响了晚清印谱的编纂，将印章与经传史籍相参证成为此一时期印谱编纂的主要特点。

五、吴重熹与《封泥考略》

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怳，号蓼舸、石莲，晚号石莲老人，海丰人。吴式芬次子，陈介祺长婿。吴式芬、陈介祺的藏品及著述，多赖其整理或刊印。

同治十三年（1874），陈介祺将自己所藏三百余封泥与吴式芬所藏三百余封泥，嘱吴重熹考补合编为《封泥考略》一书。而吴式芬视学浙中时，以所藏为考略，翁大年为之校。翁大年亦精于考据，著有《古官印图志》《瞿氏印考辨证》《古兵符考》《陶斋金石考》等。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也曾托翁校。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翁大年曾寄给陈介祺所作《瞿中溶〈古官印考〉补遗目录》。瞿中溶《古官印考》翁大年补遗目录中有簠斋题跋：“乙巳八月叔均寄。当以所藏官印及虎符鱼符即寄之，并

属其代购印谱。古泥封亦当采入。”^[63]因此，翁大年之考释必然也对陈介祺有所影响。吴重熹在吴、陈及翁大年校订的基础上总其成，其《封泥考略》之成书必然也受到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的影响。

兹将两书各举一例，以作比较：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平昌侯相（印存）：印文曰‘平昌侯相’。案《地理志》有两平昌，一属平原郡，侯国；一属琅邪郡。《郡国志》属北海国，云侯国故属琅邪。而平原无此县，盖并入他县矣。考《汉书·王子侯表》，平昌侯，齐悼惠王子，高后四年五月封，十二年为胶西王。此当为西汉初年印。”^[64]

《封泥考略》：“鲁相封泥：右封泥五字，印文曰，鲁相之印章。案《汉书·地理志》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诸侯王表》鲁恭王，余景帝子，二年立为淮阳王，二年徙鲁，传五世，此其相之印也。”^[65]

从以上所举我们可以看出，《封泥考略》与《集古官印考证》在体例上都是先附以印章，注明出处、形质，次释印文，再在考释中将印章与经传史书相印证。《封泥考略》所引史书多为《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如其中批注“依《表》则公卿、公卿属官为卷一，诸侯王为卷二，监御史、郡守、郡尉、关都尉长、县令长为卷三，新莽为卷四，以依《表》次为是”，可知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其中援引《汉书·地理志》更是繁多。^[66]而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除援引二书外，引书更为广泛，涉及历代职官志、地理志、金石志，且印章多采集各家谱录。

陈介祺与吴式芬为金石至交，两家又有通家之好。陈介祺在编纂《十钟山房印举》的过程中多次致函金石诸友求索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而吴式芬所藏封泥又多经翁大年为之校。因此，《封泥考略》的编纂体例，正是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的影响^[67]，而《集古官印考证》所体现的考据学风及在编纂体例上对《封泥考略》的影响，其后为周明泰所编的《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王献唐所编的《临淄封泥文字》所承继，限于篇幅，不再举例论述。而这种以封泥证史，强调封泥对秦汉官制和地理的考释也成为封泥著述编纂的主要因素。

六、吴云与《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两壘轩印考漫存》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斋号有两壘轩、二百兰亭斋、金石寿世之居等，浙江归安人。吴云与陈介祺为金石诤友，彼此函札往来，交流传拓，频繁不绝。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三日，簠斋给“别来二十余年”的吴云作书：“筱沅兄家如何？吴佩叔、瞿木夫、徐问蘧、籀庄诸先生著作可觅钞否？”^[68]欲通过吴云了解江南金石学的情况并欲得到诸家著作钞本。此时即提到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此后陈介祺多次致函吴云（详见《陈介祺与〈集古官印考证〉》一节），嘱其代觅或钞借此书。因此，吴云对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甚为熟悉。而吴云在复陈介祺信中说：“（《集古官印考证》）考证颇为详核，然半从顾谱，影摹所释亦本诸顾谱及山左金石志等书居多，以兄之眼力，他日见之，未必叹为杰作也。”^[69]称瞿书考证详核。吴云一生著有《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六卷）、《两壘轩印考漫存》（九卷）。考诸其书，其编纂体例也受到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的影响。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三日，吴云在给簠斋的复信中，已有刊刻《两壘轩印考漫存》的叙述。其云：

前人流传印谱收集既隘，考鉴未精，无一愜心者。弟藏汉魏六朝官私印千纽，中间官印颇有海内罕见之品，尝取官印及私印姓名之有考者著《两壘轩古印考藏》十卷，虽刊刻已成十之七八，因欲校改且有续增，故尚未蒞事，今先将草印稿三册奉寄备采，即乞指批，并将官印另印一分附奉鉴赏，倘有可类入《印举》者，望兄指出注明。^[70]

吴云认为前代印谱收集范围过于狭隘，且关于印章的考释也存在不足，因此欲将自己所藏汉魏六朝官私印章千余纽，成《两壘轩古印考藏》一书，既有印章又有考释。其后，吴云在《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和《两壘轩印考漫存》二书序言中，都表达了以印章考释古代职官制度、印史互证的编纂思想，这也和瞿中溶的印谱编纂思想相符合。

同治三年（1864），吴云辑成《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一书。其序中云：

……岁甲子，长夏无悞，取官印百数十纽，排比成书，摹刻各印图式于前，而以原印印于后，以存篆法真面，复又逐印系以考释，姑作蔽帚之享，而阅者

颇许为印谱中创见。顾两京官印篆文，每多舛讹，如“成臬令”，“臬”字或作“白”下“羊”，或作“四”下“羊”，或作“白”下“人”、“人”下“羊”。一县之印，参错如此，余可类推。至官非常置，而出于一时权宜封拜者，更无论矣。建武中，马援所以有正郡国印章之请也。……私印李唐后多作朱文，专尚纤巧，顿失古法，故录自六朝止。官印可证历朝制度，虽近代亦存，附于卷末，藉备掌故。古玺篆文，为官为私，多有未识，姑列私印之前。私印以字数为次，两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各以类从。考释具载《两罍轩古印考》，不复重录。……^[71]

吴云在此书编纂上欲“摹刻各印图式于前，而以原印印于后，以存篆法真面，复又逐印系以考释”，因此书考释载《两罍轩古印考》中，故此书仅存印面。其后，吴云在《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六卷）基础上增订为《两罍轩印考漫存》（九卷）一书，则具体体现了《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对其印谱编纂的影响。

余喜藏先秦两汉以来古铜玺印，前后积至一千余钮。曾仿昔人编辑印谱之例，将官私各印，分类排比，印成十二册，未加考释，但存印文真面而已。内官印二百余钮，颇有为历代官制所未见者，可以补史志之阙。因汰去重复，采取各家考证，参以所见，作《古官印考》六卷。复肖摹印钮于前，而以原印印于后，逐印加以考释。同志皆叹为印谱中创见。……查《古印考》十二卷，原定官印八卷，私印四卷。今已刻成官印六卷，私印三卷，虽未藏事，固已袞然成集矣。与其来之高阁，何如将已钺之版，略加排比，先行刷印，俾索观者得遂先睹之愿。……盖官印关系历朝职官制度，有裨史学，故录至胜国为止。私印古今同姓名者多，不能不示区别。因按印之形制，文之篆法，详加审择，一以六朝为断，唐以后不羸入也。……^[72]

吴云认为先秦两汉以来古铜玺印，可考历朝职官制度，补史志之阙，有裨史学，其书中印章的考释也确实体现了吴云的这一观点。而印钮于前，原印于后，逐印考释的这种编排，虽然金石诸友都叹为印谱中创见，但与瞿书相比较，无论是体例还是编纂都体现了瞿书的影响。兹举一例，以作比较。

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

假司马印（鼻钮）

假司马印。《集古印谱》曰：“前汉班超以假司马使西域。”《七修类稿》曰：“耿夔为车骑将军，突突假司马。”《山左金石志》云：“案，诏假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文虽不同，同一司马，副贰官也。”假司马官见《汉书·赵充国传》。中溶案：又见《西羌传》，司马等官当为将军之属，非副贰也。^[73]

《两罍轩印考漫存》：

右印文曰：乐昌侯印。按：《汉书·地理志》，乐昌属东郡。吴氏《地理志补注》曰，寰宇记今魏州南乐县，汉为乐昌县。《北道刊误志》：澶州南乐县，本汉乐昌县属东郡。《名胜志》：南乐县在大名府城东南四十五里，秦东郡地，汉置乐昌县，高后封张敖子寿，宣帝封王武并为乐昌侯。《大清一统志》：今大名府大名县，治本汉乐昌县地，宋政和六年所移治之南乐镇也。《水经注》以后，魏所置之昌乐县为即汉东郡属县。《元和志》因之，《旧唐志》又以为晋置而《晋志》不载各书，参错不一。考《汉书》本作乐昌，名既不同且地在黄河西，亦非东郡之界，盖乐昌本魏郡魏县地。《地形志》云，太和二十一年分魏所置是也。瞿氏中溶曰，《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乐昌侯：宣帝地节四年二月封表，下注汝南。考西京汝南并无乐昌，而《续汉·郡国志》汝南东郡亦皆无乐昌，则此印当为西汉时物，或《班志》汝南是东郡之误。^[74]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先附印面，次释印文，再标印纽形质，版式上上附印章、下附印文考释的体例与《两罍轩印考漫存》大致相同。只不过在版式上，《两罍轩印考漫存》将原印印面与印纽形状摹图单附一页（将印面与印纽形状摹图单附一页，亦受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体例的影响）。^[75]下页再附关于此印章的印文考释。而在印章的考证上，二书均援引广泛，多引历代地理志和金石志。《两罍轩印考漫存》除引诸书外，多次引用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内容，从而可见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对吴云《两罍轩印考漫存》一书的影响。

七、吴大澂与《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印谱考略》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恧

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官至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著有《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印谱考略》《古陶文字考释》《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等。陈介祺与吴大澂外祖父韩崇为金石故交，故陈介祺于吴大澂始终以子侄辈待之，金石拓片之外，陈介祺对吴大澂之修身处世、家国大事多有指点。陈吴二人函札往来，交往密切，吴大澂曾言：“古文字之好，不乏同志，为长者与大澂为最笃，声气应求，不谋自合。”^[76]可见两人之关系。

光绪元年（1875）、光绪四年（1878），篋斋两次致书吴大澂（见《陈介祺与〈集古官印考证〉》一节），皆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之事。第二次致函中言及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因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稿本曾为吴大澂所得，陈介祺搜访南方金石著作，吴大澂先后分两次寄于陈介祺。因此，徐同柏、瞿中溶之金石考释思想必然对陈介祺有所影响。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刊成，吴大澂为之作序。序中言：“曩在里门，假馆外王父韩履卿先生宝铁斋，……后于翁叔均上舍处，钞得嘉定瞿木夫先生《集古官印考证》目录一编，以大澂所集校之间，有是编所未及，终以不得一见全书为憾。……今春携书过访，展卷读之，鉴别之精，考据之确，与历代职官与地志书相印证，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元、明以来著录家所不逮。”^[77]可见，吴大澂早年于翁叔均处即钞得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目录，只是未见全书。其后书成，吴大澂认为考据鉴别之精，足以与史书职官志与地理志相互印证，因此尤为推崇。于此可见，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必然通过陈介祺影响了吴大澂的金石、印学著作编纂。而吴大澂在与篋斋的通函中，也表达了将所藏印章与史书相互参证的观点。

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六日，吴大澂致函篋斋，云：

新正杜门无事，日读两汉书数十叶，与古人相对，五六年来自无如此清闲之日。偶检篋中旧藏铜玉印，留心考证，知两面印大半出西汉，其字多某公、某兄、某卿、某孺、某君，又喜用宾字、威字、王孙字，皆西汉人。两面印之大者，似系汉初或在建元以前。子母印之大者，多辟邪钮，多白文，疑皆三国时物，名亦多一字者，不称“私印”而称“印信”。又有小印而辟邪钮者，其爵必尊，似前汉名印以大为贵，三

国名印以小为贵，亦一时风尚欤？此论前人所未发，为大澂之创见，惟长者阅古至多，用心至微，当有与鄙见相合者。敝藏私印中，竟得西汉二十人（封侯者十二人，作《十二侯名印歌》；见于《儒林传》中者五人《作五儒咏》），东汉十五人，蜀汉六人，惟西汉之张平、王悍、许负，皆两面印，极大，同时所制似非强合。蜀汉之李严，系辟邪钮，涂金甚精，或即正方之遗物未可知也。想尊藏私印数千，可考者必不少。试取《汉书》中《王子侯表》《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一一检之，必可得数十人。《后汉》《三国》无表，检查不易，极盼《印举》编成，分购一部以资眼福。如有手编目录，抄寄一分，亦极欣慰。去春闻新得古顷甚多，有拓本否？如蒙赐书，仍交东甫，此间有领餉委员进京，至便也。大澄又启。^[78]

张平封藏鹵侯，见《汉书·功臣表》。三印皆汉初制作。王悍为赵内史，諫王无反，不听，被杀。景帝中二年，封其子王弃之为新市侯，见《景帝纪》及《功臣表》。

许负善相，河内温人，老姬也，见《周亚夫传》应劭注。又《三国志》注引《楚汉春秋》，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

《王子侯表》安罪侯之后有名毋妨者，疑此即刘毋妨之印，不着姓耳。

蓝田玉印。按《汉书·外戚恩泽表》，平昌节侯王无故之子名接。五凤元年，嗣侯，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见《百官公卿表》。……^[79]

从上面可以看出，吴大澂赴吉林宁古塔、琿春校阅防军，军余之暇，就自己所藏铜玉印与《汉书》相印证，以补史之缺漏。而篋斋藏印更多，吴大澂建议篋斋就其所藏与《汉书》中《王子侯表》《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相印证，必然能补史书之阙误。在书后又附其据史书所考之印章。枫江书屋主人藏有《篋斋封泥》一部，内有吴大澂考释和批校，白谦慎认为此书“吴大澂考释陈介祺藏封泥的时间很可能在驻防宁古塔期间”^[80]。而书中考释体例亦相同，如：

河东太守章：《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注：秦置。莽曰兆阳，有根仓、湿仓。属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

濮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虢、杨、北屈、蒲子、绛、狐、驩、骐。^[81]

可见，此时吴大澂已明确表示以印章证史书之阙误的印谱编纂思想，这一思想在其后的印学和金石著作中得以印证。而书中考释体例也与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颇为相同。

因此，无论是光绪十九年（1893）成书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还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书的《续百家姓印谱考略》，都是以印证史的最好例证。而在编纂思想、印谱体例上，都体现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的影响。兹举两例，以作论证：

《周秦两汉名人印考》：

张良私印：（篆书）汉留文成侯张良。《汉书·功臣表》：“文成侯张良，以廐将从起下邳，以韩申都下韩，入武关，设策降秦王婴，解上与项羽隙，请汉中地，常为计谋。侯，万户。”^[82]

陈平私印：（篆书）汉曲逆侯陈平。《汉书·功臣表》：“曲逆侯陈平，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起修武，为都尉，以护军中尉出奇计，定天下。侯，五千户。”^[83]

《续百家姓印谱考略》：

族、第、编、审、礼、义、昭、宽、临、淮、宛、陵、重、卿、交、垣（每姓下有印章）：《万姓统谱》有族姓，见《姓苑》。《统谱》有第姓，见《姓苑》。《后汉书·方技传》有编育意。《史记》有审食其。《后汉书·曹节传》有审忠。《三国志·袁绍传》有审配。《后汉书·儒林欧阳歆传》有礼震。《史记·酷吏传》有义纵。《战国策》楚有昭奚恤。宽姓见《统谱》，洪武中进士宽彻，宣德中贵州永从县知县。宽和，咸宁人。《后汉书·郑玄传》有《答临孝存周礼难》，《隋书》有临孝恭。《统谱》淮姓，见《姓苑》，嘉靖中通州同知淮锡，太平府推官淮大相。《左传》郑有宛射犬，楚有宛春。《正字通》永乐中滦州同知陵茂。《正字通》重姓，重黎之后，明有重省。《风俗通》卿姓，虞卿之后。《统谱》交州，名见《姓苑》。《统谱》汉西河太守垣恭，公孙述将垣副。《宋书》有垣护之。《南齐书》有垣崇祖，垣荣祖。^[84]

从上面可以看出，《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

印谱考略》都是先附以印章，然后将印章内容与史书相互参证。虽然在具体的体例上（比如未附材质、形状）略有差异，但两书整体上与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另外，除了吴大澂印学著作的编纂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影响之外，吴大澂金石著作《古玉印图考》的编纂，在体例上也受这种考据之风的影响，且编纂体例与其印学著作有着相似之处。

陈介祺与吴大澂一生函札往来，交往最密。陈介祺在编纂《十钟山房印举》的过程中，曾致函吴大澂搜求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其强调瞿书之胜在于“考证”，而吴大澂早年即于翁叔均处抄得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目录，书成后又为之作序。因此，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正是通过陈介祺而对吴大澂产生影响。吴大澂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印谱考略》，从书名到编纂体例，都体现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对吴大澂产生的具体影响。而吴大澂的金石、印学著作所体现出的考据倾向，也是时代风气、友朋熏染在金石、印学著作的具体体现。

八、《齐鲁古印摺》与《续齐鲁古印摺》

陈振濂曾言：“在地域印谱的考据业绩中，则是以山东潍县人高庆龄编《齐鲁古印摺》（1885）和其甥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摺》（1892）为最著名。”^[85]两书的编纂也确实体现出这种考据之风，而这种考据风气的形成却是由于陈介祺的影响。

高庆龄（？—1883），字叔余，号南郑，潍县西关人。著有《齐鲁古印摺》。其子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受父影响亦嗜金石，辑有《齐鲁古印摺补》一卷。其侄高嘉钰，字丽珍，号式如，亦喜收藏，辑有《秦汉印简》四卷、《古印谱影》等。高庆龄与簠斋同处一邑，因而时相往还，朝夕过从，金石收藏受簠斋影响颇大。因簠斋之介绍，陈介祺的金石好友多与高庆龄有交往。而《齐鲁古印摺》的成书正是受陈介祺影响，高庆龄与子鸿裁、侄嘉钰共同考证、辑校得以完成。

从金石诸友对《齐鲁古印摺》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此书的考据之风：

今吾友高君辑三代、秦、汉所遗玺印六百余，而

所得玺不少，可补鼎彝文字所不及，且无一伪者，非精鉴而能若是乎！^[86]

玺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际，如司徒、司马、司工、司成之属，半皆周官。又司祿一官，今《周礼》下注阙。而玺印中有之，其上二字，亦绝不可识，真汉人所谓奇字矣。人名者渐近小篆，有秦汉之际者矣。今日而欲以朝代识别之，亦止若是耳，难确属也。至当时玺印所施，识大识小，各随事为用，亦不可概定。……以古印玺之官名者冠于前，人名者次之，不强别其为某周，某秦，某为秦汉之际者，各以类从，而以秦汉官私印附焉，名之曰《古印摺》，其识卓矣。……其升古玺印于秦汉印前者，为从来谱录家所未及，此非深通古文者，能如是乎？吾服南丈之卓识矣。^[87]

……此特变通其例，标古玺于简首，秦汉诸印次于后，较之前谱，稍有伦叙。即历代设官分职，地里姓氏，亦可得其梗概焉。年来家居赋闲，屏绝尘纷，恒藉古缘以娱老，每有一得，于炉香茗碗间，辄摩挲抚拓，参稽考校，骛骛分神与古会矣。夫辑印之举，未尝限于方域，而所获者据《史》《汉》考之，往往出于齐鲁间，以其遐者难见，迩者易求也。名其书曰《齐鲁古印摺》，摺者，《说文》从手，糜声，拾也。言摺拾古人之遗也。余尽力搜访，期盈千数，然后逐加诠释，出以问世。^[88]



潘祖荫认为高庆龄所收无一伪者，且古玺印可补鼎彝文字之不及。而王懿荣序中所言，古玺印可补《周礼》之阙，尤其是王懿荣认为《齐鲁古印摺》将古玺印置于秦汉印之前，为从来谱录家所未及，尤为卓识。高庆龄在自序中亦言及古玺与《史记》《汉书》职官志、地理志相互补正的观点，且在《凡例》中明确提出：“官印中如侯将相尉等，及私印中公孙宏、王成、徐咸诸人，皆列正史，俱系考据。其不详者，则亦旁引曲证，必援诸书为论断。”足见欲以古玺证史这种考据之风对其印谱编纂的影响。而《齐鲁古印摺》所体现出的考据之风正是受陈介祺的影响。首先，在印谱所收印章的选择上，“去伪存真，悉心甄别；稍有可疑，及模糊莫辨者，不收。”陈介祺一生著述谨慎，精益求精，二人往来，簠斋这种著述态度必然对其有所影响，因此高书“稍有可疑，及模糊莫辨者，不收”。这也体现出高庆龄著述的谨慎。其次，王懿荣、吴云认为《齐

鲁古印摺》将古玺印置于秦汉印之前，尤为卓识，其实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的编纂中早已体现，且初步认为古玺为六国文字。^[89]最后，检阅《齐鲁古印摺》一书，我们并未发现其中关于印章的考释。高庆龄在凡例中言：“兹因诠释未备，容后一并付雕。”只因当时考释并未完成，只能先行刷印。而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在书中也未附考释，其在凡例中称：“欲以考释别刻，附后自成一书。”陈介祺、高庆龄同处一邑，且高庆龄每有所得必请陈为之考释。因此，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这种欲先附印章、再附考释的体例，必然也对高庆龄产生影响。

如果说《齐鲁古印摺》受陈介祺之直接影响，那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摺》则受陈介祺之间接影响。

郭裕之（1847—1912），字锡民，号申堂，山东潍县人。著有《续齐鲁古印摺》十六卷。郭裕之乃高庆龄之外甥。《续齐鲁古印摺》是接续其舅之作，自然在编纂体例上受高庆龄之影响。而察其著作，我们发现《续齐鲁古印摺》与《齐鲁古印摺》并未附有考释，是否考释单独另刻一书或考释尚未完成，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其宋书升序言中对“易向邑墾徙盦卢郈”之考订，我们可以看出此书的考据之风。宋序云：

余退考其文，因臆释之曰：玺篆文易向邑墾徙盦止郈。易即“易”字，为“阳”之古文。《春秋》“阳”三见：文公六年，晋杀其大夫阳处父。阳为处父食邑。《一统志》云：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东有故阳城，汉为阳邑，晋大夫阳处父邑，昭公十五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今直隶保定府唐县东，有汉唐县故城，即其地。闵公二年，齐人迁阳。杜预注：国名。《世族谱》云：土地名，阙，不知所在。案：《汉志》“阳都下”应邵注：“齐人迁阳，故阳国。”是阳都在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境。此玺确出沂水界中，则易即阳国。《礼坊记》曰：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盖当时亦强大之国也。向邑，向当是“向”字。《春秋》宣公四年，伐莒取向。杜预注：莒邑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注所指，为今在兰山境之向城镇。儒者多以为非。《太平寰宇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去莒为近。经书“取向”，当在是承县向城。即此玺“向邑”之向。盖阳都在沂水西南葛沟西，向城镇在兰山西南洳河东，

两地相距百余里，当时必为其属地。篆文加“邑”作者，识别之文，亦犹樊或作𦉠，祭或作𦉡，奄或作𦉢耳。，依文求义，应为聚。聚、聚二字，古通用。《说文》聚，会也。一曰，邑落曰聚。《后汉·平帝纪》张晏注：聚，邑落也。皆谓邑之村落。曰“阳向邑聚”，国大于邑，邑大于聚，相统之辞。

……此玺殆所谓玺节者欤？尝谓金石可证先圣遗籍，今得是，以借见经中古器形制，宜嗜古者之珍赏之也。越日，录此以复申堂，申堂曰：“子所释有深契吾心者，今谱既成，曷书诸册，以志作谱之缘起乎。”复质诸翰生，翰生曰：“古文既失传，后人释者，皆虚揣影射，是非莫由据足，故滋讼纷。如今录是释以质当世通人，证其是非，未始非问学之意也。”^[90]

郭裕之为宋书升之舅，而高庆龄又为郭裕之之舅，故舅甥之间学风不免相互熏染。宋书升引经传史书对此印加以考证，谓金石不仅可与典籍互证而且可见古器形制，深得郭氏赞许，而郭裕之对谱中之印欲加以考释，这也是此书编辑的缘起。郭裕之这种印谱考释之风正是来源于其舅高庆龄的影响，而高庆龄又受陈介祺考释之风影响。只是《齐鲁古印摺》《续齐鲁古印摺》与《十钟山房印举》一样，成书之前未能将印章考释附上，未免憾事。

九、孙文楷与《稽庵古印笺》

孙文楷（1847—1912），字模山，号稽庵，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其子延宾，亦擅金石学。益都为齐鲁古郡，出土古物甚多，孙文楷所藏器物，大部分来源于周边地区。而其又精于篆刻，著有《稽庵古印笺》一书。

孙文楷与簠斋为金石交，彼此函札往来，书信不绝。孙文楷所藏古玺、陶器、青铜器上之古文字考释，多请教于陈介祺。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二十日，簠斋为其作《铸子鼎考》。光绪十年（1884），孙文楷作《潍阳陈簠斋年丈近新获器侯馭鼎蒙惠拓本兼以释文相示歌以志之（原释附）》，长诗中提道：“惠我佳拓及释文，森森剑气冲牛斗。摹拓精细穷毫芒，考据详明期不苟。”^[91]簠斋赠予拓本并为其考释事。孙文楷在《稽庵古印笺》序言中多次提到他与陈介祺的交往以及陈对其的影响。

尝就正于潍阳陈寿卿年丈，嗜好既合，启迪殊殷，

赠以弁言，系以评跋。寸心相印，辄以精博见推；尺素远贻，复以著述相勖。余虽逊谢不遑，未尝不感激思奋也。自是每有新得，互为欣赏，或论世次之先后，或商篆法之异同，疑义与析，乐此不疲。余有志于集印，实自此始。……时寿卿年丈已归道山，惊老成之遽谢，欲就质而无从，原稿具在，题识如新，摘录卷中，用志向慕……所恨掇聚维艰，见闻有限，徒存表章之志，曾无愉快之期，异日或得萃齐郡之吉金，备益邑之掌故，确有论著，以不负前辈期许之殷。^[92]

孙文楷与陈介祺交流所得，讨论辩难，疑义相析，《稽庵古印笺》一书，正是孙文楷与簠斋函札往讨，在簠斋的勉励下才得以成书的。簠斋对孙文楷《稽庵古印笺》多有题记：“大著考释精博，敬佩敬佩！持此以谒郎亭，助修《山左金石志》，亦足以传矣。愚弟陈介祺拜读。”又：“秦豫以官印胜，齐鲁以古玺长。小玺阔缘者，旧谱以为秦物，而不收大玺，盖以为废铜销毁者多矣。介祺又识。”^[93]陈介祺认为《稽庵古印笺》一书考释精博，持此以谒汪鸣鸾，助修《山左金石志》，亦足以传矣。而《稽庵古印笺》一书的考释思想和具体编纂体例正是受陈介祺金石考据思想的影响。

光绪九年（1883）十二月十四日，陈介祺在复孙文楷书中云：“求古人文法，必多见金文拓本。始得参互考证者，必以经文为本，以吉金为例，以上下文义为定，以《说文》为阶。舍《说文》今日无从识古字，舍吉金今日无从正《说文》、补《说文》也。”^[94]

陈介祺以吉金文字补正《说文》的提法，在致金石诸友的函札中早有提出。孙文楷求教古人文法，陈介祺认为古人文法必须以经文为本，以吉金为例，参考上下文，以《说文》为阶梯，方识得古人文法真义。在书中，陈介祺尤其强调吉金文字补正《说文》的观点。而在《稽庵古印笺》中，孙文楷也多次强调以古玺印与古文字相互印证的观点，其云：

余所蓄印，古玺颇多，爰出旧藏，拓为一册，溯元公之旧典，断自周而来，订六代之驳文，等诸自邹以下，鉴别维审，笺注纂详，将欲附古以成书，窃比不贤之识小。……泥印不嫌其褻，神印不厌其诬。志在正篆，兼取唐、宋叠文；意恐乱真，附存金、元押记。……今取此册观之，古玺用籀文，而多参奇字；

汉印杂隶体，而旁及虫鱼，增减有法，凿铸同工，斯又括乎篆学之全，而不仅以一体著矣。^[95]

“订六代之驳文”“志在正篆”“斯又括乎篆学之全”，足以看出陈介祺文字考释观念对其编纂的影响。而在序言中，孙文楷多次提到古印与经传史书相互印证的观点。

“之玺”“信玺”，实官私所分；从上、从金，即古籀之别。考其文，旁征于《易传》；辨其用，莫备于《周官》。每慨昔贤未详古制，举凡图章之谱，率以秦、汉为宗。……古玺以临淄为胜；官印以济南为多。秦私印不敢滥登，恐与汉印混也；象形印不忍割爱，可作汉画观也。二名多存古义，吉语兼志方言，标汝印以广异闻。附带钩以备一格。……夫印之为物小，而所关甚巨。周室班爵祿，籍已去而难详；汉表纪公卿，文虽存而从略。今玺印流传渐广，考证攸资。“司祿”“司工”，犹沿周礼；“廐将”“阜将”，均系秦官。“马丞”补军政之遗，“仓库”征半通之制，此官印可贵，为其有裨史学也。私印所以纪姓名，视官印有间矣。顾名字相配，足为解经训诂之资；氏族罕传，或出《姓苑》诸书之外。既有益于穷经，亦旁通乎谱系，况平津玉印，犹在人间，疏广私符，得从故里，抚桑梓而念先贤，未始非抗希之一助也。……庶几摹成印史，重睹汉官威仪；谱出玺书，再见周京法物。^[96]

孙文楷认为官印、私印有别，象形印可作汉画观，吉语可与方言互证，官印可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印证，私印可解经训诂，通乎谱系。印章虽小，却关系重大，不仅补经传史书之不足，且能与古代制度相印证。这些观点，陈介祺与友人信函中亦多有论述。孙文楷与簠斋函札往来，陈介祺抱着为古人传的态度及金石考释的思想必然对孙文楷影响颇深。序言所言：“至使考古者薄繆篆而不为，视印式为清玩，不亦虚乎！”^[97]孙文楷这种不以印章为玩物的观点，也是受陈介祺以传古为己任，不涉色泽赏玩语的影响。

另外，在印章的具体释例上，孙文楷《稽庵古印笺》与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也一脉相承。兹举一例：

部曲将印：^[98]

按：部曲将之名，《班表》不载，仅附见《后汉书》献帝纪及何进传，此官或即始于东汉。《续汉志》

云：“大将军营五部，其领军皆有部曲。”此大将军有部曲将也。又云，其余将军置以征伐，皆有部曲、司马、军侯以领兵，此部杂号将军，有部曲将也。又考晋《郭休碑阴》，郡领县八兵，三千人参战，二人骑督，一人部曲，督八人，部曲将三十四人，此（皆）晋制也。部曲将一官，汉晋相沿，不改秩之尊卑，似亦不同录之，以备参考。^[99]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在“部曲将印”注释中，孙文楷引《班表》《后汉书》《续汉志》《郭休碑》与印章内容互证，孙之释例与瞿书相同。虽然我们无法找出此书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释例影响的直接证据，但孙文楷与簠斋函札往来，不免受其影响颇深。虽然孙文楷在序中称《稽庵古印笺》一书“窃仿康成笺诗之义也”，欲仿郑玄《诗笺》的解释系统，但实际上，在古印与经传史书相互印证的观点上，孙文楷还是受陈介祺金石考据思想的影响。

十、结论

晚清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发展也使考证之风成果突出，二者互为推进，相得益彰。金石学家的印谱编纂也反映了这种考据风尚。将印章与经传史籍相互印证，考察印章的职官、地理、文字，补史籍之缺漏，成为这一时期印谱编纂的主要特征。正如陈振濂所言“以学术为印谱，以印谱彰显学术，这是清代中叶以后印谱史诸内容中与学术环境、与文化背景结合得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即使说清代以后的所有印谱編集，都是以此一精神为根基，恐怕也不为过。正是依据此，我们才说这是一个学术考据的印谱史时代。”^[100]通过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诸友的印谱编纂考察，我们发现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诸友的印谱编纂，几乎囊括了晚清的考据印谱编纂，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整体特征与内在联系。

陈介祺早年与金石友张廷济相交往，张廷济编有《清仪阁古印偶存》一书，陈介祺的金石友瞿中溶、徐同柏参与成书，而张廷济编纂此谱的审慎、求精态度，必然对瞿中溶、徐同柏有所影响。此后，陈介祺所获吉金拓片多请徐同柏为之考释，而徐同柏为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

逐印考释的体例，必然也影响到了陈介祺。然而，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因编纂体例尚未尽善，故其印谱对陈介祺虽有影响但不突出。此后，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成书，陈介祺在致金石诸友函札中，屡屡搜访，多次提及，且强调此书重在“考证”。因此，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诸友如吴式芬的《封泥考略》，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两鬯轩印考漫存》，吴大澂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续百家姓印谱考略》，高庆龄的《齐鲁古印掇》，郭裕之的《续齐鲁古印掇》，孙文楷的《稽庵古印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具体编纂体例上都通过陈介祺受瞿书的影响。只不过瞿中溶此书对陈介祺、吴式芬、吴云、吴大澂的印谱编纂影响更为直接，而对高庆龄、郭裕之、孙文楷的印谱编纂影响则通过陈介祺的居中传递，影响稍显间接。可以说，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正是贯穿于晚清印谱编纂的主流。而这条主流，又可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是《集古官印考证》对金石诸友印谱编纂的影响，此后又影响到民国印谱的编纂，如罗振玉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赫连泉馆古印续存》；另一条是《集古官印考证》对《封泥考略》的影响，在其后为周明泰的《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罗振玉的《齐鲁封泥集存》，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所承继，影响了晚清民国封泥印谱的编纂。虽然，本文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有关晚清印谱考据之风影响的部分论据稍显不够充分，但这种影响确实一脉相承、真实存在。总之，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正是通过陈介祺的多方搜求，才在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朋友圈中产生影响，对以陈介祺为中心的金石圈乃至民国初年的印谱编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 [1]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6页。
- [2] 陈育丞：《簠斋轶事》，《文物》1964年第4期。
- [3]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528页。
- [4]《丛书集成初编》7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357页。
- [5] 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
- [6] 陆明君：《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89—90页。
- [7] 陈介祺撰、陈敬第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涵芬楼1919年影印本，第十一册。
- [8] 陈介祺：《簠斋尺牍》五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9] 陈介祺在致吴云中曾云：“古玺在叔末处亦未甚标异，自弟以钟鼎引中发明，当更增重。”簠斋指出张廷济对古玺虽有认识，但在体例上未将其单独列出，簠斋则单独列出，分类排印。参见陈介祺撰、陈敬第辑：《簠斋尺牍》十二册本，涵芬楼1919年影印本，第十二册。
- [10] 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序言，吴云編集：《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西泠印社1983年版。
- [11] 张璜：《〈十钟山房印举〉纂例考》，香港大学《东方研究》1955年第2期，第260页。
- [12] 吴云著、白云娇辑释：《吴云函札辑释》，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页。
- [13]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5页。
- [14]陈介祺在编纂《十钟山房印举》过程中欲参考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而加考释，虽然相关学者已有提及，但未详细论述。参见《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 [15] 同[6]，第60页。
- [16] 同[6]，第61页。
- [17] 俞冰编：《名家书礼墨迹》第一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30—134页。
- [18] [19] [20] 同[7]。
- [21] 同[7]，第九册。
- [22] 同[18]。
- [23] 同[7]，第十二册。
- [24] 同[21]。
- [25] 同[23]。
- [26] 同[23]。
- [27] 吴云撰、沈云龙主编：《两鬯轩尺牍》卷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264册，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70—671页。
- [28] 同[23]。
- [29]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0页。
- [30] 同上，第31页。
- [31] [32] [33] [34] 同[7]，第十册。
- [35] [36] 同[7]，第七册。
- [37] 同[31]。
- [38] 同[7]，第二册。
- [39] 同[29]，第295页。
- [40] [41] [42] 同[6]，第349页。
- [43] 同[29]，第323页。
- [44] “近为山东省图书馆收得潍县陈氏旧藏原刻本凡十二卷”，十二卷当为十三卷，疑为当初编辑此书时误入，待考。参见王献唐：《陈簠斋批集古官印考证》，《五灯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2页。
- [45] 关于瞿中溶的生卒年问题，兹参考孙洵先生之说。详见孙洵：《论清代学者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证〉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与意义》，《“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 [46] 孙洵《论清代学者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证〉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与意义》一文，对翟氏的学术渊源、成书特色与学术意义做了详细论述，见《“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74页。另，陈殷识《瞿中溶金石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对瞿中溶的金石学成就做过全面论述。惜二文均简略。

- [47][48] 瞿树镛：《瞿树镛后跋》，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833页。
- [49] 同[47]，第834页。
- [50] 此前言实为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中之《陈簠斋批集古官印考证》一文。
- [51] 瞿光业：《瞿光业补跋》，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835页。
- [52] 瞿中溶：《瞿中溶自序》，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 [53] 吴大澂：《吴大澂序》，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 [54] 袁保恒：《袁保恒序》，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 [55] 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 [56] 罗随祖：《论秦汉南北朝官印的断代》，《西泠艺丛》1989年第3期，第6页。
- [57] 同上，第7页。罗氏在对《集古官印考证》推崇的同时，也直言其失：“其于学术之贡献不自待言，但也有重考证而忽断代之弊，往往一印列举历代置设迁废，有往往推某印为某人之印。至张冠李戴，殊多错谬。”
- [58] 瞿中溶著、陈介祺批校、陈进整理：《集古官印考证》（批校本）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 [59] 同上，第580页。
- [60] 同[55]，第52页。
- [61] 同[58]，第19页。
- [62] 近来，簠斋之六世孙陈继揆所著《十钟山房印举考释》经其子陈进整理，终于面世，簠斋当初编纂《十钟山房印举》欲加释例之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 [63] 同[6]，第61页。
- [64] 同[55]，第52页。
- [65] 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卷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2页。
- [66] 吴式芬、陈介祺：《汉官私泥封考略》，《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三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 [67] 孙慰祖先生也认为《封泥考略》的体例参照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一书。其在《封泥：发现与研究》中言：“《封泥考略》开启山林，最早进行了封泥文字和古代官制、历史地理相互联系的考证。《封泥考略》的体例，参照了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一书，编次则按《汉书》的《百官公卿表》（下简称《百官表》）和《地理志》（下同）为纲，表明了以实物证史的主旨。《考略》的考释重点在于对封泥文字史料的历史文献引证，主要着眼于印证史书记载之不诬，阐明史书未详的官制地名，补正史书传记的文字几个方面。《考略》的编著代表了早期学者利用封泥文字进行古史研究的水平。考证的简赅精审是《封泥考略》的风格之一。”参见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 [68] 同[7]。
- [69] 同[27]。
- [70] 同[12]，第257—258页。
- [71] 同[10]。
- [72] 吴云：《两鬯轩印考漫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 [73] 同[58]，第168页。
- [74] 同[72]，第2—3页。
- [75] “一印一页，似太废纸，然易印不至损纸，易编可以更正，易补可至大观，不至一成难变。推之《说文》分字统编众书亦然，无续集、补遗之弊。”参见陈介祺：《簠斋鉴古与传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 第25页。
- [76] 吴大澂著，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信四种》，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 [77] 同[53]。
- [78] 同[76]，第80页。
- [79] 同[76]，第81页。
- [80] 白谦慎：《吴大澂和封泥研究》，《中国书画》2020年第2期，第5页。
- [81] 同上，第7页。
- [82] 上海图书馆编：《周秦两汉名人印考》，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 [83] 同上，第13页。
- [84] 同[4]，第377页。
- [85] 陈振濂：《中国印谱史研究导论》，《中国印谱史图典》（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 [86] 潘祖荫：《齐鲁古印掇序》，载于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08—509页。
- [87] 王懿荣：《齐鲁古印掇序》，载于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09页。
- [88] 高庆龄：《自序》，载于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09—510页。
- [89] 关于古玺的认识，罗福颐先生曾在《古玺汇编》序言中作出梳理：“战国古玺之传世，早见于明人印谱中，而当时不明其时代，皆列于秦汉印之末，至清初仍然。迨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始称战国玺为古文印。至吴式芬《双虞壹斋印存》（在同治初年）签上始有‘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字样，列在秦汉印之前。至陈簠斋在清同治十三年，始称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而近西周者（见簠斋致吴云尺牍），继之王懿荣作《齐鲁古印掇序》（时在光绪七年），始谓玺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际。因之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始收录古玺文字。迨《赫连泉馆古印存序》中，方发见古玺中有成语印，如‘敬事’‘明上’之类。继之海宁王观堂王据颐《古玺文字征》稿作《桐乡徐氏印谱序》，始确定古玺文为六国文字。近世以来，湖南长沙战国墓之出帛书及仰天湖墓之出遣策、河南信阳之竹简、安徽寿县之鄂君启节、山西侯马之盟书等次第出土，其书体与古玺文十同八九，于是古玺之时代益信而有征。”参见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 [90] 宋书升：《续齐鲁古印掇序》，载于郁重今编纂《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19—520页。
- [91] 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50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1—659页。
- [92] [93] 孙文楷：《稽庵古印笺》，《中国图书馆藏珍稀印谱丛刊·天津图书馆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 [94] 同[6]，第420页。
- [95] [96] [97] 同[92]。
- [98] 此页另有一方“部曲将印”，旁边注：“钮制、篆文俱同前品。”
- [99] 同[92]。
- [100] 同[85]，第46页。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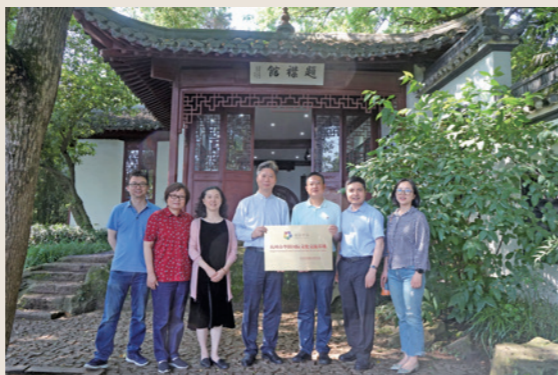
徐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书法与文字学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

艺丛信息

01 西泠印社获“杭州市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称号 02 全日本华人印社社长换届仪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0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心向南湖’——西泠印社嘉兴籍社员主题创作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04 “邹鲁流风——济宁西泠六家艺术展”在济宁举行 05 “西泠印社·济宁金石文化座谈会”在济宁召开 06 “‘盛世承平·金石留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泠百家题刻淄砚铭文展”在淄博市举行 07 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二〇二〇届赵熊篆刻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08 “百年印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泠印社青田石篆刻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09 《西泠印社》获评年度十大纪录片 10 西泠印社社员王友谊先生逝世

01

5月14日，西泠印社“杭州市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授牌仪式在孤山社址举行。中共杭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裘建平，中共杭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巡视员范方军共同授牌，中共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秘书长、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宏伟，中共西泠印社党委委员、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及相关处室人员，杭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宣传部工作人员周萌出席授牌仪式。



西泠印社自创社以来，一直积极开展以金石篆刻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海外交流与传播。本次获“杭州市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既是对西泠印社过去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西泠印社在未来继续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工作的激励与鞭策。

授牌仪式后，双方就今后开展合作交流进行了座谈。市侨联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将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展充分的合作，在杭州城市文化内涵的宣传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推广中形成合力，拓展双方的合作内容，充分发挥侨胞的纽带作用，争取形成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02

5月17日，全日本华人印社社长换届仪式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行，邹涛卸任社长，晋鸥接任新社长。全日本华人印社成立于2014年，为在日本推广篆刻艺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一届社长名单：社长：晋鸥；副社长：马景全、马燕平、吕军、高小飞、沈强、段冰、张大顺、姚小全、姜熊烽、程俊英、韩达、傅巍（兼秘书长）。

03

5月19日上午，由西泠印社、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主办，嘉兴市文联、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国印学博物馆承办，杭州日报协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心向南湖’——西泠印社嘉兴籍社员主题创作展”及红船精神宣讲会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西泠印社嘉兴籍社员王勋、张宏、陈浩、沈慧兴、唐吟方、袁建初、晋鸥、袁道厚、傅其伦、鲍复兴、管凌，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精神入印、入书、入画，以诗书丹青再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以刀笔耕耘铭刻党的丰功伟绩，创作精品力作110件。嘉兴方面，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登峰，嘉兴市文联副主席傅琦红，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钟晓燕，嘉兴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戴振国，嘉兴市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主任周剑鸣，嘉兴学院教授、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康文龙，以及参加本次展览的社员作者；杭州方面，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泠印社党委书记、副社长、社务委员会主任龚志南，杭州市党史学习教育第十巡回指导组组长张锦南，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二级巡视员林敏，中共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秘书长、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宏伟，杭州日报集团副总经理童伟中，西湖风景名胜区分管委员会副主任何蕾，以及部分西泠印社在杭理事、社员，社委会全体党员，联合支部街道社区党员代表，书画界同道，新闻媒体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共西泠印社社党委委员、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主持。开幕式后，举行红船精神宣讲会，由嘉兴学院教授、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康文龙主讲。

04

5月23日，由西泠印社、中共济宁市宣传部、济宁市文联、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济宁市孔孟书画院、济宁市金石文化研究院承办，济宁市书法家协会、济宁市美术馆、济宁印社、济宁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协办的“邹鲁流风——济宁西泠六家艺术展”在济宁市美术馆举行。展出西泠印社山东籍理事范正红，社员段玉鹏、江继基、陈靖、郑志群、谢长伟，书画、篆刻、刻壶、绘瓷等作品210件。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共西泠印社社党委委员、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社团事务处处长王丽艳等出席开幕式。本次参展作品于今年4月已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及中国印学博物馆成功举办，引起书法篆刻界广泛关注。展览于6月5日结束。

是日下午，陈振濂、秦陶、王丽艳一行考察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和济宁“小金石馆”两汉碑刻。一同参加考察的有中共济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作昌，济宁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工作室主任王宏伟及范正红、段玉鹏、江继基、陈靖、郑志群、谢长伟等十余人。陈振濂对金石馆石刻一一进行考察，并给予济宁金石文化以极高评价。

05

5月24日，“西泠印社·济宁金石文化座谈会”在济宁市召开。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共西泠印社社党委委员、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社团事务处处长王丽艳，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国华，相关领导孙爱民、张作昌、王宏伟、方志，专家邵鸿志，“济宁西泠六家”及青年书法篆刻家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议由范正红主持。与会人员先后就济宁文化资源、金石文化研究院成立情况，及如何实现金石文化资源“两创”发展、金石保护、当代价值创造、打造济宁文化品牌发表意见，并期待西泠印社给予更多支持。在认真听取与会人员发言后，陈振濂就“重振金石学”，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济宁独特的汉碑遗存优势和学术价值，金石学学术范畴界定，推进学科建设，开展汉碑课题研究，推动书法创作创新等，发表了重要学术观点，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承担新的重大时代课题达成初步共识。

06

5月22日，由西泠印社、山东印社、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盛世承平·金石留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泠百家题刻淄砚铭文展”在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举行。共展出镌刻有100位西泠印社社员作品的各种形制精品淄砚，以及由全形拓传承人制作的全形拓100件。这是继2018年、2019年两次淄砚铭文活动后，西泠印社与淄博市的再次合作。是日下午，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主持召开“器以载道”当代砚文化发展论坛，与会专家60余位，共同探讨砚文化发展。展览持续至7月20日。

07

6月1日，由西泠印社社委会主办，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承办的“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二〇二〇届赵熊篆刻工作室结业典礼暨师生作品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展出西泠印社理事赵熊，社员歧岖、孙长铭、魏晓伟、陈根远、韩钧及西泠印社赵熊篆刻工作室其他师生60件篆刻、书画作品。展览结束后导师及其团队教师共计20件书画、篆刻作品将捐赠西泠印社。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泠印社党委书记、副社长、社务委员会主任龚志南，中共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秘书长、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宏伟，及部分西泠印社在杭理事、社员，书画界同道、新闻媒体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共西泠印社社党委委员、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主持。



08

6月18日，由西泠印社、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丽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青田县委、青田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百年印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泠印社青田石篆刻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展出100位西泠印社中以中国共产党党史故事为题材创作的100件篆刻作品。中共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泠印社党委书记、副社长、社务委员会主任龚志南，青田县政协主席李飞林分别致辞，浙江省广电集团、浙江省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杭州市党史学习教育第十巡回指导组、杭州日报集团、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杭州市园文局、杭州市文联、杭州市侨联、丽水市委宣传部、青田县委宣传部有关领导以及在杭部分西泠印社理事、社员，中央及省市县十余家媒体出席开幕式。展览结束后，所有作品由青田县人民政府收藏。

09

西泠印社会同浙江省宣传部、杭州市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大学联合摄制的6集大型纪录片《西泠印社》再获殊荣，在由中国广播电视报刊协会、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纪录中国理事会等联合举办的“2020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系列推优活动”中被评为“2020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不久前，《西泠印社》还入围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系列纪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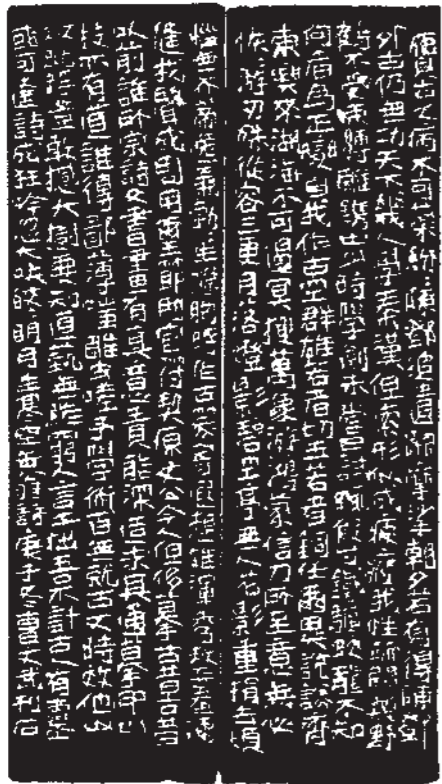
10

6月13日，西泠印社社员王友谊先生于北京平谷逝世，享年72岁。西泠印社再失一位艺术同道，不胜伤悼。王友谊，北京平谷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本科，师从欧阳中石先生。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先生德艺双馨、治学严谨、无私育人，毕生致力于篆书艺术的传承和弘扬，在篆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成就斐然。

社员近作



◎ 自有苍然古意深 曹文武



◎ 诗文书画有真意 曹文武



◎ 自我作古 高庆春



◎ 曼生多情 王立民



◎ 浑融无迹 张跃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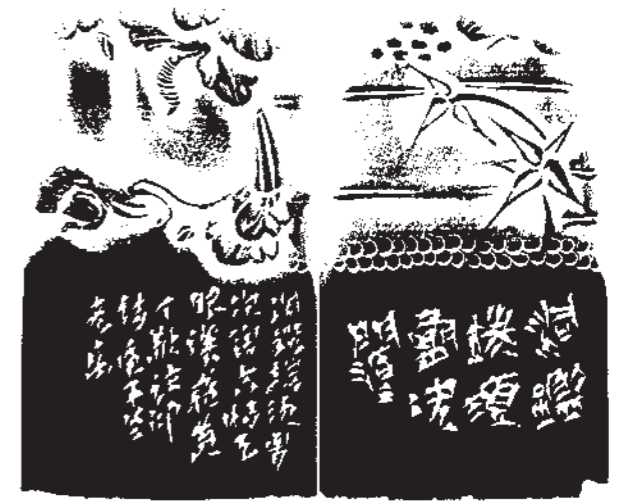
◎ 粟水孤山 王立民



◎ 解得汉人成印处 张跃飞



◎ 秦印出诏量 王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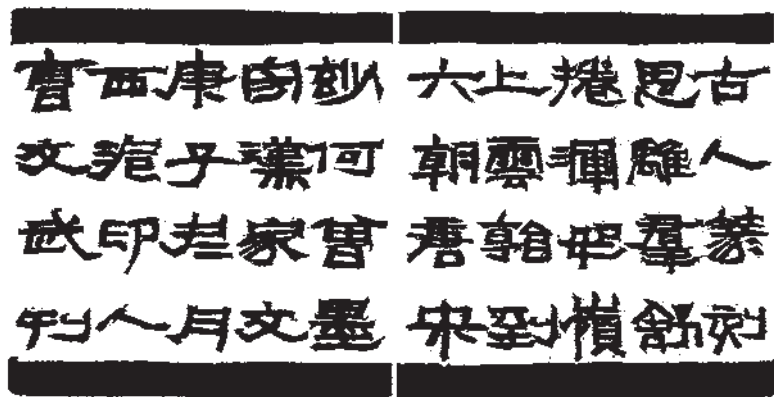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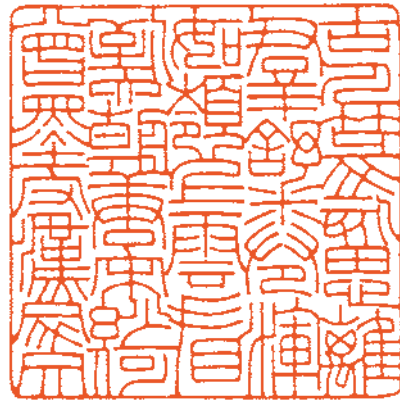


◎ 胸次阔 高庆春



◎ 意趣道 张跃飞

◎ 岭上云 高庆春



◎ 丁敬论印诗全文 曹文武

主管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主办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出版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泠艺丛》学术指导委员会

刘江 朱关田 韩天衡 陈振濂 李刚田 童衍方
龚志南

《西泠艺丛》编辑委员会

陈振濂 王宏伟 黄镇中 金鉴才 孙慰祖 秦陶

主编

陈振濂

常务副主编

秦陶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吟 邱云 郭超英 (名誉)

第一编辑室主任

解旬灵

第二编辑室主任

陈涛

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竹英 王大喙 王丽艳 王臻 申俭 乔中石
吕易 吴勤勤 李佶 李砚 张帆 张钰霖
陈心怡 周克平 顾祥森 郭晓芳 郭楚楚 戴海栋

法律顾问

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

支持单位

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版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06.30

CN33-1393/J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5-9362 [国际标准刊号]

编辑部联系方式

编辑组稿电话: 0571-85815991

发行订阅电话: 0571-87037360

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E区32号5楼

邮编: 310014

电子邮箱: xlyc2015@126.com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户名

西泠印社(杭州)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

75188100264547

西泠传媒旗下

西泠印社官方网站: 中国西泠网 <http://www.xlys.org.cn/>



西泠印社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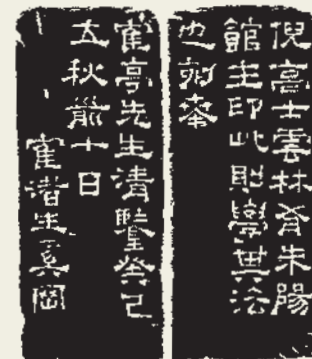
西泠印社官方微博

本刊声明

1. 本刊不接受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作品, 因抄袭和涉密等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者, 文责自负。本刊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本刊观点和立场, 本刊有权对其进行适当删改和调整, 作者如不愿被改动, 请及时告知《西泠艺丛》编辑部。
2. 为实现期刊编辑和出版的网络化, 扩大本刊与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等网络媒体和信息资源库全文收录, 在本刊公开发表的作品, 视为作者同意通过本刊将其作品上传至上述平台或数据库, 作者如不同意作品被收录, 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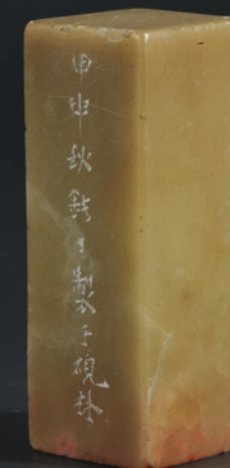
◎ 应天·小壑山人 蒋仁



◎ 秋声馆主 奚冈



◎ 烟云供养 丁敬



◎ 生于癸丑 黄易

